

# 世界和平之略



「第一國際迷夢」

譯文苑林 著爾哲安曼諾國英

行發社務服化文際國

# 路之平和界世

「夢迷際國」名一

路  
上  
走  
即  
來  
可

m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著爾哲安曼諾國英  
譯文苑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不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  
說 現 在 處 裡 有

11

# 國際迷夢 目錄

## 第一編

國際迷夢與一九三八年之危機

第一章 大英帝國有武裝而無國防

第二章 經驗能否使我們獲益！

## 第二編

戰前版

第一章 經濟與戰爭的道義的理由

第二章 公認的原理

國際迷夢 目錄



91208

第三章 國際迷夢

第四章 新世界與舊政治

第五章 國外貿易與武力

第六章 各殖民地是怎樣佔有的

第七章 戰勝與人口問題

第八章 「然因戰爭而獲利者亦有其人」

第九章 人性與人類的制度

第十章 信仰，武力與世界秩序

第十一章 什麼使我們戰爭？我們有此需要嗎？

第十二章 結論

第二編

最後的教訓

# 譯序

諾曼安哲爾是一位英國的名著作家，也是一位反侵略的文壇戰士。他曾因極力反對侵略戰爭，鼓吹世界永久和平，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金。「國際迷夢」的初稿是於一九〇八年寫成，於同年出版的。目睹當時歐洲的紛亂局面，英德間的種種矛盾，他認為如果不及早設法澄清，不及早設法解決，世界大戰是必不可免的。因此，他寫這本書，提醒世人，尤其歐洲人士，注意這危險的局勢，趕快圖謀補救的辦法，以阻止戰爭的悲劇。然而人們並未重視他的警告，把他的意見看成一種學者的空論，平和主義者的宣傳，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他提出警告的幾年後便發生了。千千萬萬可愛的無辜的青年把生命犧牲在戰場上，千千萬萬的金錢浪費於破壞人類文明的行爲。這巨大的人力，這大筆的金錢，如果以之用於建設的工作，人類將會如何的幸福，世界將會變成如何的光輝燦爛而美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並沒有使人們認識問題的結核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還不到二十年的時光，人們又在重蹈諾氏在一九〇八年的「國際迷夢」內所指出的覆轍

，歐洲以至全球的局勢又恢復諾氏所描寫的危險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愈來愈大了。於是，諾氏忍不住再大聲呼籲世人注意。他于一九三八年在一「國際迷夢」一九〇八年的初版本上，再補充了三章，即現版本的第一編第一二章及第三編，在同年出版。他警告世人歐洲的局勢已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他呼籲歐洲人士迅謀挽救之道。但是人們仍然執迷不悟，他的話並沒有使他們從迷夢清醒過來。結果，比上次戰爭更慘烈數百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的世界悲劇，終於不出諾氏所料的暴發了。

野心家，以至一般人，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以爲戰爭勝利可以使一個國家富有，使人民豐裕。諾氏引用許多確實的例證來說明這只是一個迷夢而已。戰爭結束以後，戰敗者固然要蒙受重大的損失，勝利者亦不能從征服地獲得什麼。一切財產仍屬於原主，把財產從戰敗國人民的手中，轉移到戰勝國人民的手中，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爲了恢復征服地戰前的繁榮，勝利者有時還要拿出錢來。因爲戰勝國發動侵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替它的出產品尋求市場。爲了要使當地人民有強大的購買力，它不得不設法使他們安居樂業，恢復舊觀。我們每每聽見甲國訴苦，說乙國商人在甲國境內與它的商人競爭市場，它必須提高關稅以防止這種競爭。但是當甲國把乙國征服了的時候，甲國便再不向乙國的商品課收高額的關稅，乙國商品可以更方便地進入甲國的市場，而人們再也聽不見甲國作上面的訴苦，好像乙國商品的競爭的危險已不存在，其實乙國商人照

樣的與甲國商人競爭，並且因爲高額關稅已除，競爭還要更加劇烈。這在諾氏看來，實在是一件滑稽的事情。

照諾氏的意思，所謂甲國佔有乙國，「佔有」這兩個字，根本是個空名詞。所謂佔有一個地方，實際上只是換了一面國旗而已。在經濟方面，這種佔有並不能解決國家的生存問題。勝利國不能用它的力量來奪取「佔有」地人民的財富，以供給本國的人民。亦不能使它的人民便於謀生。以大英帝國作個例子吧，英國的工人進入它佔有的澳洲，比進入墨西哥與阿根廷還困難。他的出產品在澳洲亦受到同樣的限制。在政治方面，這種佔有也不能有多大的幫助。一九〇九年，加拿大討論一旦戰事發生時，它對祖國應採取何種態度，結果，它決定有支持或拒絕幫忙的自由。甚至在戰事發生時，被佔有國也可不予支持，那還談得上政治統治，佔有嗎？

戰爭勝利，在經濟方面既不能爲一國解決生存問題，不能使人民致富，在政治方面，甚至在戰事發生時，戰勝國也不一定獲得「佔有」國的支持，只徒徒犧牲了許多生命與金錢，造成人類的浩劫，使戰敗者受盡災難，戰勝者亦得不償失。諾氏提議各國應回過頭來，共同組織一個爲大家謀利益的機構，以和平的方式來彼此磋商一個解決市場，原料的分配等問題的辦法。諾氏所反對的是侵略的戰爭，爲了捍衛國家，抵抗侵略而作戰的國家，如中國，他是非同情的。他認爲要消滅戰爭，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各國

把它們的武力獻給這個共同的機構，以制止甚或消滅侵略的行爲，設立「國際警察」，以看管法西斯強盜。然而，戰爭是人造成的，也只有人可以使戰爭休止。只有人們深切認識戰爭之得不償失，戰爭並不能替國家解決生存問題，集體和平的機構可以帶致人類的昌盛與幸福，上面的辦法始有實現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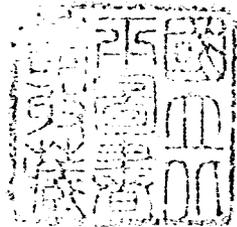
諾氏的意見是正確的。他的理論，不單爲目今國際問題的專家們所贊許，且已成爲國際問題的常識。他所提出的辦法，如果能見諸實行，亦必能使人類獲得永久的和平與幸福。只可惜忠言逆耳，人們當時仍然固執他們的錯誤觀念，侵略者仍是執迷不悟，致一次再次地造成人類的巨大災劫！

譯者五年前得讀本書，深覺它不單立論正確，內容豐富，文字亦復秀麗簡潔而有力。當時即擬將之譯出，以供讀者的參閱。奈以公私兩忙，東奔西走，總未如願。前年剛開始動筆，即罹疾病，一病大半年。本書卒賴以完成，得助於朋友們和天心的鼓勵實多，謹在此敬致謝意。原本附有註釋甚多，以篇幅關係，均未譯出。好在這種註釋的闕如，並不妨礙讀者對本書的瞭解，這是需要特別聲明的。

釋者卅三年六月於陪都

# 第一編

## 國際迷夢與一九二八年的危機



兩章指出「國際迷夢」(一九〇八年初版)所討論的題目與一九三八年的危局之關係；爲什麼該書所暴露的錯誤見解現在仍然阻礙有效的救補辦法之實施。

### 第一章

#### 大英帝國有武裝而無國防

經過屢次的讓步以後，大英帝國發現它的軍備，無論如何強大，都不足以防衛它自己。只有在法國以外再與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才可以對抗永遠在增長中的獨裁者的權力。由於那些三十年前即爲本書作者暴露出來的牢不可破的謬見，上述的聯合並沒有成爲事實。必需的合作現在可以造成嗎？如果合作已太

遲的話，則再整軍備亦太遲了。

一九一四年，我們加入戰爭，爲的是保護小國的權利（賽爾維亞對於促成戰爭與比利時對於我們參戰所扮的角色，是值得回憶的）；消滅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威脅；結束戰爭，使民主主義穩立於世界上；使本國與其他國家免除被侵略之苦，並把它們的經濟生活置於安妥的基礎上。

一九〇八年本作者出版了一書名「國際迷夢」（即本書的第二編 譯者），它裏面說出種種理由，相信在戰爭中打敗德國並不會，亦不能，達到上述的目的；即使各國有理由抵抗野蠻的侵略，並有權如此運用武力，它們當時所建立的權力，無論如何強大，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亦不能阻止侵略或防止戰爭，也不能因勝利而建立一種可以完成戰爭的目的之環境。他說假如戰後勝利的國家，像過去的勝利者一樣的濫使權力，則必不會保證國家的權利，亦不會除去德意智軍國主義的威脅，不會結束戰爭，不會使民主政體更安全，不會把經濟利益帶給勝利者；不會使勝利者擴大他的商務，甚至不能以賠償或其他方法迫使被征服者支付戰爭的費用。

作者承認如果德國的權力佔優勢，它可以使本國失去（指英國 譯者）所有保衛自己的權利的辦法，使我們唯敵人之命是聽，這是一個自由國家不能接受的地位。但是他同

時堅持另一個合適的辦法，就是不要求德國接受上述的地位；做我們拒絕做的事情；唯我們之命見聽。維持一種不穩的平衡，一種均勢，有一天會爲一種新的聯盟所打破的均勢，也不是一個切實的辦法。解決之法是把國際上的權力，如在國內的權力一樣，變成一種工具，由於共同的與集體的抵抗侵略，由於共同保衛那個各國不得用戰爭以實行它對自己的權力的意見之最高法則，使爭執的一方用凶暴武力以解決糾紛成爲不可能之事；在上述的最高法則之下，各國應有防禦暴力之責，這種防禦是由各國聯合的權力來保證的。武力的正確的功能，他說，是取消人類關係間的武力，使武力不能解決糾紛。（警察，代表國家的有組織的權力，並不判決糾紛。它只防止暴力判決它們，由於這樣做，糾紛可以由武力以外的東西作最後的仲裁人——公正的判斷，法律）。只有用這一類的辦法，歐洲的權力才可以用來保證歐洲的安全與穩定。

一九〇八年的「國際迷夢」堅稱永來戰爭的真相並不是由於日耳曼民族特別邪惡（當時盛行於英國的一種非常時髦的流行的意見），也不是有任何特別危險的不同的意見存在，例如一方的要求，他方認爲不能允許等事。（我們想能記得英德間已多年未能如大戰前夕之免於此種分歧的意見。）是由於兩個國家所採取的防禦的，自衛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之下，每個國家都企圖爲自己獲得防衛同時禁止他人獲得防衛；每個國家都要求有權以優勢的武力取得防衛，但是否認他國有此權利。一方的安全之取得是以他方的

不安全作代價的。

各國間爲何不實行其在本國境內所採取的原則？換言之，各國爲何拒絕把它們自己組織成一個彼此防衛的社會？

這是很明白的，如果一件這樣明顯之事都不能做到，一定是因爲利益，信念、成見、情感等強大的力量在作梗。在這些障礙物的本質未顯露以前，草擬重新建造世界的計劃是無用的。我們記得某一個君主對於亨利第四的偉大計劃的批評：「它是盡善盡美的；無瑕疵的。只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一個現世的王子會同意它。」

研究爲什麼現世的王子，國家，堅持那種使它們不安全的結果致於滅亡的安全辦法，這就是一九〇八年「國際迷夢」的目的。這本書事實上是以往及現在妨礙各國組成一個集體社會的一切力量的分析。

那種分析在這裏再寫出來。它指出關於征略的經濟利益的若干初步的假定，一般人視爲正確的假定，其實是錯誤的；這些經濟的信仰曾有（它們仍有）深重的政治的與心理的反響，這種反響苟估優勢，則國際秩序便無法建立。

每個強國相信比他國佔優勢便可以獲得巨大物質上的利益，而且在一個資源有限人口增加不已的世界上，欲求生存，這種優勢也是必須的。

各國不會採取共同的與集體的禁止暴行之辦法，作爲公平的與理智的解決糾紛之必

需的序幕，或一種可行的經濟學。每個國家都相信它很可以倚仗自己的權力（或者加上同盟國的）以取得防衛，因而獲得不是公平的判決，而是它對於自己的權利的判決；相信優勢所分子它的世界資源會比任何合夥制度，任何法律，所能分子的大。一九一四年全世界陷於戰爭中，因為每一個大國都以這些各處都認為正確的假定來指導它的政策。

這些假定所包含的是什麼，它們為何使戰爭成爲不可避免之事，它們為何是錯誤的，各種事件怎樣證明它們的謬誤，都在本文內解釋說明。

然而這些迷夢不單是戰爭的根源；同時也是我們在戰後所建立的和平之根源。因為它們說明引致戰爭的政策，它們也說明了我們在和平談判時如何運用勝利，并說明最近二十年來大部份的外交政策。凡爾賽條約與（更重要的）以後的政策，幾無一不陷於三十年前「國際迷夢」提出來警告戰前一代之政策上及經濟上的錯誤。

那本書（即本書第二編——譯者）大半談論這個問題的經濟方面。本國已加入戰爭後，作者在「一本戰爭結束一年前出版的書內，談到政治形勢時，曾作如下的警語：

就有效使用它們的武力一事而言，西方民主國家的生存，有賴於它們之能統一運用武力，在戰時及戰後。然而甚至爲了戰爭，我們亦未獲得這種統一，因為我們拒絕承認它的必需條件——一種爲流行的政治思想與觀感所敵視之民主的世界主義，一種敵人不可

需要而我們需要的世界主義。

因爲民主國家的大同盟是各國的龐雜的集合，地理上並不連接，而是分散在全球；並不是由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可以予這一羣國家以統一指揮的國家，來統治。在另一方面，敵國的同盟是包括一羣國家，在地理上是相連的，在政治上與軍事上受其中一個盟國的物資力量及地理形勢之統治，而這個盟國，由於上述的事實，可以使全體接受統一的目標與指揮。如果我們想在這種環境下成功地運用我們的權力來對抗它，在戰時，在和平談判時，與及以後（這許是很需要的），我們必須造成一種同樣有效的結合。但是在我們方面，其中一個盟國在實質上佔優勢既不可能，則這種結合必須用一種道義的因素來造成，這種道義的因素即是各平等國家的自動合作——一種民主的世界主義，必需以統一的道義的目標爲根據的世界主義。因爲甚至在戰時，這種結合仍不能獲得，我們的聯盟的分裂已經形成——致軍事上受損失——并有在和平談判時更加尖銳化之可能。敵國的集團並沒有表露相同的分裂。

沒有一個對付敵方集團的軍事上的決議可以永久，如果在和平會議席上西方的民主國家所表現的仍是以往的缺乏團結，不穩固的同盟，暗中競爭單獨的權力與土地，以及一種國家的自己主義，使共同行動與權力配合成爲困難，不可能之事……：

大同盟分裂的因素包含經濟利益的衝突與各國內部的羣衆願望的矛盾。這些因素對

於我們比對於敵國更爲危險，因爲我們的歷史環境使我們不如敵人那麼有紀律和馴良，不習慣於機械的與失人性的服從。

我們在這裏所討論的一般的真理，對我們比對敵方更重要得多。他可以在某些地方忽視它。我們不能。就道義的因素而言，他的統一可以老舊的國家主義的觀念爲根據；我們之統一則有賴於這些觀念的修正，把它們擴大爲世界主義。

爲西方人士團結以求有效地運用他們的武力所不可少的一種世界主義——一種必須顧及西方社會較新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力量之世界主義——是不能以舊式的政略與其政治目的爲根據的。因爲它們認爲世界上一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即是每個國必須倚賴它自己單獨的力量（必須從有人口、領土、與軍路上的地位，取得的單獨的力量）以求得自身的安全，因此國家的利益必定是敵對的，他們認爲每個國家之能否供養它的人民與保證他們的經濟利益，是有賴於領土的大小。「生物學上的需要」，「在各國間競爭生存」，「人類天生的好鬥性」，「適者生存」，等整套哲學，都是代表這個國際生活的與政治的舊而流行的觀念。這個觀點不可避免的暗示一種明的或隱伏的競爭，結果必使甚至同一聯盟的盟國間亦遲早會發生衝突。

替代這個分裂政策的唯一可能的團結辦法是某種「各國的永久的集團」，由於這個集團，每個國家的安全將倚賴全體的——因彼此防衛互相而團結一起的——力量來保證

的。

這一個制度最大的障礙是我們不相信它的可行性，以及我們之服從國家主權與獨立的傳統觀念。如果我們都相信并希望有這種制度，則它不單可以實行，而且是必然的：

……

戰後回復以前的老關係，結果必使民主國家，無論它們個別如何強大，亦遲早逐個的爲力量較弱但較統一——獨裁政治，犧牲自由與人類的價值以求之統一——的集團所征服。

這個第二次的預言如今逐漸實現。

注意以上所引的話是一個人在三十二年前寫的，他當時曾設法警告他的同代，戰爭完結時，以一種懲罪的和平，施諸德國是錯誤的；結果他被猛烈地攻擊爲「不愛國的親德主義」者，最少有十年之久。這些攻擊之不合理，正如現在對於反德意志的攻擊一樣。他曾設法說服那一代，有如他想說服這一代一樣，任何使德國的安全毀滅我們的，或我們的安全毀滅德國的，制度必定失敗；因爲我們的力量并不代表任何使德國亦可以獲得保護，法律或制度，要德國唯我們之命是聽，不單是一種天生的惡行，而且會遭慘敗；他現在設法說服這一代，使英國唯德國之命是聽也是一種天生的惡行（由於某些意外的原因，它甚至比對方還邪惡）必遭慘敗；這類惡行的來回重演已成爲數世紀以來歷史

的污點。

認爲，談到此點人們往往認爲，把統治歐洲（與我們）的計劃委諸德國，等於以邪惡的宗旨使之負責，這種說法使人混淆，而且事實上對德國人是不公平的。那些管治德國政府與人民的人并不相信這個計劃是邪惡的，一如我們以往之不相信我們的統治洋海或者統治德國是邪惡的。他們希望爲德國建立世界的優勢力量，使它永不再作命運的犧牲者，再受凡爾賽的痛苦，永不再唯外國人之命是聽，將來只有它可以判定它的權利是什麼（這即是說，可以判定別人的權利是什麼）。希特拉相信我們必須唯他之命是聽，以替代他之再次唯我們之命是聽。這都不是德國人信以爲錯誤或罪惡的事情。相反的，他們有一種狂妄的信念，以爲這個做法是對的，高尚的，爲達此目的所使用的任何暴行都是上帝之命；我們之不克抵抗這種行爲是事實的證明。他們的狂迷不亞於舊式的宗教裁判者，他相信使他的苦刑就是完成上帝的意旨，同時他可以立下法則，規定守異教徒的信約即等於背棄上帝的信約。不了解這種所謂納粹的真誠，不單對德人有失公平，不單冤枉他們爲自覺的惡行，而且忽視了問題的主因。

大戰幾年以前，作者曾力主與德國舉行會議，看他現在的主張。但是，有如成功的修正條約，和平的改變一樣，一個成功的會議的必備條件，是那些納粹集團，狂妄地相信他們有權攫取任何統治機會的集團，能夠認清人家雖然向它們建議合夥，平均權利，

但並沒有建議由他們統治，而且他們統治的企圖必遭抵抗。沒有這個條件，一個成功的會議是不可能的。

然而抵抗的第一個條件，如上述的，是非德國國家的聯合。如果這種聯合受阻，抵抗即告終止。

因此，任何會議，如果它以下的論據作開始：「我們英國不管你們德國如何對待別人；這不干我們的事；我們只有在一個條件下可以默認，就是你們讓我們自由行動」，則是在開頭即犧牲了任何可能抵抗德國的局勢；因為我們賴以作我們唯一的防禦的團結已被放棄了。如果我們不幫助他人防禦，我們便不能得到他人幫助我們防禦。除了顛覆我們防禦的物質基礎以外，我們將會同時犧牲了使用武力之道義的理由，這個事實許是不值得提及的，因為在這些日子提出任何道義的問題都會被指責為期望，「一種觀念學的戰爭」。

德國的元戎時常都認識得非常清楚，可以阻止他統治歐洲的一件事，是以防禦為目的來聯合德國的弱隣。如果他可以各個的對付它們，他可以把它們置諸他的權力之內；如果它們聯合起來，則它們可以對付他。所以，他時常拒絕集體的商議條件，作這種拒絕，他獲得了英國那些反對集體防衛而贊成兩邊協議的人之支持。他毫不猶豫地利用別的辦法，尤其利用畏懼戰爭與畏懼共產主義的心理。他明白地對那些小國說（例如對

丹麥說）·它們參加任何互相幫助的協定都有使他仇恨的危險；小國一個一個的退出同盟。他曾有效地對非日爾曼語的歐洲說：你們不可因防禦而團結。非日爾曼語的歐洲接受了這個要求，欣然地接受了，因為即使爲了防衛，國際合作是與國家主義者的偏見背道而馳的。

然而這種破壞非日爾曼歐洲的團結之工作，並不限於臨間各國，與背棄集體制度。還用一種全新的征服的技術，使分裂及於各國內部。在他擬統治的國家內，支持並鼓勵破壞國家秩序的運動（西班牙，奧大利與捷克說明這種方法），而畏懼共產主義的心理與反對世界主義的舊偏見以及種族的仇恨更加深了這種分裂。

這種方法的實行，使歐洲每個民主國家內都有一班有勢力的份子寧願德國統治歐洲，而不願看到另一種可能。現在的情形變成如此了，如果德國與法國或英國打仗，這兩個民主國家內的有力份子將會希望敵人勝利，並不一定因爲敵人的勝利會有什麼好處，而是比可能替代敵國的國家勝利好，因爲德國是兩個惡魔中之較弱者。

如果我們回顧一九三一年以後民主國的退讓事實，我們發現極權國對建立優勢所取的每一步驟——無論它是日本之在遠東伸張權力，義大利之在北非伸張權力，義大利之在蘇彝士運河建立根據地，德意智之用武力重佔萊茵區，侵佔西班牙半島，德國之陳兵修達及西班牙南岸逼使直布羅陀中立，巴雷阿累羣島之佔領——所有這些步驟都爲英國

大部份有力者所歡迎與稱讚，而這些有力者中却包括有曾於第一次大戰遣子從軍以阻止德國勢力之增長者。

對大英帝國的安全的憂懼，已為別的情緒，雖然錯誤都帶幾分宗教熱情與真誠的信念，所屈服。甚至在共產主義興起以前，任何意見要成立一個國際機構，使其變成強有力以「干與我們帝國的管治的」，并容許帝國各部邦以完全的主權與獨立，即已激起各方面的巨大仇恨。任何一個成功地反對這種意見的國家都一定得人心。尤有進者，英國許多保守派思想的人，他們之認為共產主義威脅文化，秩序與道德，有如希特拉之認為猶太人是使歐洲受苦的萬惡根由，欲保存日爾曼文化，必需把猶太人消滅或驅逐。

這種見解的結果，使我們對於「日爾曼的歐洲抑共產主義的歐洲比較危險」這個問題的意見發生很大的分歧。這些深刻與真誠的意見的分歧，使英國的政策躊躇不定，因而陷這個國家於目前的無防禦中——有如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事件所悲慘地洩露的。

反抗極權國的侵略已成爲不可能之事，因為我國大部份人都拒絕付這個有效反抗的代價，這個代價包括與蘇聯密切合作（無蘇聯參加而欲在歐洲造成一種足以抵抗極權國的挑戰之平衡力量，是顯然不可能的）；經濟援助現在抵抗企圖毀滅它們的極權國侵略者之中國及西班牙政府。

這樣一個方針被擯棄了，因為我們放棄了把中國與蘇聯的鉅大的潛伏力招募到我們

這邊的機會。我們所以放棄的理由無論如何真誠與高尚，却與英國的安全無多大關係。二十年前我們爲反對德國在歐洲的霸權而戰，因爲德國得了霸權會把我們置於德國權力之內；使我們變成劣者，我們與它有什麼爭執時，只有接受它的意見，因爲我們已無力抵抗了。

但是如今我們却逼得最少暫時接受德國之統治歐洲，任德國在中歐，南歐，東南歐及以外的地方，在西班牙，在北非洲，在地中海等地的戰略地帶建立日爾曼主義的集團，使德國比在下次大戰敗於我們以前更強大得多。我們時常宣稱爲我國安全所不可缺之法國的安全與獨立，最少目前已變成無能防禦，如果它爲德國所威脅的話。上次大戰證明，對德的防禦不是如何的艱難，那時我們有俄國、日本、義大利、賽比亞及羅馬尼亞加入我們這一面，還獲得美國的經濟的，最後是陸海軍的援助。如果俄國中立，孤立，日本與義大利加入對方，美國的資源的援助不如從前，而法國則四面楚歌——萊茵區，阿爾卑斯，庇里尼斯，以及地中海——我們將處於如何的地位。

這種局勢許已無可救藥，但是如果我們要把它挽救過來，我們仍得從頭做起（或者從經濟援助中國做起）作十年前比現在容易得多的事情。遲遲實行早做更有效的時候，已成爲大戰後整個英國政策的特徵。例如，對於賠款這件事，如果我們在一九二〇年便實行了我們於一九三二年在洛桑所實行的辦法，我們許永不會聽到亞多夫希特拉這個人

，因為威瑪共和國也許可以免於巨大通貨膨脹的災難，而這個成爲毀滅威瑪共和國的主因的通貨膨脹，却主要是否認賠款這些要求所激起的。

若干我們以往的錯誤，現在却爲那些該負其咎的人所吵鬧地指謫，他們好像忘記了這些錯誤是他們該負責的。如果我們現在訂立凡爾賽條約，我們會要求一個與一九一九年大不相同的條文。但當時所存在的各種相聯的事實與現在的初無二致。所不同者是由於性情與心境之不同而已。我們能否肯定性情與心境現在不像以前一樣的欺騙我們？

我們許不久會指謫我們一九三一年對日本與一九三五年對義大利政策之錯誤，一如我們現在指謫凡爾賽條約之錯誤。我們如今讀到許多恣意指謫凡爾賽條約的文章，它們的作者在一九一九年不單不能忍受一句批評的話，並且要求更嚴厲的條款，同時想盡辦法排斥像本作者一類的批評家。但是籠統的承認了以往的錯誤，其對於指導政策之毫無用處，一如參與聖會的人每星期作一次宣言他們是可悲的罪人，無一善處。因爲一百人中一百個都準備宣稱凡爾賽條約（在訂立時是他們所贊同的）是完全錯誤的，是我們的糾紛的根源，修正它會予我們和平。很難找到一個人根據事實來修正這個結論，認爲上次大戰發生時歐洲并非在凡爾賽條約下生活。戰爭本身已足證明我們甚至激烈地修正凡爾賽條約，把德國戰前所有的佔領土不單在非洲的，在亞洲的，而且在歐洲的，都歸還德國，也不能保證和平。因爲歐洲捲入戰爭是在德國擁有這些佔領地的時候。把德國於

一九一四年擁有的一切東西都還它，誠然是一種修正與讓步。這種修正與讓步會獲得和平嗎？那變我們在一九一四年爲什麼沒有得到和平？我們的問題比凡爾賽條約更悠遠而且深刻。

如果這只是一個把大部份英法的殖民地讓與德義瓜分以購得和平的問題，則本作者首先會認爲以這樣的代價購得真正和平，戰爭陰影的永久揭破，是一種極便宜的買賣。他所以這樣說，是因爲他曾費了三十年中每日的時光來宣傳和平，以及找尋使和平實現的方法，結果他發現自己被一再的目的爲戰爭商販，被指譎爲願意「爲了數千亞比西尼亞人」，或滿洲人，或捷克人的原故，冒使全球陷於莫名的苦難之危險。（對於繼續作那些只要有一刻考慮便被內證證明是錯誤的陳說之人們，我們怎樣去形容呢？）。人們似乎仍然不明白，有組織的抵抗，無論是於一九三一年對日本，抑於一九三五年對義大利，其目的并非爲了滿洲或亞比西尼亞，是爲了拯救西方文明。

如果放棄自由，民主，正義，榮譽，真的可以獲得和平，作者也會接受這個代價。因爲戰爭很少有自由，或民主，或正義，或榮譽等事存在，想用戰爭來保護這些事是很難的。然而事實證明以往的讓步并未帶致和平。它帶來了更多的戰爭。在以往對暴力屈膝的七年中，直到去年九月那個最後的不幸的一週，沒有一次是因爲戰爭與和平兩不相容，因爲不放棄正義炸彈便會落在倫敦（日本與義大利都不能轟炸倫敦）。每次都因爲

不放棄我們的偏見或幻想的利益，便需放棄正義，最後放棄和平。

直至最後一週，「我們要戰爭抑和平」這個問題才會發生。問題一向是「我們將放棄我們的偏見以求得一公正的與和平的解決，抑爲了固執我們的偏見不惜放棄正義任戰爭的危險繼續增長」？

如果絕對的和平主義可以真正的實行，這自然可以避免戰爭。但是這種主義只實行至放棄我們傳統的自由主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討論自由。一個勝利的，不可抗的法西斯統治下的歐洲，面對着「共產主義推廣」的危險，是不能容忍本國有一個左傾政府的，一如它之不容西班牙有一左傾政府。如果有一個英國的佛朗哥反對左傾政府，無論他的羣衆如何少，他可以得到統治歐洲的權力作後盾以消滅英國的共產主義」。如果英國政府是徒手的，和平主義的、無抵抗的，它將唯任何要隸捕它的伍長衛兵之命是聽。無限度的屈膝於暴力之前，它所要求於大家的太多，太長久了。

所謂在最近七年中政府會「維護和平」，這種無聊和自鳴得意的話竟能被數百萬人民視爲真正的事實，亦可見那些人的道德意識究竟如何了。因爲很明顯的，和平并未獲得維護。每次讓步只是使戰爭蔓延，使戰爭變得更兇猛殘酷。由滿洲里，它蔓延至非洲，由非洲至中國，由中國至西班牙，由西班牙至捷克。上面那句話的真正意義，是至今戰爭仍未輪到我們身上；它只降臨於滿洲人或阿比西尼亞人或中國人或西班牙人或捷

克人，壓迫與刑罰只加於猶太人，或社會民主黨人，或和平主義者或外邦基督教徒；而他們的和平與我們無關係。我們不防以漠視他人的和平來保持自己的和平，這個想法——的確有許多人官冕堂皇地這樣說——竟為那些在教堂內殷肅地再三宣佈四海皆兄弟姊妹的人所接受；他們使這種信仰與主張的宣佈得到一種感情的滿足；他們在再三宣佈時，帶着漠然的「善」感。

他們不相信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他們不相信，因為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他們不了解；他們不明白怎樣，以何種方式，這個四海皆兄弟姊妹之真理可以適用於人類社會中，尤其在各國共同防禦所必需的機構中。

我們現在所感應到的危機是那個瘋狂的重整武備的行動，一個只能針對極權國家的行動。（如果我們需要教我們的小孩戴防毒面具，因為炸彈許有一天會落在我們的城市，我們完全明白這些不會是法國的炸彈，或美國的炸彈，或荷蘭或瑞士甚或俄國的炸彈；它們是德國的炸彈。不會是別國的）

然而許多人——或者大多數的人——他們每日都呼籲我們要更多的武備以防禦德國的攻擊，但同時却歡迎德國在西班牙或別處的行爲（最近加入內閣的閣員，是一位擁護佛朗哥的，極權國的指定人或工具，政策的一個會社活躍的社員。）這明白使我們不能有效地利用我們的武備。「如果」，利得爾哈特大尉說「你要等到根據地已被有策略地

傾覆時始出而抵抗，則你已不能打仗——你只能讓步。

想一想空軍在現代戰爭中所佔的地位，尤其在對敵後造成恐怖這種工作中所佔的地位。

德國的軍事權威者計算，自與我們作戰起，他們可以用他們的空軍每日毀滅我們二萬個平民。演算一下便了解這個意義了。

無論我們的空軍ARP法案是如何的有效力（雖然我們政府似乎把它看成整軍的主角，目前仍是缺乏的可笑，需要增加千百倍。）空襲是德國對我們的海軍優勢的答復。爲了消滅我們的意志，獲得我們同意它的要求，德國不會企圖毀滅我們的艦隊，因爲它沒有這個設備。它會企圖毀滅我們的城市，這個它是有準備的。

殺戮幾千婦孺不能獲得軍事上的決勝，因爲海軍及其他軍力仍然無傷，這種爭辯是不得要領的。如果那些丈夫，父親，愛人，覺得他們無理由再任子女，妻室，愛人犧牲，（而政府，陸軍、海軍空軍都包括丈夫、父親、愛人），如果國家的意志已因此毀滅至相當可以的程度，他們會要求停戰。這個決定事實上是一種軍事上的決定，最基本的軍事上的決定，是整個軍事的目的，軍事上的種種措施的始與終。我們不能否認最近幾年已使我們的人民習於屈服——對海盜行爲屈服，對殺害我們的水兵，對威脅，對侮辱，屈服。這對於長期的抵抗，不是一個好的心理上的準備。德國的軍事論者會常常看見

與着重的說，消滅敵人意志是一切軍事措施的最終目的，結果他們把空軍造成恐佈的措施看的非常重要。一個海軍力量薄弱的國家與一個企圖以它的艦隊掩護自己的強大國家打仗，它必然用上述的措施作主要軍事的武器。

不單德國學者着重這一點，福煦元帥一次提示格羅夫斯將軍說：

「軍事家往往幻想下次的戰爭會與上次戰爭的一樣。以往既不是如此，將來亦不會如此。下次戰爭的主要因素之一將是飛機。大規模的空襲的可能性如何是無法估計的。但是很明顯的，由於它之粉碎一個國家的精神的效果，這樣的襲擊可能影響羣衆的意見，使之主張解除政府的武裝，于是便決定了戰爭的結果。」

上次大戰的英國作戰部炸藥科科長哈爾斯伯利爵士，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向upper議院報告，四十噸的砒毒氣便可以毀滅全倫敦的居民。

故陸軍元帥威廉魯濱臣爵士說：

「現代戰爭大半是經濟生活的戰爭，它已愈來愈注意敵人的後方，以往只限於陸海軍作戰的舊原則，已成過去。空襲非軍事區與平民許被視為野蠻，并且因為激怒了居民，它們許獲得相反的結果——消滅敵國的精神之相反結果——但是這種空襲在下一次戰爭中一定佔一重要地位，且必比上次戰爭大規模」。

這裏是一位美國的證人：

在下次戰爭中，平民的真正恐怖將來自非常毒的氣，也許來自微菌。試想一個適度的力量，二百架飛機，夜襲一個城市。它們會用最少每分鐘六英里的速度，在五英里之高空飛入來，任何照射燈都看不見。即使它們是看得見的，它們也不致受高射砲的威脅。這樣一隊飛機最少可以投下四百噸裝有毒氣的炸彈。毒氣將來是無氣味的。不會有什麼先兆。

在兩軍還不及接觸以前，在宣戰半小時內，一國便能夠制服敵國平民，這將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是一種可怕的推測，然而這却是一件必須遇到的事。

在解釋他處理本年（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事件的方針時，首相說：

你再不能以馬爾巴羅時代的戰爭或拿破倫時代的戰爭，甚或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來論現代的戰爭。

當戰爭今天開始，在第一個鐘頭，在陸軍或海軍或空軍未接觸以前，它便會攻擊工作者，書記，路上行人或乘車客，以及他們家裏的妻室子女。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的情勢，究竟如何？當時在首相看來是有理由需要犧牲法國的盟國（因此，進一步，犧牲我們的），結果似壞了法國視爲它的安全所緊的同盟制度——而法國的安全又是我們所時常宣稱爲我們的安全所不可缺者。

首相解釋說我們已臨戰爭的邊沿，已臨近戰爭所引致的一切苦楚。我們到底已臨近

戰爭至何種程度，可於外交部長的一個陳述見之。講及要求捷克的犧牲，他說：

我們不要弄錯。沒 賽納氏博士的幫助，想避免歐洲的戰爭是不可能的。

想一下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已處那變一種情勢，即有一個人，他的一國元首的資格。因為一種措施，他的人民視為我們出賣了他們的措施，被黜革了，他的事業也因他所作的犧牲而告結束了。如某他的胆識與毅力差一點，而心理却懷着鬼胎，則世界大戰已經發生。對於那個不時產生可怕危險的情勢的政策，我們應說什麼？

這仍是一樣可怕，如果我們想到我們之能幸免於滅亡，完全是賴於首相在最後一刻所施之技巧與堅忍不拔的精神。只因我們運氣好，正在那個時刻我們恰好有這樣一個人在倫敦，同時又有另一位在布拉格，否則我們現在已陷於苦痛的與悲慘的混亂局勢中，我們的國家，所有的自由，我們所最寶貴的安全，都悲慘的毀滅了。我們是否認為那個已處於致命的與可怕的危險地位的事實，足以證明我們已採取了一個正確的政策？證明英國的國策是聰明的？這些把我們帶到不幸的，不可思議的滅亡的邊沿之政策，是否應該繼續？

人們許會爭辯說，使我們徘徊於陷穽的邊沿的九月的情勢，不是我們所採取的政策的结果。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我們在依附了這個政策好多年以後才陷於這種情勢；長期的依附這種政策并不能防止我們陷於絕境，有人告訴我們，使我們免於此種後果

的，完全是一個人的天才的協商，捷克的幾等於超人的容忍，——但是結果我們却再次對戰爭的威脅讓步，再次犧牲一個反抗極權國統治的有力的同盟。

對戰爭威脅最後一次的讓步已達到與極權國幾經磋商和合作的最高峯；讓步，「和解」，忍耐和屈服，最先是對日本，然後對義大利，然後對德國。我們承受了機關槍掃射大使，擊沉英國船，淹斃水手等行爲，在宣布亞比西尼亞的征服爲罪行兩年以後，我們「承認」了這個征服；默許海盜行爲；不允許西班牙政府爲了自己的防衛有一如平常的獲得採購物資的權利，同時有兩年的時光我們（經過不干涉政策的謬誤的滑稽表演）默許它的敵人遣派整個軍隊，把國際聯盟置於冷藏庫內，因爲積極的擁護它或實行盟章都是極權國所不歡迎的。在有機會表示主張而不致冒戰爭危險時，我們沒有做，我們當然會遇到表示主張便有戰爭危險的局勢。

張伯倫先生明白表示最使他重視的是空襲的可能——一如這件事該已來臨。陷於這種局勢是一種罪咎。如果一方面是讓若干遙遠的國家受他國的統治，甚至使我們因此而喪失了一個同盟國，使我們的防禦地位日益惡劣，另一方面是讓英國的城市與它們的居民滅亡，而我們不得不在兩者之間選擇一種，則我們必然走上屈服之一途。

然而我們同時必須顧到事實，如果這種局勢時常發生，而我們又必須對此有所決定，則國防便會終結，我們的巨大的整軍變爲毫無意義了。因爲只有在若干機要的情況下

我們才可以有效地運用我們的武裝。例如，倘若法國、俄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譯者）斯干的尼維亞，西班牙——即是說北大西洋之大陸海岸——已在我們的武裝所要對付的國家之權力下（讓我們再說，只有一個國家的轟炸是我們所懼怕的）使那些海岸國已不復是（a）對付德國攻擊英國的一個緩衝地帶；（b）德國須對付的一部份武力，以及（c）反而成爲攻擊英國的重要根據地，則我們所可能維持的武裝是不能使我們安全的。

倘若我們假定，澳大利被吞併了，武裝的捷克滅亡了，俄國守中立，則德國便可以統治西班牙、法國、比利時、荷蘭與丹麥，然後它自己的神經中樞及交通幹綫由波羅的海岸伸展至地中海海岸，於是黑海可以用廣闊的軍寨來保衛，而我們自己的神經中樞及交通幹綫。一條沿大西洋海岸，由柏爾至非洲海岸而至卡內利羣島的整個包圍線，却到處都易遭受攻擊，則進攻德國首都，我們必須橫過滿布着德國根據地的大陸地帶。但是德國的軍隊可以由這些根據地到達我們的領土，無需橫過任何軍寨。我們開始處於一個巨大的初期的不利地位。如果這個爭鬥必須變爲一種磨滅的，互相滅絕的戰爭，試想這是什麼意思，一個鬥爭發生於擁有四千萬人口的英國與擁有一萬二千萬人口的德國聯盟之間，上面所稱的德國聯盟不過係指德國兩個主要的夥計，如果我們把（我們必須這樣做）附從的國家也算在內，則最少有二萬萬。假定人民的損失雙方都是一樣，并且

回想上次大戰，空軍戰爭還是剛開始，各交戰國損失了一千萬人。如果德國集團損失二千萬人（德國人會用它們空軍根據地的分配辦法使丹麥人，荷蘭人，比利時人與法人分担這個損失）它依然是十分強大。如果所有德方集團的損失都由德國負擔（這是不會的）它仍是一個擁有六千萬人口的國家，可以統治大陸。但是如果英國方面受同樣的損失，便會使英國退為完全軟弱無能；一個破碎的國家。

我們是否還懷疑在對英國的鬥爭中，德國不致於用集中毀滅英國城市的方法來摧毀英國的組織與全國的精神士氣？在這樣一個爭鬥中一樣事情都有利於它有害於我們：兵源，地理形勢，根據地的更廣闊的分配之可能性，資源、工廠、人口。它已訓練它的人民慣於受苦，禽獸似的服從，喜歡殘忍——一切我們不如的氣質；同樣重要的是，它可以利用的突襲的程度在我們是辦不到的。

當我們的政治家猶豫不決——處於政治孤立的境地猶豫是對的——的時候，極權國統治者的造次，他們之恬不知悔的使人民陷於戰爭，予德國集團以很大的好處。

當我們想到德國可能因統治它的歐洲海岸的鄰國而逼使它們答應在它們的領土內建立根據地時，情形更是如此。在這方面，捷克所得的教訓是什麼？捷克以前是一個有強大武裝，防務鞏固，管治良好的國家，與法國及俄國同盟，且獲得大不列顛的精神上的支持。德國用一種戰爭的威脅，數日間便獲得這個國家及它的同盟完全的，無條件的讓

步。拿這件事與一九一四年比利時所發生的事件比較吧，當時一個弱小得多的國家抵抗德國的進擊，而能得到他國完全地（并成功地）履行它們對它防禦時所答應履行的義務。

一九一四年以後，對戰爭的恐懼，對德國的恐懼，對條約的義務或集體行動的信心之衰微，極權國對它們使用暴力與殘忍的實效之日漸增加的信仰——所有這些現象已在滋長，使國際政治不復能以一九一四年仍然存在的術語與標準（雖然以前它們也是缺乏和不足的）解釋了。

如果德國向法國提出要求，若干點與捷克的相同的要求，我們應否為法國而戰，當我們知道俄國有一個時期不能計算在內，阿爾平與比里尼斯前線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軍隊，而德國之佔領捷克馬奇諾線，法國必須對付的武力又增加了三十師，使法國的防禦事實上已不可能。

我們可以完全肯定的說，我們的拒絕作戰是一種預定的結局，如果我們從前曾以我們施於澳大利，西班牙與捷克事件的技巧施於法國——煽動法西斯運動以反對被指為有受共產黨運用的危險之法國政府。（一個漢倫業已在阿爾薩斯洛林出現）。這是不難想像其結果的。

在突尼斯及其他非洲的殖民地發生一種法西斯及反猶太人的暴動，當地政府當局被

指謫爲傾向或聯合共產黨，或受猶太人影響。這完全是義大利與德國一種暗中的干涉，有如在西班牙繼續了兩年之久的一樣。與此種干涉同時併發的是在法國本土產生的一種半法西斯的政黨（由義大利與德國支持），它們力說共產黨將會奪取政權并把國家陷於混亂中，有如——人家告訴我們——法西斯與納粹在義大利與德國獲得政權時，義德兩國所遭遇的一樣。於是法國的局勢在許多方面都與在西班牙所產生的局勢相同。對於此事英國人意見的紛歧與西班牙事件時無異；言論紛亂；許多在英國的人，爲共產黨的兇暴故事，燒教堂與強姦尼姑等故事（受莫斯科的煽動的）所激動，會贊成平定法國任何左傾政府，甚至借助德義兩國亦所不惜；德義兩國都願意絕對的與肯定的保證尊重法國的完整，使法國本土沒有一畝地不受法國的統治。（這樣的保證會由德義兩國給予佛朗哥。同樣保證德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給予土耳其，然而這種保證未能阻止德國在上次大戰爆發很久以前爲了軍事目的利用土耳其的土地）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英國爲一個分裂的法國挽救法國殖民地而戰爭，是可笑的，是不可能的。

從它準備同意把法國殖民地轉移給德國那時起，英國已沒有戰爭這個問題，從德國方面說來，這種做法會有雙重好處。一方面可把意大利置於德國的軌道之內，同時又可以永遠使法國隔離英國。把第三者投入狼口并犧牲一個盟國，於是英國又可以維持和平了。法國會步捷克的後塵。法國被解決了，我們還能想像小國會冒滅絕它們的人口之

險嗎？明知在任何情況之中，企圖阻止德國奪取幾個飛機場是徒然的。

托辭，一相情願的意見，估低我們自己造成的局面的嚴重性，都是無意義的，尤其當我們知道在我們未發現這種局面所產生的種種可怕事情的嚴重性以前，我們不會充分地與這種局面奮鬥的。如果我們有勇氣，有能力對付留給我們的事實，則我們便不應有所隱蔽，有所估低。然後我們許會準備作必要的犧牲。

當我們談到「犧牲」，我們往往係指爲擴軍而增加的課稅，或徵兵，或爲國家服務，或類似的負擔。如果上述的犧牲能發生一點力量，則這類的犧牲將或無止境的增加，而結果仍使我們一樣的無能。所有的民主國家在軌近幾年來都在作這種努力——而它們的防禦情勢都一天比一天壞。

那些能夠一天天使情勢完全改變，而且使非日耳曼國家居於有利地位的犧牲，事實上並不是物質方面的犧牲；主要的是成見的犧牲，敵愾心理的犧牲，這種犧牲使我們不再不喜歡考究那些已成爲感情方面的習慣與素養之客觀的理論。

讓我們根據事實來研究一下，上邊所說的究竟是什麼意思，結果將能使以往的事不再重演。

英國和法國於九月向極權國家讓步，它們告訴我們，如果不是這樣做，倫敦和巴黎便會遭轟炸。

但是我們以往曾一再的對極權國讓步，一再的屈服，而當時即便不這樣做，亦不會有轟炸倫敦這類事情。我們有理由肯定九月裏張伯倫先生所遭遇的窮境永不會發生，如果我們在較早的時候能作冒險的準備。例如，一九三一年我們拒絕了史汀生先生非武力對抗日本的建議，這種對抗可以採取與美蘇聯合經濟援助中國之方式，以後或者採取排斥日本貨的方式。如果在一九三一年英美蘇便能合作，中國必會運用這種對抗，使日本六年後的進攻成爲不可能，而一種對日本的嚴重的制裁，使蘇俄變成更可怕的制裁，會使歐洲的極權國家更當心一點。我們是否仍了解「和平不可分」這句話的意義，實是個疑問。與美蘇聯合以經濟援助中國必定不致使倫敦受轟炸，即使日本對大不列顛宣戰，美蘇亦必會立刻有同樣的遭遇。然而當時我們并不要這類的舉動，我們的保守黨都是親日的，同時約翰西門爵士率直的與粗忽的拒絕美國的建議，大大地得罪了胡佛政府。日本的侵略沒有遇到有效的抵抗，這個事實無疑的鼓勵墨索里尼（他確曾這樣說）於一九三五年向國聯及大英帝國挑戰。他在這個當口之獲得特許，直接地鼓勵希特拉從事攻擊，第一在來茵省，後來，與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半島；然後在奧大利；然後在捷克。我們往往爭辯說我們無權力對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這類行爲作反抗。但是且不談上述種種可能的較大的戰略，倘若亞比西尼亞是英國領土，則墨索里尼便連作夢也不會夢到攻擊它。這就是說，單是英國的權力便足以制止義大利的侵略，如果英國的權力

能明顯地用於防衛國聯盟約有如它用於防衛英國領土一樣。如果英國在一九三五年說：「我們將保衛盟約（即指亞比西尼亞）有如我們防衛肯雅山一樣」，其不致使倫敦受轟炸，一如我們明白表示保衛肯雅山之不致使倫敦轟炸。但是因為墨索里尼不相信我們會以保衛我們的領土的同樣精神來保衛國聯盟約，他成功地攻擊它，暫時毀壞它，並使他自己在地中海的地位大大的加強。

他以亞比西尼亞事件向歐洲挑戰的成功，鼓勵他侵略西班牙半島。如果那個時候我們肯讓普通的國際法見諸實行，容許西班牙政府獲得它在防禦上所必需的物資，這種行動是否便會引起義大利轟炸倫敦，實是個很大的疑問。當巨大的海盜行爲最後刺激英國行動時，如在尼安、墨索里尼結果退却了。因想維持我們在西地中海的軍事地位，而容許西班牙政府運用通常的國際法以獲得驅逐侵略者的工具，這種冒險只是一種小冒險而已。但是我們不這樣做。不維護那個會幫助西班牙反抗義大利侵略者的法律，我們的政府，與艾登先生決裂，却玩弄使義大利與德國分離的把戲。德國的答覆是吞併義大利。我們不便幫忙義大利來制止這種行爲，義大利只好爽快地接受。德國的地位現在大大的增加，而義大利的屈服却肯定了。德國覺得它有理由要求，以戰爭威脅來要求，捷克退出反抗德國霸權的集團，並取銷與俄國的種種協議。

我們讓步了，而非日耳曼歐洲的防禦制度也消滅了。如今與極權國家作戰這個真正

的危機到來了，如果英國有所主張，則倫敦必會被毀，其原因是沒有這種危險時英國並沒有表示。

雖然大家有這個憂慮，在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五年實行集體反抗會否真正引起戰爭，是無人敢下一斷語的。我們所能完全肯定的是，恐懼戰爭並不是那些提倡與擁護我們現行政策的人之主要動機。那些擁護政府政策的人會很坦白地一再宣稱即使一九三一年對日本侵略的反抗，一九三五年對義大利的侵略，對意大利與德國的侵略的反抗，能夠不動干戈便獲得完全的成功，這種反抗也不應該有，因為，在他們看來，日本勝利比共產主義的中國勝利好，義大利吞併亞比西尼亞比日內瓦獲得成功好，佛朗哥因德義的幫助而獲得勝利比傾向社會主義的西班牙政府獲得勝利好。

我們的政府不必麻煩來隱藏它的默許侵略的見解，並不是因為反抗侵略即等於戰爭，是因為它的擁護者，也是它的政策的代表人物，曾一再公開的宣稱他們贊同侵略者的政策，不贊同受害者的政策，寧願侵略者勝利不希望被侵略者勝利，因為反抗所產生的聯合（如與蘇聯的聯合）比侵略者的勝利更使人不愉快。回想起大部份政府黨人，如西門爵士這類的閣員，對中國，亞比西尼亞，西班牙之被侵略所採取的態度，沒有一個具有一點信仰的人能夠反駁上面的說法。甚至在劇變的最後的悲慘日子，與蘇聯坦白公開地商議採取共同行動這一件事，惟一可以使侵略者理解，沒有它便不能裝腔作勢的事——

也被阻止至最後一分鐘，時鐘就要鳴的時候。如果政府在九月廿八日星期三宣稱與蘇俄合作是個聰明的舉動，則它能在數星期前這樣宣稱將會更顯得聰明，更有效；如果能在劇變發生前宣稱則更好了。

當我正在寫以上各節時，報章上滿載主張舉行一新世界會議以解決國與國間的經濟的，領土的，政治的爭執之文章。然而世界大戰以後，我們眼見舉行的不止一個或兩個會議，却是十餘二十個的國際會議。經濟會議，解決政治爭執的會議，裁軍會議。作為根本解決糾紛的辦法，這些會議大都不是無結果，如長期的裁軍會議，便是它的結果化為灰土，如產生條約的會議。

這并不能證明會議這個方法是錯誤的，正如國際聯盟制度的衰弱之并不能證明這個制度是錯誤一樣。種種會議之失敗，是因社會一般人并不清楚使它成功所需付的代價；并不十分明瞭一種事實，即如果我們需要和平與安全，我們必須作相當的犧牲，盡相當的義務——人生每一件可貴的東西都需付這樣的代價。

根於上述的理由，以為我們可以用修正領土的辦法獲得和平，這種思想是十分危險的。上述的理由指出爲什麼修正領土，甚至在某些場合是適宜的，也不能給我們和平，它所產生的結果，有如它在世界大戰以後所產生的一樣，最後必定帶致不幸。

如果現在任何負有修正凡爾賽條約的，穩定經濟，及建立安全制度的使命的會議，

它們希望成功，必須使羣衆了解這些使命。羣衆必須相當明白不這樣做便有什麼結果，相當了解爲什麼這個救濟方法可以成功，爲什麼別的辦法必定失敗。否則，以前往往如此，真正的救濟方法會遭拒絕。如果那些需負責實行上述方法的人。不相信這是逃避不幸的方法，拒絕運用它，則上述方法亦很難尋出逃避之道。

這是一個被人奇異地忽略了的問題。我們似乎表示祇要有人能找出治病的方法，我們應立即明白它是能治病的，并採用它。我們要有領袖并請求領導，但是如果那個領袖指出的正確方針恰好是羣衆真正相信是錯誤的，他們會立刻宣稱他不是領袖，是帶大家入歧道的人。結果民主國家的領袖是那個人，他以最生動的方法來表露現存的信念，佔據「羣衆心理至一種不平常的程度」。

怎能不如此？羣衆的信念（即是，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來組織這個世界是可求的）是真誠的信念。我們知道，這些信念有時是大錯特錯的，然而它們同時也是萬分誠實的。我們可以相信一個民族并非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偽善地與不誠實地支持某種主張。但是，全數國家一代一代地支持一種托辭，爲的是使它們自己貧乏與喪失他們的財產，這是不可思議的。國家主義，重商主義，保護貿易主義以及所有其他的謬論，使歐洲受苦并製造紛亂局面的謬論，都是羣衆所真誠擁護的謬論。在羣衆看來，這些都是真理，否認這些謬論的先知會被石打。

因此領袖們對我們并不能有很大的幫助，如果他們只領導我們更有力地更快地往錯誤的方向走。先知們所能幫助我們的，是他們能夠指出羣衆所真誠地擁護爲真理的誤解，實際上並不是真理；因此使羣衆能夠理解正確的道路。

考查以往的錯誤，無論在凡爾賽或其他的會議，都表露這個奇異的事實——我們之所以陷於錯誤，并非因爲我們缺乏技術上的知識，是因爲我們不能運用爲一般人所佔有的知識於國際政策，不能了解近在目前的事實的意義。（當千百萬人決言凡爾賽條約的不平等是今日的紛亂局面的唯一原因時，他們沒有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際，歐洲並沒有因一種凡爾賽條約而受苦）

本書所討論的就是這類的簡單的事實。

有如以前的悲劇一樣，這個危局的悲劇之一，是盲求和平與正義的羣衆企圖把握問題的困難的與複雜的一面（平常人不夠知識來討論的一面，質言之，并非重要與有關係的一面）而忽略了重要的與有關係的一面，同時也簡單的，在俗人的能力所能了解的範圍內之一面。

就報章上對於捷克問題的討論來說吧。主要的與簡單的主張一天一天的爲一堆次要的與較困難的見解所掩蔽。十封信中有九封，十篇社論中有九篇，是討論德國人與捷克人所提出的敵對的要求之是非曲直的。經過僅僅幾天的注意，領袖與作家們便突然對一

件非常複雜的事情，加以判詞，而這個判詞却與學生研究此問題的學者所下的不同。他們告訴我們如果捷克人作這種或那種讓步，我們應當支持他們；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則我們不應支持之。這類的討論最後引我們至這個境地：在英法的「不可抵抗的壓力」之下，捷克人已讓步到不成一個國家，并使他們的國家受德國的支配。結果匈牙利人與波蘭人（很自然地從國家主義者的道德立場）提出同樣的要求。這些外行的判官然後完全轉過來。這是太過了；我們應該支持捷克。於是，我們不冒戰爭之險以保障捷克的防禦與生存的權利，使它在德國報章所謂「刑罰」之前獲得申辯的機會與公平的審判，却爲了防止數十萬匈牙利人返回匈牙利，波蘭人返波蘭而戰爭。

許多論文，尤其泰晤士報的社論與致編輯者的信，真像假定上述的問題是其爭端。我們有許多書籍探討以往的歷史，凡爾賽條約的錯誤，長篇大論的討論波希米人是否確是日耳曼人；瑞士的分縣制度是否對。以及許多類似的問題。

即使這些事情真成一種爭端，一個民主國家亦永不能對它們下判斷。它不是凡人所能了解的爭端。它們是高深的技術上的與困難的問題，它們需要專門知識如地域的歷史，人種誌上的細目，有關政府的先天的特點與能力以及千種不是凡人所能了解的考究。這些事情誠然永不是真正的爭端，使萊茵區以東的最後存在的民主國家完全隸屬於納粹霸權，這件事可以充分的證明。

但對於真正的爭端，一個民主國家是能夠下判斷的，如果它還有一點社會的見識，或感覺或本能。這個爭端是：

大國與小國間的爭端應否由大國的武力來解決？兩個訴訟者的較有權力的一方應否只因爲他有優勢的權力而作唯一的判官，并以戰爭的手段來強行他的判斷？

這是捷克的爭執自始至終的主要爭點，也是國際秩序被否認，最先由日本之侵略滿洲，然後由義大利之侵略阿比西尼亞，德國之侵略萊茵區，德義之侵略西班牙，日本再次侵略中國等的主要爭點。

事實是，如果我們不能合作以反抗施諸他人的無法無天的暴行，則結果我們自己必定成爲它的犧牲者：我們既然沒有盟國便不能防衛我們自己，則我們必將變成毫無防禦，如果那些必需的盟國一個一個的被毀滅了——這種真理可使凡人了解，因爲它是有組織的社會過程的——內容只有一點不同的——一部份，這是他所熟識的。論及他自己的國家的正義與安全的機構時，他這樣爭辯：「我不能決定這個或那個人是否有罪；這是判官與陪審官的，法庭的事情。但是我們知道他得到一個公平的審判是我所關心的，暴行，即使加諸我不相識的人，亦必須制止」。

倘使我們的公民教育，民主政治教育，走上正軌，則羣衆必會比現在更清楚的知道在如此危局中應支持何種政策，俾能達到它的最大目的。

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和平，防止戰爭。因此，很明顯的，第一個任務是不要確定一個困難與錯雜的問題之是非曲直，而是堅決地支持一個簡單的論點，即是不應用戰爭或戰爭的威脅來解決問題。無論暴行的犧牲者是中國或亞比西尼亞或捷克、我們都應該說：「我們不願作爭訟的審判官，只要作一個理論的判官，即兩國間的糾紛不應由強國的武力來解決」。對於上述每一個糾紛，我們都該對較強的一方說：

總之不要戰爭。我們主張對你的要求作充分的調查，完滿的討論，同時將使較弱的一方明白我們幫助他，是假定他願意對此事作充分考慮，并使此事能更易獲得公正的解決。

倘使我們會十分肯定的說，暴行，一方的優勢力量，不能解決糾紛，則調查，和平解決之路許已打開了，但是苟以爲他的要求是對的強方，不確知我們是否支持弱方，則他當然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以武力來實現他認爲正確的主張，在他看來是對的。保衛弱者，是和平的與公正的解決力量懸殊的兩方重要的糾紛之必要的方法。

然而對於我們最後要調處的一大串的侵略行爲，沒有一次我們會這樣說過：「不要戰爭。不要用武力來解決」。在每一個場合——日本、義大利、德國——正當糾紛已達危亂的階段，強者的武力走向決定的道上時，我們並不忙於反對使用武力，却忙於判決這個糾紛的是非曲直。我們提出這樣的理論，即一個弱小爭訟者之能否獲得保衛以抗拒強大的爭訟者的暴行，需視我們判決、匆匆的判決，這個弱小爭訟者是否理直。

要認識這個社會的理論之不公平與不能行，無意義與必歸失敗，并不需要一種專門學識，無論是人種誌上的邊陲或軍事上的因素。它只需有一種對於組織人類社會所必須遵循的方法——欲使社會繼續存在不致發生衝突與磨擦所必須採用的方法——之普遍的理解，一種每個公民都應具有的理解；如果我們的社會教育獲得合理的指導，則這種理解是可以有而且會有的。

把蘭西曼送到布拉格，在理論上，在戰術上與戰略上都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明白宣稱我們主張充分調查蘇台德事件與德國的要求；主張求得它們的公正的解決，同時應該勇敢地採取有效的步驟，以觀察予弱者以與強者平等地位，予前者以有效援助等辦法能否獲致公平的解決。予上述的任何糾紛以援助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準備與俄國合作，并把抵抗暴行這個問題視作不可分的。倘我們予中國與西班牙以援助，便已援助了捷克。我們對於捷克與西班牙這類的糾紛，以及它們的軍略上的重要性，應該有所研考，當我們于一九三二年很意外地拒絕了史汀生先生獻議的外交上的合作；當我們於一九三五年很熱心地放棄了制裁，並且（寧讓艾登先生辭職）于一九三七年轉過頭來與義大利作如此可恥的磋商。當捷克的危局已隱約可見的時候，我們不應如此明顯地忽視了蘇聯。單憑這個事實，便證明我們并不鄭重其事！證明我們準備犧牲那個可以抗拒暴行的唯一方法。

現在要重走我們的路已經太晚，而且局勢也已不可救藥。但是既然如此，則現在來整軍也是太晚了——除非我們的整軍真的爲了增加防共協定的力量。

然而我們不能知道極權國家在最近七年的作戰中已否勝利。某種幸運的事件，一個獨裁者的死亡或其他意外的場合，許有回復原來局勢的機會。如果有這麼一天，由於一種對於爭端的了解，我們應該準備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把若干修正與我們所珍視的權利或利益的有效保衛聯合起來；把這樣的保衛與和平聯合起來；作具體的論斷而不致把我們自己——且勿論把西方文化——更置諸那些具有與我們不同正義觀念的人的權力之下。

問題的一方是政治的而另一方是經濟的。關於政治問題，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即我們已處於一種危境，只有集團保衛的辦法才能拯救我們。我們將立於平等的地位與德國談判，如果（a）英國及歐洲的海岸國能聯成一個防禦的單位；（b）確定與蘇聯合作；（c）四萬萬中國人造成反抗侵略的一部份力量；（d）極權國的權力的生長被阻遏，同時提出一種不致使我們的城市滅亡的主張。

關於經濟問題，我們必須準備向我們要反抗他們的暴行的人提出獲致昌盛的和平方法，與他們的強暴方法一樣有效的和平方法。我們不單須準備把我們從屬的帝國平等地向他們公開，並且在建立「民主國的防禦同盟」當中，我們必須使它成爲一個從經濟立

場看來是值得參加的聯盟。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面論及。我們需要首先研究它的成功所必需的政治條件。

## 第二章

### 經驗能否使我們獲益？

擴軍可以防止侵略，但亦有辦不到的時候，有如上次大戰所證明的。這種失敗將會重演，除非我們比以前更充分的研究「國際迷夢」裏面所提出的論點，尤其關於（一）運用權力之方法，如果我們想使權力成爲一個防止侵略的有效的工具；（二）與德義日解決糾紛時所引起的關於原料，殖民地，擴大人口等問題；（三）合作制度，底子裏是集體制度與聯盟；（四）經濟復興；（五）關於「國際迷夢」的迷夢之註釋。我們的國家如今在停戰的種種準備，其規模之大，是它的太平時代的歷史中前所未有的。

這不單是陸海軍的問題。全國人民都被牽進這些準備工作中。因爲我們知道如果戰爭暴發，我們的都市的稠密的人口將會遭遇與廣州，巴塞羅納，馬德里，阿爾美利亞等都市的人口的同樣命運。我們學習如何爲兒童們裝備防毒面具。防空壕許比我們的家安全；我們的士兵比我們的小孩們安全。

在這種備戰的過程中，我們的經濟生活改變了。我們已達到一種境地，在這種境地中，我們發現我們既不能繼續過目前這種標準的生活，因為納稅人的担負重了，亦不能停止過這種生活，因為這種備戰的局面會產生失業的危機。我們在把金錢消耗於防衛的備戰費上，這筆費用如果仍像最近幾年這樣繼續增加，則它不是使納稅人陷於不堪擔負的境地，便是把人們的儲蓄全數徵用。這種收用不會是直接的，也不會用徵收這個名稱，但事實是如此，其遭遇與上次大戰後那些以年金度日者，大陸交戰國的中產階級的一樣。爲了不生產的目的而不斷的借債，結果必使通貨膨脹，由於減少了英鎊的購買力（如減少了法郎的及其他大陸國家的貨幣的一樣），因而也會減低了固定收入者的收入之真正價值。

我們之所以採取這些政策，是因爲——明顯的——我們相信擁有巨大權力，根據最後的分析，是防止侵略的最可靠的唯一方法，同時相信如果夠大的話，權力本身便是一種防止物。我們一面建立我們的權力，同時却對我們可能的敵人取妥協的態度；這一種態度不單表現於解決特種的與可辨別的糾紛，如結果產生了英義協定的糾紛等，它并且拒絕反對那些一兩年前不惜以海陸軍作戰的事件；那些事件如他國與我們簽訂的莊嚴條約的撕毀，射擊英國大使或官吏，擊沉許多英國的船艦，殺戮與淹斃英國水兵等；默許異國在全球各地參加反對我國的統治權的革命運動；默許人家爲了佔領軍略地發動侵略

，而這種佔領明明是企圖削弱我們在戰爭時的防禦力量。我們把所有這種不斷增加的屈服加諸我們的在增加中的軍備。

我們還能作什麼來保證和平呢？約翰史密士說。

但是一切有關的經驗，尤其是那個最顯著最悲慘的經驗，世界大戰本身的經驗，警告我們權力與屈服都不足以保證和平；除非還增上別的東西，它們是不能防衛我們，維持和平，防止侵略的。

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這一點，因為在大戰時，我們與我們的盟國擁有巨大的力量，也許比我們希望再有的力量還要大得多。站在我們這邊的不單有法國和比利時，而且還有俄國，日本，義大利，羅馬尼亞與美海陸軍力。最後的勝利證明了這邊是優勢的力量。然而那種優勢力量既不能嚇阻侵略者，也不能防止戰爭。亦不能有效地防禦百萬我們的人口免於滅亡，商業不致消失，或防衛現陷於很危險的境地之政治的獨立。最後勝利並不使我們安全，否則我們現在，勝利以後，便不致於揚言我們比任何時期都不安全了。

優勢力量爲什麼不能達到目的？

歷史家曾答復這個問題，而這個答復又是十分簡單。優勢力量并不防止侵略，因爲那個想像侵略者不知道他須對付這種力量。差不多所有的歷史家都同意，以爲如果德國知道繼續採用它已採用的政策的結果，必會使這些力量結合起來反抗它，則它便不致採

取這個政策，於是便不致發生戰爭。

「攻擊」誠然不必指真正的侵略。自諾爾曼戰爭以後，我們并不需靠我們的土地與外國軍隊作戰。但是我們曾被捲入許多戰爭漩渦中。德國人並沒有於一九一四年提議侵略英國（他們十分希望使我們不參加戰爭）；日本參加戰爭時，他們亦并未侵略它；未侵略義大利；未侵略羅馬尼亞；美國參戰時，德國軍隊也未有威脅在紐約登陸。但是，雖然它們的本土沒有受直接的威脅，同盟國都認為德國在採取一種政策，如果繼續下去，將會危及它們的安全，它們的利益，它們的權利；這種政策必須反抗。

幾年前一位美國海軍總司令對筆者說：「倘使一九一四年我們的海軍力量比當時大一倍，德國人便永不敢作戰。」但是如果一九一四年的一二十年前美國便大大的加強了它的海軍，則最受騷擾的不是德國，却是英國。因為美國爲了海上權而與之發生最激烈的口角的國家不是德國，却是英國。海上權的爭執曾使英美兩國發生一次戰爭，并且差不多有好幾次快要接近戰爭。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美國的強大海軍，促成英美海軍敵對的強大海軍，當然對德國的侵略沒有防止的效力，并且許會直接的鼓勵了它的侵略，因爲它有一個印象以爲英美間的再次爭執——以往曾使它們戰爭的爭執——會使英國語的國家的力量抵消。

這是非常明顯的，一種力量，無論如何大，也不能防止他國採取行動，除非那個國

家知道行動的結果將使它必須應付這種力量。「倘使同盟國事先聲明它們會採取後來它們所必需採取的行動，則它們便不致要採取行動了。」

我們從那件事情所得的教訓太少了，我們視為有力的敵人如今不知道我們的力量是要支持抑或反對他們所採取的政策；不知道英國會與俄國併肩作戰以反抗德國或日本，抑或袖手旁觀；抑或援助德國與日本（是經濟援助抑善意的中立）或成爲兩國的真正同盟國以消滅俄國共產主義；抑或不再作法國的同盟國，如果法國採取一種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策。

沒有一個與德國人詳談過的人不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許多有勢力的德國人都十分相信在未來的戰爭中，在俄國會牽入漩渦的戰爭中，英國會站在德國這一邊；如果法國政府愈來愈左傾且更接近莫斯科，則在法國被攻擊時，英國將會拒絕援助它，因此，德國可以征服法國并消除它作英國的盟國的資格。但是我們的政府曾屢次宣稱 無論英國單獨的力量如何強大，法國一朝被征服，英國便不克防衛自己。

如今這些德國人的信念許是全無根據的。他們相信，有如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所相信的一樣，英國不會決心參戰，直至局勢已成，想改變亦來不及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信念都是錯誤的信念，對於我們的和平是種致命傷，一如一九一四年的同樣的錯誤信念。

苟這混亂的目的，政策，企圖仍然存在，則無論我們的力量如何之大，也不足以防止他國採取一種使我們最後不得不反抗的——有如我們在一九一四年，美國在一二年後，不得不反抗一樣——行動。

一個國家的安全之有賴於它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即是，有賴於對以下問題的答復：「當開始開火的時候，誰將站在它這邊，誰反對它？」——最少如它之有賴於它的海陸軍源一樣。而誰將支持，誰將反對，則有賴於政策之決策。

但是人們仍有一種逃避這個明顯的事實的奇怪趨向，關於飛機或子彈或某種巡洋艦的若干缺乏這類事情，很容易引動廣闊的羣衆的興趣。但是同一的羣衆，對於一種國際形勢的改變，許會使整個海陸軍由我們的防禦陣線移到有力的侵略陣綫的改變，却并不感很大的關懷。

然而還有一點是需要說明的。

對於這一個問題：「世界大戰能否防止」？勞佐治先生答稱「可以」，并且告訴我們（如大多數歷史學家告訴我們一樣），如果德國事先知道它的政策會引起反抗，它便不致採取那個政策，而戰爭便不會發生，他是對這種情勢作一個不完全的說明或解釋。

假使德國預知那種反對并說：

「你們——英國、法國、俄國、美國——有優勢力量。德國是在你們支配之下。世

界上這種力量分配的辦法，將予德國以何種的將來？它是否使廣大的土地更與我們，我們的移民，我們的商業，隔絕？使我們的必需的而又只能在你們所統治的領地內獲得的原料與我們隔絕，或者由你們任意施與、以你們所能統治的價錢出手？

對於這個德國戰前提出的問題，最後變成大同盟的「非日爾曼國的合體政府現在會如此答復（後章所舉的關於戰前的主張的例證更可以說明這點）：

「是的，你所說的土地是屬於我們的，我們的統治權是不必疑問的。我們高興怎樣支配它們便怎樣辦，我們規定我們喜歡的課稅，立訂似乎對我們有益的移民律，建立種種於我們有益的專利權，不管它們對於你是如何的不利」。

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會做了些什麼？它會做了最近六七年在做的事情，並且比在環境下做的更容易。它不會在一九一四年那個當口宣戰（和平條約簽訂以後，德國或日本都不會對任何地方宣戰），它將回頭去找大同盟的盟國，與它處境相同的，處於「無」的國家的地位的盟國，并向它們提議採取共同行動以挽救這個共同的不利。

種種事件證明使大同盟的盟國分離並不困難，日本和義大利以前都是大同盟的盟國，如今却變為德國的盟友了。如果現在，慘敗的二十年以後，德國許比一九一四年還強大，我們沒有理由假定它不能恐嚇或誘惑同盟中的「無」的盟國，把同盟逐一毀滅，事實上它已如此做了。

換言之，唯有獻議德國一個可以和平獲得生活必需條件的辦法，大同盟始能團結并防止德國採取侵略行動。因為得不到獲取生活必需的條件之和平辦法，它必定採取以武力取得的辦法。我們也會如此做。

這種獻議不在世界大戰前提出，不在和平時提出，此後亦沒有提出，因為我們在一九一四年相信，現在仍然相信，提出這種獻議會置本國人民於一種不堪的經濟的境况，或者最低限度要求他們犧牲，而這種犧牲，是身為他們的利益之保管者——本國政府——所不應要求的；我們相信我們須於兩者之間擇其一，即是異國人的經濟福利與政治的安全，或本國人的經濟福利與政治的安全，而我們的第一個責任是為本國人服務。

這是本國有勢力部份的人以前的與現在的見解，繼之而至的引證（無限的增加的引證）說得明明白白，沒有一點可疑之處。這是一種我們慣於避免討論它的含意之辯證，因為我們覺得如果對之作清楚的與深切的討論，則它們會顯露出現存的一種不可制與難解決的矛盾。如果這是一種真正的辯證，則是說戰爭不可避免了。結果我們必致對戰爭生前所未有的憎恨與恐懼。

於是我們避免對這個雖是最終的也是簡單的理論作坦白的討論，我們覺得如果揭示了它，將使那個我們不能渡過的深淵暴露出來。於是，我們似乎說：讓我們忽視它，假作它不存在吧。不要再討論那個糾紛的最主要的原因，讓我們變成難堪的友善吧！拒絕

批評我們有力的敵人的任何行動，即使這種行動明顯地會使我們將來無力保禦我們自己；甚至伴稱他所作的罪惡不是罪惡。然後，如果我們維持一種友好的空氣至相當長久的時間，則這些深的但是未提及的與不可道的衝突將會自己解決。

這甚至不是一個黃梁夢。因為被逼對常常在增長的，愈來愈可怕的罪惡一再微笑與保持緘默，並不是一件樂事。

我懷疑我們是否明白今日的局勢與三十年前引動我寫本書的局勢是如何的相似。以前，一如今日，我們恐懼戰爭；以前，一如今日，德國是產生戰爭的唯一源泉；以前，一如今日，我們武裝與尋求與國以及建立我們的力量，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前，一如今日，我們與德國的盟友，義大利，進行（或不久進行）不大可稱譽的磋商，在這些磋商中，爲了要義大利脫離柏林軸心，我們犧牲了第三者；以前，一如今日，在戰爭之前我們畏避那種公開明白的義務，寧使我們的「盟約」與我們的諒解變成含糊的與無所可否的；以前，一如今日，我們相信防止戰爭的唯一的，自始至終的，真正的希望，是建立我們自己的力量，不必憂慮其他；以前，一如今日，我們零星的努力於和緩工作及與德國修好，並致力（成功地）於解決「特種」糾紛如摩洛哥的與巴格達鐵路的爭訟（作爲未批准的英義條約的二十二件公文之題目之論點。）

這一切的結局是戰爭。

歷史是否重演？

我們以前所採取的步驟，包括防禦的武裝，（關於需要防禦的武裝一點，本書作者會極力主張），一直都是好的。然而它們失敗了，因為我們沒有研究整個糾紛的基本因素。我們避免解決它，因為我們認為——錯誤地認為——它是代表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一個「不能抑制的衝突」，最好是置之不理。

現在本書的主旨，是在指出這個阻止我們向德國以及其他國家提議可以和平獲得的事物——否則它們便會因之而戰（結果無所得的）——之信念或成見，是一種謬誤的信念；以為只有犧牲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之道，我們才可以滿足他人的需要，這個說法是不確的；這不是一個重新分配領土或「財產」的問題，不是重新分受世界有限的財源，他們得了我們便失了的問題。本書指出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的，為未經調查的假定所支持的，戰前與現在都成為簽訂可以保證永久和平的唯一條約之障礙物的觀念，大部份是謬誤的，我們的政治思想的「巨大的迷夢」。

指出「戰爭得不償失」，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而且這句話并未正確地說明這本一部份曾經複寫的書的宗旨與目的。它辯論「征服」得不償失，但是我們既然都在武裝並且會於被攻擊時作戰，則是我們大家都相信，從防衛的意義說，戰爭是有利的。在以宣稱「戰爭得不償失」為時髦的今日，差不多每一個人却相信那些必然引起戰爭的政策是有

利的。每一個國家真心希望和平；同時所有的國家都採取那些結果必使和平成爲不可能的政策。

所有的國家在理論上都願意責備整軍，經濟的國家主義，國際間的疑惑或不信任，但是每個國家都單獨地致意于整軍，增加課稅，發明新式的經濟的國家主義，並且堅主一種絕對的國家統治權，使國際的秩序不能成立，並不可避免的延長了無政府狀態及紛亂的局面。

這不是僞善。戰爭無論如何勝利，總是象徵滅亡，總是獲得同樣的不幸的與難靠的結果（尤其對於資本家是如此，他們被指爲對戰爭的罪惡需負特別重責的）這個說明是太明白了，太無可逃避了，使人們不得不企圖說它是不確的。我們的解釋是羣衆的思想並沒有把握政策間的關係，這些政策在表面似乎是合法的或有利的，而它最終的效力却是戰爭與紛亂局面的原因。問題並不單在於指出「戰爭得不償失」（即是說，不是有利於我們的國家，也不是防衛它的利益與權力的有效方法）並且要指明爲什麼我們所採取的，并信以爲有利的政策，必定引起戰爭；尋出我們所以採取那些政策的原因，並創造反對它們的意志。這不是一個創造和平意志的問題，因爲這種意志早已存在；而是要找出爲什麼這種意志歸于失敗。

我們必須瞭解一個國家爲了替自己的統治範圍增加幾方里的土地而冒世界戰爭之險

的原因。因為苟這個現存的價值的估計仍是千百萬人所持的估計，則戰爭將隨時可發生。除非我們明瞭我們在那一點上並且怎樣引致不是我們所要的，不是我們所希望的结果——直至我們對於此問題有一個理智的了解——世界各國，在真心憎恨戰爭之際，許會繼續採取結果必產生戰爭的政策，而作為戰爭的準備者的無政府狀態於是發生。

誠然，首要的問題不是「阻止戰爭」，如一般救火隊之尋求滅火之法一樣，首要的問題在找出妨礙建立一個國際性的可為的世界之原因。這個國際性的可為的世界在干若點上可以免除現行政策所創造出來的緊張局面，人們企圖用戰爭來挽救的緊張局面。只有我們在這個意義上成功了，我們才可以防止戰爭。

「國際迷夢」（它的副名是論武力與國家利益的關係）並不是完全或大部份討論「戰爭是否有利」這個問題；它並且討論各國採取的政策的基本理由，追求權力的基本理由，是否正當；優勢的國力是否「有利」，對保證政治的與經濟的安全是否有效；吞併是否有利，真正增加了一個人民的財富；貿易能否因優勢的海陸軍而增進或轉移；當我們談及我們的海軍「保護我們的貿易」時，我們真正的意思何在；現代世界的財富與資源是有一定的與有限的數量，任何一部份被一個國家奪取了，便是他國的損失，於是使戰爭成爲「麵包的競爭」這個說法是否對，抑或是可用的財富的數量是決定於產生財富數量的合作的效率；這種合作的效能是否不會因戰爭的準備所必需產生的國際形勢而大

量減低；在組織這些合作當中，武力的真正功能是什麼，它的社會任務的條件是什麼，在那一點上它變成自取失敗與反社會；換言之，我們怎樣可望使權力有效的保衛文明。在最後的分析中該書的目的是這樣：

研究那些使各國採納一種失敗的防衛方法的假定；并用現代世界的明顯事實來證明那些假定的謬誤。

獲得防禦是如何的重要一問題，必須包括我們所要防衛的是什麼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包括生命、文明、社會秩序等的防衛，以及道德的自由，文化的財產，團體，政治獨立等的防衛，至如何程度。

這個特殊的研究使本書與我們目前的問題發生關係。欲明瞭上邊所提出的事件，必須明瞭世界集團之所以不能更有效地討論像中日衝突，義大利在非洲的侵略，以及明天德國許會實行在歐洲作更進一步的侵略等危局。如果這些論點不單是對「戰爭得不償失」這個提議作含糊的同意，并且真正的進入羣衆的意識中，則大部份使我們困惱的紛亂局面，必定可以避免。目前的解決方法與它的後果，似乎把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國際迷夢」所指出的錯誤大部份合併在內。但是這種政策爲一種輿論所堅持（許多證件可以說明政策的若干不切實的要點之所以構成，並不是因爲政府或真正的條約起草人相信它們是可實行的，是因爲輿論要求它們）而這種輿論却誠實地希望消滅戰爭，并爲戰爭而担

憂；這種輿論十分真心地宣稱它之所以成立這類條約是要使它成爲結束戰爭的戰爭。這確是一個時髦的口號。無人再要求戰爭。無人相信戰爭有利。然而我們的行爲證明人人都要吞併新土地，要經濟的自給自足，優勢的力量，軍略的邊陲，國際間的無政府局勢的繼續存在——即是，實行產生上次世界戰爭的政策。我們許并不相信戰爭有利，但是很明顯的我們相信吞併土地是有利的，使鄰國貧弱是有利的，尤其擁有力量是有利的。在我們的政策裏面，我們看不見有一點表示相信我們的昌盛有賴於我們鄰國的昌盛，我們的經濟的安定只有從國際的合作中獲得，而這種合作必須以權利平等爲基礎，必須繼續使競爭優勢力量的舉動成爲不可能。

爲了使論點正確并指出這個討論與現行的問題的關連，讓我們預想一下，并看一看這個論點究竟是什麼。

三十年以前，作者曾向他一代的，戰前一代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爲什麼與德國有這樣的衝突，很可能引起戰爭的衝突？這種衝突是起於那一個主要的爭點？」

答復雖然有各個不同的形式，但大部份等於一個答復，可以故利奧馬克司以下的話作它們的摘要：

「德國必須擴充。每年百萬的嬰兒在哭求更多的地方……它需要加拿大的麥

，澳洲的羊毛、這些，我們不能時常重提的，不只是一種惡嫉的貪婪，而是一種嚴重的需要。然而這些資源是屬於我們的，是我們的繁榮所必需的，因此，我們，身為它們的保管人，必須把握着它們。為靈活與土地的競爭，與一千年前驅使條頓民族一批又一批的渡過萊茵區與阿爾卑斯山脈的同樣的競爭，如今再次成爲一種威壓的力量。適宜於容納德國過剩的人口的殖民地，是德國最大的需要，……這是一種重要的麵包的競爭。這不是對於這個局勢的一種主日學的見解，而是真正的見解。

這種對於事實的解釋，並不限於政治圈內的右派。社會主義者柏列特福採取同樣的見解，並且繼續指出，如果我們接受了「未來戰爭是一種麵包的競爭」這個前提，則用妥協或建立任何法律的方法來解決這種競爭，是沒有可能了。他說：

「德國爲什麼攻擊英國？因爲英德是商業的與政治的敵人；因爲德國妒忌英國現在擁有的貿易，殖民地，以及帝國……關於仲裁，限制軍備，我們不必盡很大的想像力便可以用德國人的眼光來看這種提議。如果我是個德國人，我會說：「這些島民是冷酷的主顧，他們把全球的最好的部份圍起來，他們收買或奪獲五洲的堡壘口岸，他們對於運輸業有實際的專利權，他們握有制海權，而現在他們提議我們所有的人都該成爲兄弟，那一個人都不能再打仗或盜竊」。

在以下的幾頁內，我將舉出一整堆當時的類似的引證，以表明這兩位作者所發表的主張實際上是普選的主張。

今天把種種引證排滿這樣一本書是可以的。那些引證表明政治家，權威作者，編輯者，各種評註者，對於那些陳述現今糾紛的根源的——似乎要使英德再次衝突的糾紛的根源的——記載會字字同意。

舉兩個模範的例子吧，兩者都是美國人，因此更加值得注意，因為他們所採取的政策是不同的。

「打破抑制他們的經濟活動的封鎖，是德國與義大利的，也是日本的，生死關鍵。因為，除非打破封鎖，將來的結局只有物質的不幸與政治的革命，……使饑餓者的真實的境况更難堪的，是那些今日獲得飽暖的人，他們的佳運是因為他們昨日是惡劣……當墨索尼里告訴全球義大利必須擴張或攻擊時，他是用暴行將臨的警告方式說明的，而現已消失的自由義大利的發言人進兵羅馬很久以前，也發出同樣的警告。」

「國際聯盟本身代表一種組織與管理各國生活的企圖。它想排除生長并忽視滅亡。它接受那個為無數戰爭所造成且顯露出無數不公道與不平等之世界地圖，并把它作一種永久和平計劃的根據……」

「常義大利的，德國的與日本的人民歸結說，在目前這種條件下談和平，在他們看來，比戰爭還可拍，唯有戰爭可以修改這些條件，于是日內瓦的遊戲完了，各國開始找伙記并作另一個跳舞的準備」。

利蘭德斯托先生，一個國民新聞的外國通訊員，他深知歐洲與歐洲的輿論，在一個美國商人集會裏這樣說：

「墨索尼里之武裝全國人民，並且對他們宣傳與遣使他們向那些只能用椰子回擊的人頭上擲彈，這種舉動固然是可怕的，但是在我看來英國政府也要負嚴重的責任，因為它在全球所佔有的東西比它所需要的還多，它受委託管治巴力斯坦，在上次大戰奪取了伊拉克作為戰利品，并佔有了大部份德國的東非殖民地，而直至現在，它從未提議讓出甚至一千里地來滿足德國或義大利以防止第二次大戰。

「法國亦未有提議讓出上次大戰獲得的一寸土地。你能說德義是唯一該受責備的嗎？我說，把整個世界引入這種可怕的境地，「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都應負同樣的責任。直至他們願意讓出若干東西以前，我們有什麼和平的機會？……」

我們任何一個人能說這些一般人認為正確的思想之流布對於戰爭與和平的主張無影響嗎？如果殖民地的要求是有經濟的論據，則這種要求決不是近赤道的非洲所能滿足的。

德國擁有大多數國家所沒有的東西；一種教義，一本德國國策的聖經，被視為聖書，在各學校教訓，帶宗教意味地向每一個女孩與男孩講教。這本聖經當然是希特拉的「我的奮鬥」，就德國的外交政策而論，這種教義是簡單，清晰，正確的——至一個可怕的與邪曲的程度。

底子裏的事實，在希特拉看來，他并會一再的說，是日爾曼民族（他堅稱比所有其他民族優秀得多，幾乎可以構成一個另自的種族，同時它是一個在擴張中的民族）不夠地方居住生活。他討論四個可能的解決辦法；（一）節制生育；（二）增加現在土地面積的生產；（三）擴大工廠生產以供國外市場；（四）吞併新土地。

對第一個辦法，他以上述的種族的論點拒絕了；對第二個辦法，他認為不足以應付需要；對第三個辦法，他拒絕了，不單因為他要德國成為自給自足，不必倚賴他人，能夠以本身的力量保衛自己，而且因為他深惡那種隨工業化而至的都市化，并要德國人成為農民，住在一塊足夠廣闊的使居民較易防禦攻擊的土地。

恩疏爾先生，他曾細心研讀德國教義的這方面，作以下的詳論：

「我的奮鬥」所要吞併的新土地已載於第七六七頁，在那裏它告訴我們，因為現在歐洲有八千萬德國人，正確的政策必須為一世紀以後打算，並在「本洲」準備一塊可容二萬萬五千萬德國人的土地——「不使這些德國人擠在一起以作其他各國

的苦力，却使他們成爲工人與農人，彼此可以因他們的生產而生活」。這塊廣大的土地往那裏找呢？希特拉先生并不傍敵側擊。他很坦白的說（在第一五四・七四二頁），只有犧牲俄國，這塊地才可以找到。上蒼恰好使俄國處於有利於這種冒險行爲的境况（七四二頁）。他繼續說，這樣一種政策的實行，是不能半途而廢的。與其他列強爭海外殖民地，無論如何都不夠容納一大羣的白種人的海外殖民地，將是——大戰前已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德國的前程并不繫於海上，而是繫於陸上。地城政策是其口號」。

各種關係都說得很清楚。德國人怎樣獲得這塊俄國的土地？用刀劍，以戰爭的方式奪取，一如他們父親從前之以戰爭方式奪取現在的德國。這種侵略行爲的道德方面的說明呢？「國家的邊陲是人造的，因此人可以改變它們。……對於土地的權利可以轉爲義務，如果它的土地得不到擴張，則這一、大族的人民將註定滅亡」。德國「將作一個世界強國而生或完全不存在」。

讓我們看看義大利吧。

華盛頓的義國大使宣稱：

「我們需要擴張領土，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的四千四百萬人民局處於一個面積比你們的得克薩斯州的一半還小的領土，並且在天然財富方面還不如得克薩

斯堪富有。我們的擴張土地的政策并不是墨索尼里所發明的。這是一種需要——義大利的一種真正的與具體的需要，這個需要是墨索尼里在設法使之滿足，俾義大利人民的生活程度最少能保持現在的水準；俾能防止無政府與共產主義的不停止的勢力去利用經濟生活的艱難辛苦的狀況，只有法西斯主義的完備紀律能夠使人們忍受的艱難辛苦的狀況。」

格蘭地先生說：

「我們的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它包含我們的生存與我們的前程，一個和平，安靜，四千二百萬人——五十年後將增至五千萬人——有工作的前程。這些人民可以在這樣一塊土地生存與繁榮嗎？這塊土地的面積只及西班牙與德國的一半，它缺乏原料與天然富源以應它的需要，幽困在一個關閉的海內，而它的商業却在這個海之外，這個海的出口是他國所有，而管治這些進口——它的自由，安全，與生計的『科丁義路』——的又是別的國家，世界各國都在築起藩籬以反抗別國貿易的發展，資金的移動，與殖民，凡橫過它們的邊境而進入，不要說他們本國，就是進入他們的保護國與殖民地的人，都要改易國籍？」

最後墨索尼里說：

「義大利人是個工作者，人數永遠在增加中。義大利所產生的嬰兒比煤，鐵或麥

還多。當本國的貧乏的富源不足以應在增加中的人口時，這些人民便需在別處求擴張……

「一個擁有與法國一樣多的人口國家，局限在一塊面積只及法國一半的土地內，所擁有的殖民地的面積也只及法國殖民地的二十分之一與英國殖民地的百分一，它必定逼於為它的過剩居民尋出路。但是向那裏尋求，怎樣尋求呢？利大義的富源今日僅能應四千二百萬人口的需求，但是二十年後，它的人口會增至五千萬或更多的時候，這個問題便變成十分嚴重了。在那時，義大利將發現自己類於奴隸的地位，在經濟方面固然如此，政治方面許亦如此」。

所以舉這些長篇的引證，我不必辯解，是因為它們是那個最能解釋政策的旨趣之思想的說明。下次大戰的發生，那個思想應負大部份的責任，即使像墨索尼里這樣一個政治家的真正動機完全不是他所宣稱的目的；即使對亞比西尼亞的冒險行爲的背後的真正動機并非因經濟的需要而產生，只因為想轉移人民對國內情勢的注意力，止息國內的批評。因為那些德國或義大利政府很易運用來作戰爭的藉口的感情，是由不公平，「不平等」的感覺——我們在討論的思想所造成的感覺——發生的，且不必談國家需要擴張這個感覺。

如果一個義大利人覺得冒生命的危險，或在戰場上喪失他的生命，他便可以使他

的子女免於不幸的貧乏，並使他的國家富強，他也會認爲這種犧牲是有價值的，而他的政府許會煽動他的感情至熾熱的程度。從他明白這種思想是一種迷夢與錯誤的一刻起，他不單會——他的利益作不同的想法，他并會對他的責任發生不同的觀念。

欲建立經濟的真理，必須改正對於道德問題所生的最深的感情。

不公道的感覺，一種心理的狀態，既是從一個對經濟事實的錯誤解釋產生，則改正這種謬論是必需的，如果我們想應付這種經濟的或心理的狀態。墨氏的政策，目前在義大利人看來是公道的，他們的感情爲一個經濟的呼籲，爲祖國對麵包，生命，地方的確切的需要所激發。我們不能應付這些感情，除非我們改正那個產生它們的經濟謬論。

以爲國家在饑餓中，被剝奪了對世界富源應有的一份，這種觀念本身便是引起感情，悲哀，怨憤的原因；便成爲經濟以外的問題；它等於國家權利的問題。

苟整個國家相信它必須擴張領土，否則它的人民便會餓死或被剝奪了他們對世界財富應有的一份，則這個國家可以爲此作殊死戰，不爲「金錢」，不爲財富，不爲利益，也不是因爲戰爭有利可圖，而是爲了正義，爲了人類權利中最深切的權利，生存的權利。如果上面所舉的引證是對的，則已不是一個經濟問題，已變爲所有倫理的與道德的問題。

本書作者在大戰前說，苟這些關於一個人口在增加中的國家需要擴充土地這個問題

的思想仍然流行，則戰爭是不可免的，因為它們以為一國的需要只能在否認他國的情況下獲得滿足；即使人們具有世上最良善的意志，具有現在無一國表露出來的自我犧牲的準備，沒有一個以這樣的假定為根據的補救辦法可以實行；沒有一個國際會議或友好的磋商可以獲得具體的結果（有如我們的十年裁軍會議一樣的空洞無結果），苟當事者都接受了上述的前提。

想一想，上述的情況所暗示的為何，這個見解說爲了養給它的人民，使之豐衣足食，一個國家必須在它的政治的統治範圍內，擁有它的工業與自給自足的生活所必需的富源。

全球有六十個獨立國。沒有一國擁有足夠的文明生活所必需的東西，大多數國家都很缺乏它們，如果所謂文明是包括棉織襯衫，用木料製造的紙，配有橡皮車胎的汽車，巧克力糖，咖啡、茶、藥品、洋海旅行，假期旅行，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德，義與日本不是全球唯一的「無」的國家。它們只是「無」的國家中的最強最喧鬧者而已。中國與印度在許多方面都是較不能自給自足而又是比較需要「擴張」的，「無」的國家中包括文明的小國如瑞士、瑞典、丹麥、挪威。因此，如果上述的見解暗示，它們已明白的這樣暗示，解決問題的辦法須走領土重新分配之路——「分享」富源，使各國都能自給自足——則這個世界將要應付一個艱難重重的問題，使我們的裁軍會議與凡爾賽和平條

約只變成午後茶話會了。其實領土的自給自足這個不是解決的辦法，因為使一國自給自足而不致剝奪他國的自給自足，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且不必說傷害了國家權利的要求了。

馬克斯先生了解這點並且研究其關係。如果一國必須把它所需的物資置於它自己的統治範圍內，則德國必定要在澳洲或其他英國領土內的原料富源。而英帝也要，於是英國有責任保持它。日本許會購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但是中國人也要生活必需品，並且明白宣稱他們不單會為保持這些必需品，還會為國家權利，作殊死戰。

尤有進者，這不單是什麼是今日自給自足的問題。人口許會增加；婦人們許再須要嬰兒不要摩托車，爲了不負後世子孫，對於這些嬰兒，我們——即指每個國家——是必須供給的。且莫談人口問題由於需要的改變，今日之所謂自給自足，許會不是明日的自給自足。昨日煤是工業最主要的需要，今日我們却需要同量的油與橡皮，這兩種東西，在五十年前，是無人要的，甚或無人想過將來會要的。如果這個意義的「分享」在當時便開始，則每個人都會覺得，爲了確保安全，他須保持他已有的東西。

國家的自給自足帶致「國際迷夢」所謂食入者的經濟學。「這是很明白的」，該書幻想一個食入者對另一個食入者說，「我必須食你，否則你必定食我。讓我們對此事作一友好的磋商吧」。該書辯說，如果這是真的，兩者彼此的糧食的唯一來源都是對方的身

軀，則無論雙方對磋商具若何大的善意，他們也不會獲得友好的協定。他們會打仗，然而他們會打的不分勝負，如果每人所作的假定全不是真的，只是一種假想而已；如果，事實上有很多雙方可用的食物在樹的高枝上，這些高枝是任何一方所永不能攀到的，但是如果一方站在他的肩上，則很容易便將食物取下來分食。然而，只要他們合作，豐富食物是可以獲得的。這個事實並不會影響他們的行爲，苟他們對經濟的情況堅持這個食人野人的見解，拒絕考究已成立的熟識的觀念。「指導行爲的不是事實，而是人們對事實的信念。信念是十分大胆的。人類學者告訴我們，人類在發現他可用一塊石頭來擊落并剝殺他的獵物的十萬年以後，才更進一步發明石頭會變成一個更有効的工具，如果他把它打成一個小斧繫於木棍的一端。如果這樣一種發明亦需十萬年時光，則本書要暴露的迷夢與謬論之能固守幾世紀之久，是不必驚異了。

和平之路必須包括領土之重新分配（由於上述的理由它本身便證明是戰爭最有力量的原因）這種思想；我們只能靠彼此互相爭奪領土以生存這種思想，它的發生，半由於人們對戰勝所得的結果之謬誤見解。半由於人們對於現代世界的財富本質的錯誤觀念。

欲說明這個討論與現行的問題的關係，我們必須在此點預料一下這裏所載的爭論。當一省或一個領土由一個政府轉移到另一個政府時，什麼事情會發生？我們把戰勝看成一種財產的轉移（這個觀念的發生，一部份由於我們對術語的誤解，當我們談及英

國在北美的「領地」，或在澳洲的「領地」，或者談及擁有這個那個或其他的土地時）。

流行的觀點是，當一個國家戰勝了或獲取了一省或一個殖民地時，財富的與貨物的轉移便會發生，那些從前是貧窮的，饑饉的人，如今變成財產所有者，致富了。

這完全是一種迷惑。概括言之，戰爭勝利並沒有使一班所有者的財產移轉到另一班所有者的手中。當一省，如阿爾賽斯，（明天許是布希米阿）在一八七二年被德國征服了，或在一九一八年被奪回了，該地的財產——田地、工廠、房屋、傢具——仍保留在同一人的手裏，一如往昔。政府的變更是有的，這種變更許值得人們戰爭以求之或反對之。財產的改變是沒有的。

不錯，以爲一個國家「吞併」木灰或金礦，有如英國於戰敗部耳人後「吞併」脫蘭斯瓦爾的金礦一樣，並沒有增加它的財富這種說法，在常識看來是一種謬論。「這樣的說法」一個「國際迷夢」的早期批評者說，「其實的程度等於說如果我的住在得文的叔父留給我的三萬畝田產與二萬磅一年的租金，我並不會比較富有。」

好吧：在你手中的書并不是一本厚大的書；它并不是學術的。它之再版，不單發行於原本出版的三十年後，而且是在它的提議經過一種舉世週知的經驗所考驗很久以後。這樣一本書不值得一小時的注意嗎？

當我們說我們「擁有」加拿大時，如馬克斯先生所說的，如學者社團所出版的，考

查世界原料的分配的地圖所指稱的，明顯的事實，明顯的真理，被蔑視了。沒有一個英國人因為加拿大郵票印有英王的頭而「擁有」加拿大。德國人要加拿大的麥或澳洲的羊毛，馬克斯先生說。但是那些東西「屬於」我們的，我們必須為後世子孫保持它們。它們「屬於」我們嗎？我們可以不必如德國人一樣的付錢便獲得加拿大的麥或澳洲的羊毛嗎？如果德國人征服了那些地方，他可以不用付錢便獲得那些東西嗎？

讓我們用一個極端的方式來說吧。如果整個的海外的大英帝國可以由英國轉移到德國，這個事實亦不能為德國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的特種經濟困難——互相更迭的不景氣的風波，凶濤般的不景氣，失業，高重的課稅，經濟的不穩定——差不多所有國家都時時感受到的困難。

我們為什麼可以這樣肯定的陳述？因為擁有歷史上與世界上最大帝國的英帝國也遭遇這些困難——商業的循環更迭，不景氣的風波，凶濤般的不景氣，高重的課稅，衰落的貿易，失敗的工業，半破產狀態的農業，在增加中的失業，經濟的不安穩。如果一個普及全球的帝國不能把英國從這些困難中挽救出來，它為什麼可以挽救德國？德國對利用帝國之道是否有更大的經驗？對於這種工作有更大的天賦才能？

對這種說法最普通的反駁是它說的太過了。倘若帝國主義是如此無價值，我們為什麼不決定把它讓與那些相信需要他的人呢？

對此問題的正確的答覆需根究整個事情。由我的田裏伸至幹路的私築道路，如果我把它看成一個收入的來源，一種財產，則對於我是無價值的。他并不生長東西，却需要許多錢來維持。如果它變成一條公路，則我的境况必較佳，因那時我不用如現在之需出它的全部維持費，只要付一小部份費用便行了。只需有法律保證我用它的權利，我是很願意把它讓給公家的。

但是如果我那位對於公共權利抱一種可怪的見解的隣人，要求我把這條路交給他，沒有任何法律的規定，只由他的單獨的與不負責的意見來決定我對該路的權利，則我將極端的反對。雖然我并不能從這條路獲得入息，雖然作為個人財產來看，它對我是無價值的，但是佔有它的結果許會使我的整個田地變成無價值，如果它使我不能將我的出產品輸出或將我所需的運入。

讓我們將這個譬喻再發展下去吧。

別人在必須經由該路的土地上建築房屋。於是對於使用它的爭執發生了。當事者經過種種苦惱與口角以後，開始作這種奇異的主張：

在一塊公共的財產內享受公共的權益這種主張，在一個自私的宇宙內，是太理想了。讓各人擁有他在該路的自己的一部份，佔有這一部份的整個財產權吧。這樣我們將獲致和平。

我們可以嗎？讓讀者考慮上述的意思，并把這個小譬喻與重新分配領土的建議關連起來吧。

其實對於德國的質問「如果作爲『一件財產』，『一種入息』來看，帝國是無價值的話，你們爲什麼不放棄它呢」？我們的答復很簡單：「我們是在放棄它——給那些住在該地的人」。帝國的大部份，約三分之二，已不成其爲帝國了。所有的領地已不是由一個帝國中央所統治的屬省。它們事實上已變成獨立國。這種「未被征服者」的脫離帝國的程序是英帝國主義的主要趨勢，這種趨勢的暗示，甚至英國人也往往不能充份的認識。本書三十年前即不斷地提醒大家注意這個趨勢的重要性。

然而把領土由政府交給真正「擁有」該領土的人民，住在該領土的人民，與把政府交給其他異國的統治者，是有很大分別的。第一個辦法等於一種免除帝國主義的開始；第二個辦法等於分成更多的敵對的與競爭的帝國主義的方法來保全帝國主義。英國已在實行的脫離帝國運動與自給自足的帝國政策，經濟的國家主義，是不能兩立的。德國的提議是基於國家的或帝國的自給自足的政策。

這種主張不純是經濟的。它深深的影響到防衛的，安全的，政治問題。如果各國堅持國家的自給自足，則沒有一個與和平相容的防衛方法可以實行。經過考究以後，我們發現我們所採取的防衛方法大半決定於我們對「爲麵包而競爭」這問題的見解；對於「

需要擴張」的流行的見解之採納，妨礙了任何解決純粹的政治問題之道。讓我們回憶這一個問題是什麼。

所有的國家都首先要求防衛，自保是第一條法律。以往每一個強國都有一種見解，以為爲了獲得充分的防衛，它必須比任何可以攻擊它的國家強大。那麼弱國的防衛又如何呢？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欲求一國的防衛則必須消滅他國的防衛了。我們在經濟場中所發現吃人的兇悍情況，你在政治場中也會發現到。

如果我們明白了所謂「防衛」不能單指領土的防衛，防止外國軍隊侵略本土，則我們許會認識我們以往所採納的各自防衛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互相排斥的。自諾曼底的威廉公征服英國之役以後，我們在英國并不需要抵抗侵略者。一千年以來，我們的戰爭都是在他的國境內發生。因此它們并不一定是侵略戰。它們在防衛利益，當我們視爲我們的權利與他人視爲他們的權利發生衝突時。但是倘使我們認爲防衛是要在與他人爭執中獲得實行我們的意見的權利，則所謂防衛，即等於我們要爭得作我們的主張的裁判人之權利，爭得我們不許對方佔有的判決權。如果在一種爭訟中，我們要做裁判人，而對方不能做。則找們是拒絕他獲得我們所要求的權利了。

在這個古代的窮境中，人類在有組織的社會開始時曾找出一條唯一的出路；雙方都不要作裁判者，都須順從第三者的裁判，這種裁判許是法律、習慣、已承認的規律，首

長的決定或仲裁判者的決定，或者法庭，或者法官，或者擲錢。武力與威逼在文明社會內所負的任務是真正的武裝那個習慣，人與人的接觸，人與人的關係等的法律，使爭訟者雙方都不能否認它。社會已明白它所須武裝的是法律而不是爭訟者，如果它想避免無政府狀態，它必須使法律比爭訟的任何一方有力量。在國際問題範圍內，文明所須負的責任是把權力從爭訟者的手中轉移到法律那邊去，無論是如何的緩慢與步步為營，也須如此做。

但是倘若那些戰前戰後都流行的，先甫曾援引過的，講及需要領土擴張的見解是對的，則法律的原理，或平權，是與一國生存的基本需要發生衝突的了。如果，事實上我們必須擴張，否則便受饑餓；奪取他人的土地，否則便是眼看着我們的子女受赤貧之苦，則我們便不會與人合作以建立一種保護他人的土地的法律，一種也許會防止我們獲取我們生存必需的東西的法律。我們不能要求任何一個國家爲了更高的道德而自殺。『需要不知法律』。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斯先生，柏拉特殊福先生及一班贊同他們的意見的戰後作者都說沒有法律可以抑制國與國間的鬥爭。

如果這種見解是對的，則全世界的人都必須過原始人的生活，每人都用一種饑餓的注意力來看守着他許可奪得的生活必需品，他知道只有他保衛它們的力量比欲奪獲它們的人的力量強大時，他始能保有它們不爲他人所奪取。

人們會說這個說法太頑固了，不過是一種論法家的兩端論法，是與政治的事實分離的。

這是不確的。這些思想是今日逼近各國之前的政治事實的本質。人們不是把它們看作可辯論的提議，而是完全自明的真理。對於這些真理，「無」的國家的人民都具一種盲目的感情，他們的統治者（他們自己也是同一迷夢的犧牲者）所養成與利用的感情。根據這些思想及它們所創造的價值的估計，他們造出獨裁者每日所呼叫的口號，這些口號明天許會成爲我們必須遇着的戰場上的吶喊。

認爲這些思想之發生只限於德義與日本國，因此打破它們的唯一可利用的地方是在這些國家內，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它們仍然在英國佔優勢，並且是那個可以爲行將再發的戰爭構成可行的替代物之政策的真正障礙。

文明的命運是決定於最後決定政策的數百萬人如何答復此問題；兩種辦法中那一種最能保衛國家，它的利益，權利，強盛？是各人擁有優勢的力量，各顧各，那個辦法呢，抑或是全體的國家共同合作以保衛爲任何國家的安全生活所必需的權利，這個辦法呢？我們將否擁護孤立力量的制度，每個人都準備反抗任何對他自己的權利之直接打擊，但拒絕參加防衛大家的權利，抑或我們將防衛用於防衛全體人的安全所必需的「公路規則」？

對於國與國的關係，一般人仍然反對採取合作的辦法。爲什麼？一部份是因爲他相信各人有各人的力量這辦法可以有效；同時爲了保護他的直接利益而可以由他個人（或他的國家）任意運用的力量，對他有一種引誘力，這種引誘力是均分的力量，是保護公共權利的——在這裏他的利益是間接的與距離較遠的——力量所無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確保文明生活之道的問題，看成一個保證複雜的舉世的合作辦法可以順利進行的問題，則我們必然擁護防衛的合作辦法；認爲防衛的主要目的在要大家遵守各人生活所必需的規則，法律。但是倘若我們認爲國家之強盛，有賴於獨佔數量有限的物資；認爲一個國家的財富包括貨物與動產，我們可以獲取它們，有如一箇夜盜之可以偷取戶主的盤子一樣，則我們將把防衛看成孤獨的力量，一個防衛國土不爲掠劫者所掠奪的問題，有如一箇人之關門防盜一樣。這個最後的例甚或更強有力——確實如此——如果這是真的（這幾頁所舉的例證表明這仍是流行的見解）一國在全球的經濟機會有賴於它的力量，陸軍的或海軍的優勢，來強行它的經濟要求以反抗別人同樣提出的要求；如果這個見解認爲力量的競爭，事實上是擴大中的人口爲求生計的競爭。爲獲得世界有限的富源中他們應得的一部之競爭。苟這些假定——在不言中的，或含糊地與朦朧地主張的——左右羣衆的心理，則每個國家將會信任它自己的力量，并且反對任何集體的或合作的防衛制度。

但爲了對抗這種見解，本書提出另一種見解，它可以部份的擇要如下：

防衛，國家的安全，它的人民、財富、貿易、強盛、文化的權利、文明、所主要要求的不是防衛物資或土地不爲他人掠奪——現代世界的國家對排斥他人的貨物比掠奪他人的貨物注意得多——而是創立類似維持公道上無阻的交通的辦法。當強大的海軍組織在要求更多的巡洋艦以「保護我們的貿易路線」時，這種貿易的三分之二在幾年內消失了，而我們的船艦却在因經濟崩潰而被封鎖的海岸內一事不做。海軍在做什麼？在如柏拉福特這種巨大的工業城市內的重要貿易，都被我們自己的領地的關稅所毀滅了。海軍怎樣保護它？一位海軍上將有一次說，如果沒有我們的海軍，外國人會「奪劫英倫銀行的地窖」。因爲外國人掠奪我們的準備金，我們被逼放棄金本位了。海軍如何可以防止這種事情？如果事實上我們的國家的生計——生命——是有賴於一種類似公道上的交通規則的辦法之維持，則這個生命的防衛，只能由與他人合作的方法獲得之。想用每人有一部比他會撞着的車更大的汽車，并且不顧公共規則——隨己意地行駛這個辦法，來保證安全及順利的旅行，其本身必定失敗。它只能產生紛亂局面與不幸，有如它已在國際的場合所產生的一樣。你不能靠每個利用公道者的單獨行動以保證任何人的防衛。

防衛、安全、都必須由團體來組織，否則絕無獲得的可能。

用一種帶政治口吻的而不是經濟口吻的陳述來作補充，上述的談話會更明白一點，即是：戰爭的最終的原因，是人們想以維持各國的主權與獨立，但對於防衛必需的公共權益則彼此并無相互責任，這個原則作根據來管理國際生活；即是以無政府狀態作根據。

請注意上面的陳述不單說明征服，企圖以國家的武力來奪取財富或貿易之無效；這同時說明需要一種「公路的規則」，與維持公路規則之重要性。這兩件事底子裏是同一真理的不同面。如果法律是要來統治人的話，則那些反對它與蔑視它的人們必須遭反抗。由於改良，由於他們對共同利益的漸漸承認，他們可以受相當的，讓我們希望是愈來愈多的，制止。倘使武力仍負一份責任，有如它在世界上各有組織的社會內所負的一樣，則它的社會功能是反抗，取銷蔑視法律的暴行。

從排斥防衛，或運用武力以獲得防衛，這個意義來說，「國際迷夢」并不是一本和平主義者的書。它的目的是要表明戰爭勝利所得的經濟利益是虛妄的，而武力是被運用於阻礙了共同防衛的工作上。

使這個討論獲得正確的論點是極端困難的。「武力是武力，而戰爭是戰爭，殺戮是殺戮」，和平主義者與黷武主義者都同樣的說；後者最近接納了和平主義者對國際聯盟的誹謗。任何一日我們都可以在泰晤士報的通訊欄內讀到陸軍少將們的信，他們告訴我們「日內瓦派」與狠心人如西西爾爵士等提議用戰爭的威脅來保持和平這種思想，是如

何之使人震驚，是一種如何危險的，不道德的與殘忍的思想。這些說法最後往往要求本國爲和平而加重的武裝，卽是說，爲保持和平，聲言將與任何人作戰，如果他有我們視爲「攻擊」的行爲（未列舉的與未說明的以及似乎很難有介說的）——卽是，傷害了我們的利益或安全。

如果我們想知道國聯爲什麼失敗了，解釋是很簡單的；因爲我們所有的人都準備無約束地運用武力，每人都是爲了自己；但是我們並沒有準備爲了必需的法律而使用武力。對於爭訟者應該武裝這種說法，我們視爲正確的與自然的；但是却視武裝法律這種思想爲可怕。

本書一部份的目的是要表明目前的問題不是武力對非武力，而是研究如何使武力之運用只限於有社會意義的事情，致這種運用能使防衛與和平、與平權、可以相合。

如果警察變爲強盜；如果軍隊或它的一部份在使他們自己成爲國家的主人，幷取消憲法，我們許會爭辯說：「這些罪惡是因警察軍隊的存在而發生的，讓我們取消兩者吧」。然而這只是由一個困難轉移到另一個困難而已。如果警察可以變爲強盜，則老百姓亦可以。荷這個問題被視爲只是維持警察抑或取消它的問題，則解決之道是不會找到的。只有我們明白真正的問題在使警察執行它適當的職能時，事情才會有進步。

在現代歷史中，再沒有如現在之需要這些說明了。它不單是一個各國間的和平問題

，而是國內的自由與文明的問題。對於法西斯主義，羣衆之擁護它或默從它，我們看見各國在這一點上都是紛亂的；完全含混的；讚揚武裝者之奪取權力，因那個武裝者當時恰好說出某些盛行的不滿或一般的成見或謬論。倘若我們繼續視武力或「非武力」爲兩者互相更替之物，則我們將繼續在兩種不可能之事情中間搖動。我們真正的問題在能夠清楚地辨別權力之社會的與反社會的功能。

與各國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困難奮鬥的未來世界會議怎樣能有任何成就，如果會議之決定須經本書討論的迷夢所左右的羣衆及國會批准？如果普通的選民注視一個幻想的世界，在那裏一個國家可以繼續出售而永不購買貨物，繼續獲得一個「有利的貿易差額」而不致使別人得到不利的貿易差額；在那裏我們可用我們的優勢力來作我們國家防衛的根據，而不致剝奪他人的防衛，以及諸如此類的一大串片面的迷夢。

一九一〇年出版的「國際迷夢」包括一章（在一九三三年的版本內逐字逐句地翻印出來）——題名爲「賠款之無益」。它的論題——粗率的說來——是這樣，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國際付款中，以爲一人付款給他人與一國付款給他國是相類的這種觀念，是完全錯誤的；國與國間的巨大付款最終只能以貨物或工作清付之。如果數目是細小的，可以用黃金來清付，則這筆黃金必定由收受的家用來購買外國貨物，或用來作國內的幣制的擴充，結果債權國的物價增高致妨礙了它的出口貿易與競爭的地位。該章指示在一個艱苦戰

爭結束的翌日，戰勝者會無意中發現他本國的或世界的市場爲戰敗國出產的大量貨物所充塞。

該章有一句話是這樣的：

「在付給大量賠款的情形下，戰敗者付款的困難，還不如戰勝者收款的困難大」。作者之所以重提這一點，並不是想爲個人辯護，（讀者會相信嗎？）因爲這方面的事件已足爲個人辯護了，是爲了另一目的：想使讀者回憶一件事實，即羣衆之不能清楚地認識這個真理，結果使十五年的經濟的與金融的紛亂與不安全更加強烈；現在仍會使歐洲與美洲陷於類似的紛亂局面與猛烈的爭論；并且更進一步指出這個真理最後會被把握着，如果本書所提出的國際生活的見解已成爲日常思想的共同結構的一部份。論及賠款一章，並不是與本書的總題分離（及絕無關係）。它的主要建議是本書一個論題的要素，這個論題論及用強逼的方法把現代式的財富由一國轉移到他國是困難的；獲得他國的出產品並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事情；問題不是在貨物之缺少，是在如何維持令貨物自由地獲得消費這個辦法，使之順利進行，而粗率的「掠奪」與武力的贈品必定使這些辦法脫節。該章論及本書所寫的以外的東西。當正統派的經濟學者對本章表示疑惑時，我懷疑我會否把這種事例說清楚。因爲如果他們接受了整個事例，則對於它的某一點是必然接受的。賠償與借款問題所引起的困難，在某種情形之下，證明了本書的整個辦

論。

這件事的真理不單在大戰前甚至不爲經濟學者所承認，即在大戰結束很久以後亦不爲大多數的經濟學者所承認。一位著名的銀行家，一位英倫銀行的總督，他堅稱德國每年可付十二萬萬英幣。（堅尼斯先生表明它付這個數目的十分一亦是無理的）任何一個人，如果他願意研究甚至可敬的經濟學者與商人在停戰時所說的話，并把他們的斷言與後來的事件比較一下，都只能下一結語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空想的世界裏。其實我們是如此。因爲專家與凡人都沒有真正認識財富的本質因現代環境而生的變化，「國際迷夢」所企圖喚起注意的經濟的與政治的變化。

倘若今日，在事情過去以後，讀者遍讀堆積如山的談及借款與賠償問題的文件，官方的與非官方的，則當局者認爲比所有其他各點都值得注意的一點，必定是「轉移的困難」；賠款最後必定是用貨物與服役來清付，這個辦法雖然對於負債人是比較容易，但是把貨物與服役轉移到債權人手中而不致引起最嚴重的財政經濟的脫節，是極端困難的。

這一切現在已是古老的故事，然而方才所說的真理却需要經過十年的時間始克變成國策，其時歐洲的金融，工業與商業都瓦解了；歐洲的羣衆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明白此點，（如果他們確是明白了），如今美國輿論對於借款問題又陷於一式一樣的愚純狀態

中。

當我們談到裁軍的計劃時，我們極清楚地發現一種觀念在流行，這個觀念認為文明與福利之爲物并不有賴於合作辦法的更完善的組織，而是一種各競爭單位爲生存而有之競爭。每一個國家都談及它準備爲和平所作的「犧牲」。難怪會議失敗了。除非各國把會議的目的看作一個使大家更安全，更平安，獲得更好的防衛的總辦法之一部份，會議是不能成功的。然而羣衆並不明白這點。這不是一個求得更完善的國防的會議；而是一種集會，在這裏面每個會員都覺得他被要求使他的國家冒更大的危險。

把這種計劃與世界的真實關連起來這個企圖，在它的經濟的關係上又顯露同樣的失敗。我們時常聽到人們講到軍費的浪費，并謂如果軍備可以減少，經濟方面許會受益不淺。但是迄我們開始時，真正的軍費約爲十五萬萬，這個是每個國家用於軍費方面的數目。更大的負擔，不可勝數的更大的負擔，產生於一種事實，即是如果擴軍的競爭繼續進行，則回復繁榮所必需的國際協妥是無法成功的。因爲倘若目前的草案繼續實施，我們知道戰爭終有一天發生，我們現在同時知道，戰爭等於付不清的借款，賴債，通貨膨脹，脫節等一切上次大戰所產生的結果。我們如何可以對可見的第二次戰爭生一種信任？

這是真的，就擁護孤立主義者以反對防衛的合作辦法這種舉動來說，羣衆是服從一

個深切的本能。於是人們反對說，既然羣衆對於此事的態度是出於本能，則爭辯——例如，本書所作的爭辯——又有何用？然而我們在某種環境對本能作如何之反應，是要看我們如何研究那種環境的事實，我們如何把它們與以往的經驗連起來；而我們對上述事物的處理辦法又有賴於爭辯，與我們自己或他人爭辯。若干事實一經弄清楚，則自衛的本能，擁護合作辦法與擁護另一辦法同樣有力的自衛的本能，許會指引在海上遇大風之初次航行的水夫將船駛向岸邊；然而有經驗的水手的「本能」在那個當口會設法盡量離開陸地。兩者的本能是相同的；宗旨與目的也是相同的：自衛。但是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却與另一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正相反。服從本能是引起破壞的行動抑或安全的行動，全視我們對某種環境的事實作何解釋。在一個擠擁的戲院內聽見叫喊「失火」！自衛的本能許會指引許多觀衆採取個人單獨行動，不與別人商量，並且奔向院門。如果一大羣人採取了這個孤立的安全辦法並且狼狽奔逃，則他們將必致滅亡。但是那些較慣於守社會紀律的人的「本能」會立刻提議大家合作以作有秩序的空場。如果對該場合的事實的第二種分析佔優勢，則「本能」會用於拯救那些觀衆。兩羣人的宗旨與目的，基本的本能，都是一樣的，自衛。其政策與方法之所以不同，有如水手與初次航海者的情形一樣，是由於兩者對經驗之分析方法不同。

國家自衛的本能是否指引一種必致毀滅各國與它們的財富之防衛方法，或者指引一

種有效的防衛方法，也是決定於各國如何分析那個環境的事實。

本章所提出的是這些事實，以及它們的與國家自衛問題有關的解釋。我們對於現代世界的經濟特質之觀念，決定了我們對於適當的防衛機構的觀念。本書把防衛問題與我們現代經濟器具的本質連繫起來。這種情形對於一九三八年之羣衆，其新奇之程度，幾與一九〇八年的羣衆的一樣（有如一打這裏討論的戰後政策所顯露的），其不同之處也許是與衆不同的專家們如今接受了這個分析，而以前則拒絕它。

數百萬人的擁護單獨武裝爲適當的防衛方法之決定，是合理地產生於那個談及現代財富的本質的，而爲一般人所接受的，前提——有如本章擲出的例證所十分清楚地指出的。

有兩種異議是本章要在此說明一句的，雖然對於這兩種異議，以後各章都會作充分的討論。第一種是，決定戰爭與和平的主張者，不是輿論，而是有既定利益者的影響；第二種（已曾簡單論及）是，輿論的本能的與潛意識的力量，愛國的熱情，它們不是「決算表」，無論如何可怕的決算表，所能左右的，不是理智所能攻破或動搖的。

對於這些異議的第一種，即認爲資本家，金融家，有既定利益者，支配了輿論，並爲了達到目的，他們助長紛亂局面。「國際迷夢」原本對此已有論及，這些論說現在并已再次寫出。（第二編第八章）資本家之辛苦地造成一種使資本主義崩潰的局面，金融

家之造成使財政制度完全瓦解的局面，這種現象是需要比馬克司主義者所準備給與的解釋更多的解釋的。其真理是，資本家與金融家往往與他們同時代的人作同樣的迷夢。他們并非有意，在中歐或別處，破壞他們的財富所繫的制度。他們簡直沒有預料他們的政策有如此結果。他們不是以資本家的立場，而是以國家主義者的立場來思想。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則他們是被流行的國家主義的力量所壓服了，有如歐美的財政家與銀行家近十年來之破壓服一樣。

特殊利益者，如軍火工業，之利用輿論以謀他們自己的利益，如果他們能夠的話，是必然的。但是指斥裁軍的繼續不斷的失敗，是由於有關方面——造軍火者，海軍將軍們，外交家——有能力強逼全體國家做它們明白決定不做的事情，這種說法是無稽的。幾十個官吏——或資本家——不能以他們的物價力量強逼千萬人年復一年地繼續納稅，冒大險，危及國家的繁榮，如果這千萬人確信賦稅，冒險，犧牲，不單不需要，而且事實上是有害的。

有既定利益者——如果我們認為這種情形的發生是由於他們的影響——只能以不正當手段操縱輿論，利用羣衆的不關心、惶恐、偏見，好鬥或恐懼、來使羣衆如他們的願望行事。所以剷除利益方面的力量與破壞他們的巧計之唯一方法，是向羣衆說明他們的不關心之危險，他們的偏見之可笑，或他們恐懼之空洞；指出他們對危險漠不關心是產

生真正危險的源泉；他們是被不存在的危險所恐嚇。

討論資本主義與戰爭的關係時所發生的惶惑，或者可用本書原版所舉的例證解釋清楚。茲將此例證說明之。

假使，在現在的所謂美合衆國內，以前由原有的十三個殖民地發展爲半打獨立自主的國家（有如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發展爲一打國家一樣），每個國家有它自己的陸軍，海軍，關稅，貨幣。它們會互相作戰有如波利維亞之與巴拉圭，智利，比魯作戰一樣。什麼是，譬如說，賓塞維尼亞與俄亥俄的戰爭的原因？資本主義嗎？然而那些地方現在也有資本主義，它們却沒有打仗，如果賓塞維尼亞不與俄亥俄作戰，但法國却與德意志作戰，這并非因爲美國各州是社會主義者，它們并不是；也不是因爲它們的人民的社會道德或意向，或和平觀念，一定比那些住在科倫或里爾的人民高超，是因爲歷史曾在前者發展成一種聯邦盟約，而沒有在後者發展同樣的東西。倘若因歐洲歷史的某種愉快事件而產生的某種聯邦盟約會遺留下來（有如一種羅馬帝國的遺物一樣），使我們今日有一個歐洲合衆國，法德兩國在這合衆國內所佔的地位與賓塞維尼亞和俄亥俄在美合衆國所佔的一樣；或者倘若它們在瑞士聯邦內佔有一個法國的或德國的坎吞的地位，則戰爭之於這兩萊茵區的國家，有如它之於美合衆國各州一樣，是一件無所知的東西。

這卽近一種無疑的真理；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便不能有國際戰爭，雖然

我們會有內戰或階級戰爭；評論家許會爭辯說我們仍須尋出戰爭的原因，因為，我們必須尋出防礙聯邦盟約的產生的東西是什麼？尋出什麼東西激勵各國各自支持無政府狀態，孤立主義；既然我們熱烈地明言希望和平，為什麼我們對一種可以獲致和平的聯邦制度拒付代價，我們為什麼甚至拒絕對之採取任何步驟或有所貢獻。我們為什麼甚至拒絕向這個方向走，却堅持走相反的方向？為什麼此時我們的國家如此強烈地傾向國家主義？為什麼我們一般的報紙如此強烈地贊成孤立主義，要我們避免一切會變成世界盟邦制度的開始之行爲。

明白了競爭的國家主義的經濟的矛盾，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它的道德的矛盾。問題的主要目的在使羣衆認識如今仍在惑亂歐洲政治的國家主義的仇視，報復，憎恨之道德的欺詐。目前這些感情可以假裝成高尚的感情，最崇高的愛國心。這種欺詐將會失敗，如果我們研究經濟的國家主義之道德的關係——它的辦法是排斥他國的出產品以毀滅他國的繁榮來獲得一國的利益；以增加他國的失業的方法來醫治本國的失業；時常要求一種有利的貿易差額，雖然這即等於說別人必須因此得到一種不利的貿易差額。這種「野蠻主義」必定運用到政治的與文化的問題。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主義者爲自己要求獨立，並且否認他人的獨立。對於義大利人，一個本國政府是一種神聖的和不能讓與的權利，然而對於提羅爾人，這種政府是不好的；波蘭詩人幾百年來都曾謳歌說，不許一個民族

有自己的文化的或本 的表現，是「一種靈魂的殺害」。但是如奧克島人要求這種表現，他們會遭毒打與慘刑。希特拉要把日爾曼諾爾人身上的外國人的成份滌除，因此猶太人必須離開，但是非諾爾的波蘭人或捷克人却必須違反他們的意志加入德國的集團。發雷拉先生說，愛爾蘭人有權選擇他的政府；但是這不適用於厄爾斯得的愛爾蘭人。

總言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主義者不反對他人獲得他爲自己要求的國家的權利；當施於他人時，他沒有不排斥那個他用來爲自己辯護的爭辯。大多數的國家主義者都在反對國家主義，以戰爭的威脅來消滅它（這是，他人的國家主義）。

在競爭的防衛辦法中，這種愚弄是不可避免的。苟他把防衛繫於單獨的權力，國家主義者必得排斥他人的國家主義，如果他不甘願住於他的國土的人民的人民與一種敵對的意志隔絕，他的力量將爲這個敵人所超過，因而失了防衛。最後，權力是爲了自己而要求。

我們固然可以說希求權力是因恐懼而起，而對於恐懼的感情之傾向，又是人性所固有的，自衛的本能的器官之一部份。然而，有如上面所說的，我們恐懼的是什麼，要看我們對經驗作何解釋而言。非洲野人的迷信的恐懼是不可抗拒的；但他的受教育的兒子却不與他分擔這些恐懼。什麼東西打消了這些恐懼，使父親所謂「能的」東西不是兒子所謂「本能的」？除像教育這種理智的分析以外，還有別的辦法可以做得到嗎；注意

我們所恐懼的東西並且研究它？在本章內，這種理智的分析是運用於對國際政治的恐懼。

同樣的普遍的真理適用於憎恨也適用於恐懼，對於這一點，作者在第二編第九章有相當詳盡的討論。在兩個被指為殺害我們的朋友的人中，證件指明是其中的一個。我開始以厭惡的眼光看他。一位偵探，用一種很聰明的辦法，明白的對我指出其中的另一個是殺人犯。理性使我的感情改變了方向。憎恨是生理學的問題；是無知覺的；憎恨的對象是理智問題，是有知覺的。

國家主義必須經同樣的一般的理智的與文明的過程。希特拉企圖說服大多數德國人，使他們確信他的政策，包括細詳計劃地殺滅他的無助的屬於猶太族的國人之政策，是代表最真的愛國心，會將光榮與幸福歸還德國。在他人看來，這種政策似乎是卑劣的與無益的吵鬧，并不能醫治德國所遭受的經濟的與社會的災難。三十餘年前法國的愛國者同樣的堅稱唯有支持對德雷發的罪罰，不管有罪無罪，「法國的榮譽」才可以真正恢復。在別人看來，最能恢復法國的榮譽的是正相反的辦法，以表明政府準備取消司法上的錯處。

在這幾種情形之下，我們如何決定那一種是較真的愛國心？我們如何說服那些更危險更罪惡的遭難者使他們相信這是危險的與罪惡的？最少半由於我們十分清楚（站在保

管人的地位，當我們選舉與決定政策時）爲本國所要求的是什麼，我們應該要求的什麼，以及所提出的政策是否係獲得這種要求的辦法？

「我們要求什麼，本國的福利包含些什麼」？這個問題，是一個十足奇怪的，很少提出的問題。「國際迷夢」堅主提出這個問題；堅稱雖然經濟的福利決不是治國之才的全部目的。它是任何有價值的文明之必需部份；對它表示傲慢輕視并不是高尚，而是愚笨與不誠實。不誠實，因爲極端的愛國主義者不變地支持一種經濟的國家主義，不單是物質的，而且是我們所謂野蠻的。

換言之，只有用這裏想用的分析，我們始能使國家主義服從任何一種社會的或道德的定價。（當國家主義的評論家對本書的「唯物主義」表示很大的輕侮時，事實上激怒他們的並不是唯物主義，因爲他們的經濟的國家主義也是一樣的唯物的，使他們激怒的是他們的主義要受理智的分析。）略瀏覽一下本書第二編第一章，以及第九章與第十一章，便會明白本書是如何的想獲得這種初步的內省：「你要求什麼？如果你不要求繁榮，你要求什麼」？我們仍需堅稱在政治方面這些問題將是第一批提出來的問題。

這是十分肯定的，我們之所以被驅入戰爭漩渦；被逼作戰爭結束後的不幸的和平；陷入戰後的紛亂的與惶惑的局面，爲那個使我們的經濟工具崩潰之互相消滅的經濟的國家主義所左右，主要是因爲我們沒有問我們自己是否要繁榮以及繁榮所必需的東西，抑

或我們要其他某種與上者衝突的東西，甚至我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東西。上述的問題，是一個把自己毀壞在國家主義的謬論，感情與仇恨的石頭上的世界所仍需提出的問題，而此問題現在大都仍然未能清楚地提出。

我們宜稱我們加入戰爭的目的是消滅獨裁政治並擁護民主政治或仲裁制度的主張；或擁護小國人民的權利。然後，當隨擁護民主政治的戰爭而至的是一種獨裁政治的流行，其嚴重之程度遠非戰前所不能比擬時，這種結果却為那些一二年前遣派大批本國青年去赴死以防止獨裁政治的人所稱讚。

說我們的一九三八年的報章每日以輕侮的嘲弄的眼光來對付曾經熱情地宣佈爲——我們的青年爲此犧牲了的——參戰之道德目的，並不是過火之論。

目前的問題，不是我們羣衆所持的兩種相反見解中——一九一四年的見解，或一九一八年們見解——那一種是正確。了解我們需要什麼，然後判斷這種需要是否有價值，這才是聰明地，甚至神志清楚地統治我們本國政策的第一步。

和特利先生在他的「自主國的經濟情況」內，使權力爲本身而希求這個事實成爲批評這裏所提的辯論之根據。他說：

「諾爾曼安哲爾的辯論，在它的範圍內，是一個重要的真理。他所依附的意見是謬

見，並且是十分危險的謬見。關於這些謬見，他的駁斥會作相當的解釋，但是他不能完全解決這種情形。

「羣衆之所以希望統治更多的土地，表面上是根據信念與期望，這種信念與期望大部份可當迷夢來取銷的。但一種不光是迷夢的硬渣滓仍然留存。」

這是迷夢，他暗示，如果目標是福利。但是如果你的目標是為本身的權力，不管它對於促進福利工作能有什麼幫助，這也不是迷夢。和特利先生接着說：

「各國的經濟野心必需用權力來表達。我們慣於在福利的範圍內想及經濟的目的，但是在國策的問題內，則決不是這麼一回事。在每個國家看來，權力是達到各種目的之必需手段。它本身被升高為一種目的。」

「苟福利是其目的，不同的社會許可以愉樂地共同合作。那裏許有妒忌，並爭論如何分担福利的物質的辦法。但對於追求福利，是沒有固有的紛歧目的。在另一方面，權力是相對的。一國有所得他國必然有所失；一國之損失便等於他國之獲得。矛盾衝突是追求權力的要素。倘若運用國家的權威以便利那些從事經濟發展的人的活動——甚至求取未發展的土地以爲他們的活動園地，並且可能在求取過程中冒戰爭之險——時常成爲國策的目的，則是因爲人們相信這種政策是發展國家的權力。」

「苟國際關係是以武力爲根據，則權力將是國家的大志之首要目標。結果形成一個

不良的團集。當一、政治領袖說戰爭是他本國的主要利益所必需時，他的意思通常是指在求取或避免損失國力的若干因素中，戰爭是必需的。只有這種利益是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時，這種利益才是重要的。其重要性足為戰爭口實的唯一目的，是由戰爭本身的希望所產生出來的」。

強烈的。但是模糊的本能支持了在權力背後的經濟動機，作者從未見有一種場合不是如此者。他的第一本論政治問題的書希望表明非理性的，潛意識的力量在國際政治內的分量，在一本後來出版的書中他說：

「在國際活動範圍內明顯地進行的分裂辦法之基礎，是權護統治，優勢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本能。這種衝動，為流行的「神秘的」愛國心的向習所裁可與加強的衝動，並沒有因為充份認識它的及社會的質素，與它的行動不可分的破壞性，或認識它對於達到文明所必需的目的之無效力，而受到指導與阻礙。」

「這種衝動的心理的根基太深了，我們將繼續對它讓步，直至我們更充份地認識它的危險性以及它之不足以達到若干如本國人民的生計等目的，並且了解如果我們要繼續文明生活，必須轉向別的動機。我們那時許能發展一種新的政治習尚，它將「訓練」本能，一如容忍習尚之訓練宗教狂，當那種感情威脅破壞歐洲社會時」

激瀾我拒絕把不抵抗，片面的裁軍，作爲本辯論的正確結論之理由，已複寫於第二編末幾章內。這是真的，一個侵略者不能因攻擊我們獲得利益，他只能損害自己；小國的歷史證明微小的軍備與國家的安全是可以並行不背的。（比利時所以受苦難，並非因德國要攻打它，是因德國要假道到達法國；比利時事件是兩强大武裝的國家競爭的一種風波。）然而甚至在小國內，增加權力的衝動仍是常有的；它們希求權力作爲保存國家權利之手段；在與他國發生爭執時，甚至細小的有形的問題，尤其是調整邊界等問題，也變爲抽象的權利問題，爲了保護它，全國人——雙方都被教導這樣想——都該作死的準備。

整個事件已由戰後的德國歷史予以說明。德國在這十五年中之無權無力，並沒有危及它的實際的安全（它之不能抵抗魯爾，使它得免於如山的損失與不幸，倘使它抵抗了，它便會受到這些損失與不幸）。當它實際上抵賴它的債務與義務時，它的債權人也無可奈何它。不抵抗，從物質的意義來說，是行的。但是雖然它可行，它是被放棄了，人們歡迎整軍的巨大計劃，因爲整軍的準備可以喚起希特拉所呼籲的動機。

一個面對着強鄰的國家會時常企圖改正這種劣等的地位，如果可以的話；不幸的是，改正的方法是使他國卑劣，這自然絲毫不能使問題更接近解決之途。各種動機混雜起

來：恐懼，「劣等的心理感覺」，擁護權力的深切的衝動，等等都為那些呼籲所激動，那些呼籲包含一種大小希特拉輓近使我們熟悉的神祕因素。

在這種情況之下，處理恐懼與劣等的心理感覺之最好的機會，不是要求一國唯一一個強國的命是懸，而是邀請它把它的力量獻給各國集團的聯合權力，俾能維持各國的平等權利，一個總則，例如，使各國都有由第三者裁判的權利。使遇爭執時一方得免於為較強的對方所凌虐。用這個方法，比要求拋棄——普通男女也不會做的——國家主義更能應付這種大部份是國家主義的易感的名譽心。

第二編的第十第十二章企圖指出不抵抗並不使國家獲得平等權利，它等於叫弱國讓與權利。如果爭訟的較強的一方，誠實地相信他是對的，並且知道在逼人接受他自己的裁判時他不會遇到抵抗，他將會不服從第三者的裁判。反抗不義是正義的條件。作一個一視同仁的法律的後盾之集體權力，與公平和正義最為接近。

在讀者把握本議論以前，作者正可以在此討論一個或兩個普通的批評，如二十五年前一概括地提出。

一個常有的批評是這個議論太單純了；沒有充份考慮到各種條件。然而本書大半却是對錯誤議論的單純性作一種抗議。但是它擁護一種單純的方法，

可由譬喻說明的單純方法：

有一次與一位年青朋友在蒙的加羅並立看人賭博時，我們與另一位傍觀者攀談起來。這個談話說明此陌生人會研究出一種方法，使一個人用幾千法朗的本錢便可以傾莊家之所有，並贏得數百萬元。我的年青朋友頗爲這個意思所動，並要我答復發明人所用的若干數學的論辯。現在我知道如果我企圖以這個立場答復他，我必失敗。我不是數學家，而那個討論「重率平均」，「無規則頻數律」以及其他問題又爲數學家所無止境地爭執。然而有一個事實，它決定了這個方法的價值。發明人希望以數百法朗的價格出售。我對我的年青朋友說，根據上面的事實，我們對發明者的數碼便不發生興趣。這個答覆許也是太單純了。他可以爲他的方法說許許多多的話。然而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以一個困難的數學原理來細心地稱這個議論，而是決定作這件事抑或另一件：用金錢作孤注以研究一個賭博的方法抑或這樣做。

我認爲文明現在所要應付的環境，是它該選擇冒戰爭的危險，抑或冒險創立唯一可以防止戰爭的政府的國際機構。它須作一決定。這不是由專家 熟練的經濟學者，專門學校的專家作決定，而是由數百萬有選舉權的被人過度驅使的專門家，運煤伙、牙醫、茶館侍女、牧師、雜役婦、美術家、鄉紳、唱歌隊女隊員來作決定……他們組成與破壞政府，如我們已一再看見的，他們並不猶豫地凌駕專家或技師，並且逼使他們接受他們

的意見。最後的評判要由他們來下。他們最多也只能予它以「暇時的注意」，因為大部份的精力都被每日工作以及對生計與家庭的憂慮所吸收了。爲了爭取這種暇時的注意，報章與政客作了許多提議，這些提議首先要取悅他們而不是改正任何現存的錯誤或誤解，因爲改正常常是一種明白地使人不悅的工作。無人喜歡聽人家說他的思想是錯誤的，他常常作的事情是愚笨的，報紙常常這樣做會喪失銷路，政客這樣做會喪失選票。兩者通常所做的是認可現存的錯誤以博得贊同。

本書詰難普遍廣播的信念，二十五年前比今日還要普遍的信念。這即是說以論辯和理由作伸訴的根據。如果你希望永保現存的信念，你可以利用習慣、莽斷，成見；倘使你想改變它，則不要如此。假定若干注意可供利用，如果我們要獲得實際的結果，我們盡人力所能做的，是從一組可能的考慮中，選擇那些經最後的分析證明爲決定性的與真的考慮。無論我對我的年青朋友說明「研究賭博方法的人輸了錢」，是如何的不完備，「太單純」，缺乏應有的品質，它是當時要下的決定之有關的考慮，而發明者的明顯的窮乏是一個有關的足爲確證的事實。但是人們仍然會傾莊家之所有，他們許曾經研究一種方法。

其真理是，原本的論點距離單純化還很遠，它們仍是不夠單簡。

因此，不管本作者曾盡最大努力將各論點簡單地與清楚地提出來，他似乎未能說明

首先一點——本書說什麼，它的宗旨如何。

三十餘年前，有一個人爲一種思想所困，他認爲世界被驅使陷於一種可怕的災難中。他極力主張呼籲注意，有如何常人信以爲自己看見本國趨於滅亡時所作的主張一樣。雖然是微弱的，他是這樣呼籲了。

但是那些說是聽他呼籲的人，以爲他呼籲什麼呢？不可能有災難，「戰爭現在已變爲不可能了」。

幾無一個評論本書的人不提及它的清晰與單純。從社會知有本書起，或者已有二十年時光了，人們所了解的它的使命與它的真正使命恰好相反。作者企圖用盡一切他所知的著重點與精確來說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繼續循舊路走，但是他却被解釋認爲戰爭是不可能的。

這本書現在你手中，它是簡本，它的更詳細的原本是可以購到的。因此讀者可以判斷它是怎樣預言「戰爭的不可能」了。

請讀者注意：

我從未在任何一本書、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時期，說過或暗示戰爭已是不可能，或者說它不能持久，或者說它只能繼續進行幾星期。我從未這樣想，且曾一再排斥這種思想，并在大戰許久以前便一再地說戰爭是極端可能的，事實上不可避免的，苟本書所

攻擊的政治思想仍然支配國際問題。

自明的事實誠然會從開始便消滅這個傳奇。如果本作者真正相信戰爭是不可能的，他爲何自尋煩惱——從事一種從勞無報的游說，以阻止他認爲永不會發生的事情？

在大戰前幾年，他慣於寫以下的抗辯：

「你太好了，你說我是『幾個不惜付任何代價以宣傳和平的人物中之一個，他不完全是個愚人』。然而你同時說我負有使命『向德國人游說在二十世紀發生戰爭是不可能的』。倘若我曾設法以這種胡言教訓任何人，我將是一個純然的愚人。我從未這樣說，就我所知，從未有人曾說過戰爭是不可能的。我個人不單認爲戰爭是可能的，而且是極端可能的。我在德國所講說的是德國從戰爭，尤其與我們的戰爭，獲利益是不可能的；這個說法自然是另一問題。

——人們驚異地發現，我最近幾年來曾設法引人作應有的注意的簡單事實，教訓我們：

(一) 戰爭現在是不可能的。

(二) 戰爭會毀滅戰勝者與失敗者。

(三) 戰爭會使戰勝者的處境比失敗者更壞。

讓我十分鄭重地說，我的著作沒有一篇曾作這種結論。

「相反的，我時常極力主張：

(一)戰爭不幸是十分可能的，人們對於若干基本的政治經濟的事實之無知，使之更易發生。

(二)沒有事物證明戰爭「毀滅」戰勝者與失敗者這個結論。事實上我不大明白一國的「毀滅」是什麼意思。

(三)以往，失敗者於失敗後所受的利益往往比戰勝所能獲得的要多，但這不是必然的結果，因此我們最穩妥的說法是假定失敗者會受苦最大」。

然而這一切都無用，毫無用處。這種傳奇似乎仍是一樣的生動。

人們許會說這樣一種經常的誤解必有其原因。有的。一部份是由於潛意識的「保護誤解」，我們用它防衛自己不為改革舊思想的意見所擾。如果我們能夠使自己確信新思想是背謬的，我們便不必費心考慮它們了。還有那個固執的與根深蒂固的宿命論，它是大多數人對於戰爭的盛行的態度，本齋一部份是對此宿命論之抗議。我們認為這是不易之理，戰爭之來臨是一種外來的力量，有如下雨或地震一樣，並不是我們所能左右的，而一個「不相信戰爭」的人，必定是一個相信戰爭不來臨的人；相信人類是天生和平的。人之所以作一個和平主義者，是因為他相信戰爭的危險事實上是非常大，或者因為他相信人類是天生極端傾向戰爭的。這個道理，在我們未把心中的視戰爭為不可統治的

力量的「必然」結局之宿命論除去以前，是不可思議的。

面對着這樣一種固執的誤解，一個著作者怎麼辦呢？倘若他是一個製造肥皂的人，有人說他的肥皂不足秤，或者他是一個食品雜貨商人，有人說他的糖一半是沙，他當然可以獲得很多的損失賠償。但他只是一個作者，曾用半生時光來研究他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問題，他是十分無助的，當一個疲乏的社論作家，或一個新聞記者放縱他的憤慨之情——或者他所想的似是他的讀者的憤慨之情——說明一本書是在要求這一件事時，事實上那本書所要求的是完全相反的事。

這會是多餘與討厭的，倘若我想詳細地表明戰後時期的事件會如何的完全證實了本書的一般建議，認為武力的勝利不能變為有利的經濟利益，勝利者不能拿走戰敗的敵人的財富，也不能轉移他的貿易，這種企圖結果只會使雙方都差不多同等依賴的手續脫節。慎重啊！

這是真的，最近二十年來不是全都不景氣。許多有關的國家曾有強盛利市的時期，雖然，現在回顧一下，這似乎是很清楚的，那種情形不過是病前的發熱而已。但是無論勝利者——英、法、美——是一時的登上利市的高峯，抑或陷入大失敗之坑中，用武力來使這種強盛永久或醫治不景氣，都是同樣無效的；它不能用戰敗者的財富以賠償自己

的損失，也不能「取」他的貿易以賠償它自己的貿易的損失。我們計劃從戰敗的敵人方面獲得的賠款，比我們借給他以清償我們的款少。事實上，如果我們把盟國的投機份子購買德國貨幣，後來證明不值錢的貨幣，所用的款也算在裏面，則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德國從我們——盟國——方面獲得的錢比我們從它那裏獲得的多得多。

關於此問題的文件現在是如山之多。單是此問題的書籍與文件的列表便會佔了本書數十頁的地位。

但是在若干點上，這一切都成過去。一九三二年的洛桑條約終久正式承認一種現代戰爭的賠款或賠償，與戰爭的消費完全同量的賠款或賠償，是不能清付的，它所舉的理由恰是一九一〇年出版的「國際迷夢」的「賠款之無效」一章內所十分愚笨地摘要出來的理由。

「敵對」這個念頭支配了我們第一個和平協定。我們真的相信我們「消滅德國的競爭」於我們有利，結果在對封鎖（戰事結束很久以後仍然保留封鎖，並不是爲了可以想像的軍事目的）與訂約都採取細密的步驟，以盡量消滅敵人的貿易當中，我們發現自己的貿易在這種過程中也受了同樣的損害，於是，經由倫敦市，我們進行借巨款給戰敗的敵人使他得以重新建立我們的海軍與條約簽訂人受盡痛苦來清除的工業與貿易。勝利者這樣借給戰敗者的錢最後達到某一數目，使勝利者也是債權人本身破產，這是指他需

以十五先鈴價磅的辦法清付他自己的債權人，即是，逼得放棄金本位並以落價的貨幣付款。這種落價貨幣之所以低落，是由於一個設在敵國的銀行，它不能應付人們因對英國盡義務的能力缺乏信心而引起的幣制的危機，而人們之所以對英國缺乏信心又是因為它，勝利者，借了一筆巨款給戰敗者。

這讀起來似乎是一章「雅麗斯幻遊記」。然而這是對史實的一種勇敢的陳述；並且構成「國際迷夢」的主題的完全的證明。

我們這個世紀會產生整個圖書館這樣多的經濟文章，描寫與詳述我們目前的慘况，這類文章事實上擴大了上邊的證明。

請讀者注意，這個證明仍然存在，即使他解說降臨於戰後世界的紛亂局面，破產，滅亡，並非因戰爭而產生；它是自然附屬於現行制度的，戰爭或不戰爭，它都會來臨的。因為，很明顯的在此時我們不能運用武力，勝利，來挽救現行制度天生的弱點所產生的形勢；改正這些形勢或改正產生這些形勢的弱點，是無效力的。

我們現在恐懼騷動，共產主義，階級戰爭。然而產生共產主義的局勢並不是共產主義者所產生的。我們曾經歷過可怕的財政的與經濟的革命——不單，甚或不是主要，在俄國；在西歐，現行的制度被顛倒了。然而那些騷動——在德國，在奧國、在義大利、在法國——都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工作，而是右派的「法律與秩序」的工作。那些

結局是保守黨政府戰前戰後所採取的政策之必然的雖不是預知的結局。

避免這些騷動的危險之唯一方法，是有效地討論產生這些騷動的經濟局勢。

「國際迷夢」所表現的公訴並不喪失其力量或重要性，如果我們認為目前的衰敗是由於現行經濟制度的，現在需要急激處理或一種外科手術的經濟制度之弱點。如果這是我們的見解，則本書的議論之重要性就在此一點。

倘若我們的病人，政治團體，需要一種外科手術，譬如說，一種主要的腹部的手術——他可能需要的——在動手術的前夕，他作一種酹酌的口角，致折了一只腿，破碎了他的頭顱，並罹一種嚴重的傳染病，這對於他並非一個好計劃。如果是動手術的時間，最重要的是首先明白時間已到了。然而在一九一四年，各國所感興奮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因為這個關係，看到這種需要的人不能使人明白這種需要；不相干的複雜因素之減少，並不會使人們更有機會決定施手術，與及於施手術時更有成功的希望。倘使我們能夠避免戰爭所產生的脫節的與複雜的局面，並把那些用於使疾病惡化的力量的些微部份引用於真正治療我們的社會疾病，則我們在使我們的文明成為更值得我們努力的對象之工作，已大有進步了。

第二篇所載的是「國際迷夢」的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各種版本之簡本。讀者可參照勝利與征服，參照這個事件，來對本書下判斷，並且根據這個事實，判斷在與

國際迷夢

以往相同的環境中，這些主張能指導政策至若何程度。

# 第一編

## 戰前版（簡本）

### 撮要

目前歐洲，尤其德國與英國間之競爭，其基本的動機何在？每個國家都說是爲了自衛；然而這是暗指有人會進攻，有人因利害關係要取攻勢了。每個國家都這樣疑懼它的鄰國，其原因何在？

其原因是由於一般人都以爲一個國家欲爲它增加的人口與增加的工業謀出路，或者爲自己的人民求得最妥善之環境，必需擴大領土以及用政治力量反對他人（德國海軍的競爭被解釋爲人口增加的一種需要，除非它們有保衛，這種需要將從克服英國的殖民地或商業求得解決，）於是便認爲一個國家的成功大部份決定於它的政治力量，國家是競爭的單位，利益最後屬於佔有優勝武力的人，弱者只有向隅，這與爲生存而競爭的其他

方式一樣一樣。

作者反對這整個的理論。他設法表明這種理論屬於已過去的一個階段；一個民族的商業與工業不復要倚賴它的政治邊陲的擴充；一個國家的政治的邊境與經濟的邊境現在并不需要一致；從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來說，武力是無價值的，與使用武力那個民族的成功也是沒有關係的；一個國家以武力來奪取別國的商業或財富——用武力壓迫或強要他人服從命令以自肥——是不可能的；簡言之，戰爭，即使得勝，也不復能達到人們所力爭的目的。

僅就經濟問題而言，他建立這種類似奇論，他證明在經濟方面已達文明階段的世界內的財富，是以信用及商業的契約為基礎的，（這是由於分工與交通的發展而生的經濟上的互相依賴之結果）如果我們因企圖把財富充公而干預到商業的契約和信用，則依賴信用的財富必受搖動，它的崩潰將使征服者受累；因此，如果我們要使勝利不至自蒙其害，我們必須尊重敵人的財產，在這種情形之下，勝利在經濟方面是無益的。如此，被征服的地域的財富仍然握在該地人民手中。當德國併吞阿爾賽喜阿的時候，沒有一個德人獲得阿爾賽喜阿的財產以作戰利品。現代的勝利是一種以X來乘，然後以X來除，得原數的過程。因為一個現代的國家，其土地的擴大并不能使其人民的財富加增，正如即使倫敦城併吞了赫特福德郡也不能加增倫敦人的財帛一樣。

作者同時指出國際經濟與工商業是互相依賴與混合的，因此一個敵人的財產的含混性會展延到他的商業上。政治的與軍事的力量實際上對於商業是不能有所作爲的；小國的商人與製造者，他們沒有這種權力，但是他們很成功地與大國的商人和製造者競爭。沒有政治權力的小國的公債往往比歐洲列強的價值高，比國三厘息的百元公債值九十六元，而德國的債九十二元；挪威的三厘半息的百元公債值一〇二元，而俄國的三厘半息的百元公債值八十一元。

使武力在經濟方面歸于無用之力量，同時也使武力無法推行一個國家的道德觀念或強迫被征服的民族接納種種社會的制度。主張的鬥爭已不復採取國與國間的戰爭這種方式，因為對於道德問題的意見的分野發生于國家的內部，是橫斷政治的邊陲的。現世界的道德的與精神的鬥爭，並不發生於敵國政府之間，而是發生于同一國家的人民之間，他們不自覺地在思想方面與他國的志同道合的人們合作。

這種以階層爲根據的分類，使人類的好鬥性有受重新指導的必要，這種重新指導是根據階級的與利益的競爭，而不是根據國家的區分。戰爭已不復有使適者生存的口實；它使劣者生存。國與國間的鬥爭是人類進化律的一部份這個理論引起生物學上的異體同功的一種誤解。

這些趨勢，大半是現代環境的結果（交通的快捷），改變了現代國際問題的性質；但我們的思想仍爲昔日的理論，原理，想像，及術語所支配。

## 第一章

### 經濟與戰爭的道義的理由

雖然目前英德間敵對的行爲結果必會引起衝突，但苟雙方仍以爲自己是根本爲了生活，爲了經濟的生存而鬥爭，則這種敵對的舉動將繼續進行。人口增加必須擴大領土，否則受餓，或者國家福利有賴於武力，如果這兩個理論是正確的話，則征伐自有其道義的理由，而非普通的和平手段所能解決的。在這個道義的理由獲得解決以前，和平運動者的說法將會失敗而且必須失敗。道義問題的解決有賴於經濟問題的解決。

一般人承認目前歐洲的競軍——其最著者如現在英德間的競軍——不能在現方式下無限量地繼續進行。每一方面都費同樣的力量來對付對方，結果到一個相當的時期，雙方相等的地位與原來一樣，而雙方所作的巨大的犧牲等於白費。譬如英德之間，如果英國說

它應該保持領導地位，因為它有錢，則德國可以反斥說它應該保持領導地位，因為它有廣大的人民，在一個組織完善的歐洲國家裏面，人民結果等於錢。於是，雙方都不肯讓步，因為他們覺得誰這樣做，誰就要惟對方之命是聽，這個地位是雙方都不能接受的，作爲這個滙退維谷的局面的一個出路，人們有兩個流行的解決辦法。其中一個辦法是少數份子所獻議的。他們在雙方國家內都被一般人目爲夢想家和空想家，他們希望以普遍的解除武裝，或最低限度彼此同意的縮軍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另一個辦法是一般人視爲較實際的份子所提議，他們確信現目這種敵對的行爲和時時發作的激憤必致發生一種武力的衝突，結果有限度的使某一方降至一個明顯的劣等地位，於是問題最少有相當時期獲得了解決，直至經過若干期間以後，均勢的局面已成，於是整個過程又重演一次。

第二個辦法被認爲人生規律之一：常人整日工作以求之生存的不變事實之一。在每一個國家裏面，那些贊成另一個辦法的人都被目爲不認識世界的事實，或被指爲對一個柔馴主張的支持比對他們的國家安全還看重的人；甘心削弱他們自己的國家的防禦力，只爲了確信將來的敵人不致兇惡地向他們攻擊。

對於這一點，現實論者往往反對衝突的定律。十九世紀所指教我們關於生命在行星上的進化的道理，現在大部份都用於這個生存競爭的哲學上。他們使我們注意一個道理

，就是適者生存，劣者而闕，所有的生命，有感覺的與無感覺的，都是一種鬥爭的生命。擴軍所蒙的損失是每一個國家爲求得自己的安全與政治力量而付的代價。大不列顛的權力是它以往在工業上獲得成功的一個主要條件；它的商業得以推廣，它的商人致富，是因爲它能夠把它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表露出來，能夠運用它的勢力於世界各國。如果它曾經統治世界的商業，那是因爲它的不可勝的海軍曾經統治，並且繼續統治，所有商業的出路。這是一般所相信的議論。

我不知道，最少在乏味的政治的世界內，曾否有一個知名之士詰難或辯駁過他們。甚至那些在鼓吹和平方面佔有重要地位的人，在這一點上也與各種吃軍火的人一致。斯泰德先生是英國的「大海軍派的領袖之一」。哈利松先生，畢生號稱哲學的和平首唱者，最近宣稱如果英國在競軍方面容許德國趕在前頭，「則饑荒，社會上的混亂，實業及金融方面的無數的紛亂，將成不可避免的結果。英國許可以繼續生存，但是在她再次自由地生存以前，她會失却一半她不能供養的人民，以及所有他不能保護的海外的邦國；……。在我們隨時可有不勝言的滅亡之危險的時候，在我們隨時需準備一種爲求國家生存的生死攸關的戰爭，一種最破壞及最殘忍的戰爭的時候，大談節約，和平，和友愛這種漂亮話，是多末無謂呀」。在另一方面我們英國的友好的評論家，如舒爾最加弗尼茲教授，他說：「我們需要我們的（是指德國的）海軍，俾能把英國在商業上的敵對行爲

止於一個無害的限度內，同時使英國人的清醒的心不敢作攻擊我們這種極度威脅的妄想。……正如我們每日所需的麵包一樣，德國的海軍是我們的生存與獨立的條件，不單是我們自己的，而且是我們的子孫的」。

遇着這種情形，我們一定會覺得和平主義者的通常的議論是完全不能成立了；它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很簡單。他自己接納了剛才說的前題，即是，爲爭取武力的優勢而戰的勝利者可以從被征服者方面獲得物質上的利益。這個設論甚至在和平主義者看來也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因此他不再費力去反駁它。他似乎寧願說：「武力奪取的行爲——偷盜——是有利的抑是不利的，這個問題我是不必研究的。這是不對的，我反對這種行爲，我希望較好的思想終有一天能佔優勢。」

和平主義者呼籲國際間實行他主義，因此他承認戰爭對於勝利者是有利益的，雖然這種利益是不道德的。這就是戰爭殘酷的話在他的宣傳品內佔了很大的篇幅，以及他非常詳盡地描寫戰爭的恐怖與殘忍的原因。

這種態度結果使這個忙碌的世界以及那些輾轉于實際政治的漩渦的人把和平的思想看成一種全善全美的目的，當普通所謂人性被改良到消滅程度時，這個目的許有達到的一日，但是苟人性仍如現在一樣不變，則這個目的是無法達到的。當一種確實的利益仍可由一個人的強大的右手奪取過來的時候，人們會覺得一個能自衛的人必招災禍，而

利益也將爲他人所奪取。

這種武力主義的哲學并不如普通所描寫的那樣殘忍或不道德。我們知道在現存的世界，在國際敵對的區域內，勝利也是屬於強者，弱者極少獲得人家的尊重。實業主義與商業主義也與戰爭本身一樣充滿殘暴——這種殘暴需要較長的時間顯露出來，比較細密，如果是較隱藏的話，同時也許比較戰爭較難引動一般的想像。無論我們用何種說法來解釋這種哲學，我們統統都會覺得在這個世界內，利益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意外事，往往變爲造成歷史的偶然而偉大的衝突之一因素。

男性的男子懷疑他應否爲戰爭「殘酷」這個口實所動。男性的人承認痛苦，死亡本身，是人人都準備冒的危險，甚至爲了賺錢這件細小的事情。沒有人因爲火車會偶然相撞而拒絕乘火車，或者因爲偶然會沉船而拒絕遊歷。其實平時的工業經常所要求的一種徵收，甚至在生命和血方面的徵收，也比戰爭苛重。只要注意從北面的工廠門口倒擁出來的千萬工人的——女的和男的——體格；留在家中的兒童的健康，工業使千萬人過來的生活，不必提到因築鐵路，捕魚，開礦，及航行而慘遭橫死的統計，也够叫人相信上面所講的事實了。甚至我們通常認爲戰爭所特有的「有意識的」殘暴，在捕魚及航行這種平時的實業裏也充分的表露出來。我們對熱帶地方的平時的行政，不單對好人的健康與生命作苛重課徵，并且引致一種人性的道德衰敗，其嚴重之程度與我們的「平時的」

工業與商業所引致的一樣。

與這種太平時代的犧牲互相比較，「戰爭的代價」并不得過分的高，許多人曾覺得一個國家利益的保管者不該畏避付這種代價，如果那些利益需要一種有效的保護的話。

當和平主義者在這種環境內回復他的道德的呼籲以反對戰爭的經濟理由時，他似乎不明白他並沒有解決了黜武主義者的——在這裏也是一般人的——道義方面的借口，而這種借口無疑的是非常有力的，如果我們承認了和平主義者黜武主義者都同意的經濟方面的假定。

如果這是真的，勝利的戰爭會為一個民族求得更大的經濟的好機會，而這些好機會又是生存與福利所必需的，是我們防止子孫受饑，并為他們準備必需品的唯一有效的辦法。則雖是一個經濟的任務，它可以道德的動機來作根基，因而獲得正義的理由。我們對付這個道義的借口的唯一辦法是駁詰他們的經濟的理由。但是和平主義者往往把論經濟問題視為卑鄙之事。黜武主義者於是說：

一切生活都是一種鬥爭。一個人是以排除他人而生存的。我們並沒有作這規定；我們發現的是如此；我們生於這個世界；我們被一個不是我們所定的法則處罰到這個世界。我們奮鬥，或者我們因失敗而自殺；對於自殺是沒有道德上的責任的。這個

道理對於國家和個人都是一樣的真確。我須作一種決定。即在一個機會有限的世界上，有些人要歸於失敗的，我是否願意那些失敗者是我的同胞，我的兒女，我對他們都需負責和有盡忠的義務的人，抑願意爲了異國的人民，我不須負何種責任的他人的子女，而犧牲我負有保護之責任的人。自私嗎？請注意，必要時我願意以我的生命來保護我的同胞，如此，自私的問題便不易發生了。但是遇到不是這部份人便是那部份人須受淘汰的時候，我便得着一種選擇；該爲那一部份人犧牲？我說爲我的那一部份人。你說運用武力不對嗎？那末當對方用武力的時候，我必須抵抗，否則便得錯誤的服從了。

現在你不能單以祈求正義。以道德的理由克服經濟的利益之方法，來答覆這件事情，因爲道德問題本身是發生於經濟問題的。

經濟的事實是道德的主張的一種實驗；我們必須握住他人的糧食的來源，否則我們自己便會餓死，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確的話，則我們施用權力自有道德上的理由。但是如果事實并非如此，則整個道德的論點將會改變，社會的視線與態度亦隨之改變。加之，因爲我們是選舉人，我們是國家的保管者，既然如此，我們有竭力求得它的昌盛之責任。因此，了解經濟問題是我們道德上的義務。

對於黷武主義者的假定，即是說無論如何錯誤，那個兵士是眞誠的，當他說他是爲他所承認的正義而戰。除了打戰或屈服，他沒有別的路，這個假定，和平主義者的主張不能予以一種初學的公正論斷。在這種情況下，反斥一切戰爭爲錯誤，只是一種假定的論法：正確或者錯誤，變成一個爭論之點。常那個相信自己是爲了正義而犧牲的兵士遇到和平主義者的「正義」的呼籲時，這個呼籲一定會激起一種很自然的憤怒。

不久以前，一個英國的神學者說，一切戰爭的根本原因是人類的自私和貪婪。我們試想想差不多每一個戰爭所予我們的景况吧，千萬青年人就死如赴宴一樣，母親們以微笑和碎了的心來送別他們；父親們以他們爲榮；千萬人受餓，過度的節省，以及年復一年地毫無怨言地受苦。是自私嗎？貪婪嗎？

戰爭之發生，並不是由於惡人在進行一種他們明知是錯誤的工作，却是由於雙方的好人在進行一種他們相信是正確的工作，支持他們所承認的正義，有如林肯打仗時所支持的一樣。這不是一件明知的與公認的錯誤對抗無疑的與公認的正義之事；是人們對於正義的一種誤解。

這不是一個如和平主義者的主張所常常暗示的道德意志的問題，是對正義的一種心理上的錯誤解釋。現在的問題是尋求這個錯誤發生於那一點上，是如何發生的。這種誤解的研究是一種心理上的澄清，而不是一種道德上的發掘工作；它須包括經濟情況的

檢討，因為正義與道德問題發生于經濟的衝突，或假定的經濟的衝突。

這本書並不想以經濟的理由來對抗道德的理由；它是想分析被認為因經濟的需要而生的道德理由；想分析一般人用作戰爭的道德上的藉口之經濟理由。

批評這種檢討為寧要「一種狹義的自私的請求」，不願愛護一個以正義與道德為根據之呼籲，這種批評結果必生出一種使和平的主張歸於失敗與無效之混亂思想，同時使成為戰爭的禍根之誤解繼續存在

這自然不是說經濟的動機應該支配生命，但是如果經濟問題得不到解決，則經濟的動機將成為生命的支配者；一個飢餓的人他最先想及的是麵包。欲轉他們的精神於別的事情上，必先使他們得飽。

茲將我擬發之論點略說如下：

1. 除非經濟的困難獲得解決，使老百姓能得一種過得去的生活，經濟的理由與動機必將擯除一切其他的理由與動機。使精神上的理由有機會接近普通男女之法，不是把經濟的困難擱在一邊，是尋求一個解決這些困難的方法。在經濟的窮境未獲得解決以前，任何一個解決道德的困難辦法都是不充足的。如果你想銷除經濟上的成見，必須解決經濟上最困難的問題。

2. 同樣的，國際間的經濟的衝突之解決，其本身並不足以樹立和平；但是在這種衝突未獲得解決以前，任何一種和平都是不可能的。這就足以造成它的重要性。

3. 發生于國際政治圈內的「經濟」問題——爲達到經濟目的而運用政治力量——也是權利的一種，它包括權利中的基本的一種權利，即是生存的權利。

4. 我們所給予這個權利問題的答覆，將以我們對這本書的主要疑問的答覆爲根據；一個人口繼續加增的國家是否須用武力來擴大它的領土或商業以求生存？爭取土地的政治的統治之鬥爭是否就是爲求得麵包的鬥爭？

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因爲「經濟」是可鄙的，等於拒絕認識人生的需要與形成人生的各種力量。這種態度，自命爲提倡道德，結果等於否認他人生存的權利。它的最大的缺點，是它的誇張的語調對於精神上的正義，對於真理，都是最有害的。沒有一個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社會可以立足的。

因爲人們對經濟與道德的關連的事實沒有充分的認識，致許多和平的宣傳歸於失敗；歐洲各國的輿論，不但沒有抑制政府擴軍，並且督促它們作更大的消費。支持這種情緒，並且爲它辯解的，是若干公認的假定，如國家的權力等於國家的財富，國家的利益；擴大領土等於增加發展工業的機會；強大的國家可以保證人民的好機會，弱小的國家

便無能爲力等等。例如，英國人相信他的財富大都是他的政治力量，他的政治的統治，主要的在他的海軍的結果；人口繼續增加的德國一定覺得自己正「被包圍得如鋼鐵一樣緊」；它將爲求得活動的範圍而戰；因此如果它不從事自衛，必將爲人所吞併。他當然寧願做食餐者而不願做餐宴了。

承認了他的前題 這些前題是一般人所接納的，舉世的國際政治的原理——誰還會說他是錯誤呢？

## 第二章

### 公認的原理

本書的目的是對一種公認的原理提出疑問。這種原理認爲一個國家的武力可以運用於增進它的經濟的福利，它對世界財富的分潤的要求是倚賴它的武力來實現的。各種引證表明這種假定確爲一般人所公認，並且成爲國際政治的主要動因。

但是前章結尾所講的前提或原理是否無可詰難？

一個國家的財富、強盛、與福利有賴於它的武力，這是不是真的？

一個文明的國家能否藉武力征服他國而獲得精神的或物質的利益？

被征服的土地是否可以增加勝利國家的財富？勝利的結果是否會使某一羣所有者的財產移轉到另一羣所有者的手裏？

一個國家是否能如一個人或一個公司「佔有」一份財產一樣的一佔有「他人的土地？」

財富或商業將否因勝利的結果而從失敗者手裏轉移到勝利者手裏？德國能否用武力「奪取」我們的商業及殖民地？

它能否把英國的殖民地變成德國的殖民地，以槍劍來獲得它的海外帝國 如大不列顛以往獲取它的一樣？

一個現代國家是否需要擴大它的政治境界以供給它的繼續增加的人口？

如果大不列顛明天可以征服德國，完完全全的征服它，使它的國體化為塵土，一般英國人的境況會因此更佳嗎？

如果德國可以征服大不列顛，一般德國人的境況會因此更佳嗎？

所有這些問題都須報以否定的答覆，這個似乎污辱了常識的事實，表明我們的政治原理是如何的需要修正。

論及這個题目的文章，毫無疑義地證明我已在前章正確地敘述了這問題的前提。那些對政治學或外交術的哲學有特殊研究的人，由馬基阿末利與克勞塞維茲至羅斯福先生與德王，都沒有使我們對這個論點發生半點疑惑。整個觀點已由兩個有名的作家——英國

方面的海軍上將馬罕，與德國方面的斯頓該爾男爵（第一次海牙會議的德方第二代表）——堂堂赫赫地概括言之。

海軍上將馬罕說：

「誰有權力誰該奪取」，這個老舊的掠奪本能仍然存在……解決爭端，道德的力量是不夠的，除非它有物質的力量支持。政府如公司，而公司是沒有靈魂的；政府也是保管者，因此它們須把它們的守兵——它們的人民——的合法利益放在第一位……德國漸漸更需要原料確實的輸入，並且，可能的話，統治出產這些原料的地方。它漸漸更需要糧食輸入的保證與確實的市場，因為由於它的人口增加，在它自己境內所出產的糧食更漸漸顯得不足了。這一切都表明需要海上的保護……但是大不列顛在歐洲海上的優勝權等於對德國的商業作一種永久的統治……世界久已慣於一個優勝海軍權力的觀念，並且把這個觀念與大不列顛的名字連繫起來。同時一般人認為這種權力如果獲得了，是與商業的和工業的優勢有相連關係的，爭取這種優勢的鬥爭現在英德間進行着。這種優勢逼使一個國家去找尋市場，可能的話，用優越的武力統治它們，以求自己的利益，這種力量發展到極點時，便是對那些市場的佔據……這個動作生出兩結果，企圖佔領及組織武力以保衛已獲得的市場……這種陳述不過是一般需要的一種特殊定式而已；在一串合於理論的

連繫中——工業的市場、統治、海軍根據地——它是不可免的一環。

斯頓該爾男爵（一個賦有自由主義的見解的政治家，也是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的德國代表，）在他的書內說：

「每個強國必須盡可能地努力運用它的最大影響於歐洲及世界政治，因為經濟的力量最後要依賴政治力量，又因為求得盡量參與世界商業的機會是每個國家的重要問題。」

爲了證明以上兩個引證並不是一種特別的或不平常的見解，而是現世界所公認的政治哲學，是一種鼓動政府行動及解釋他們的政策之羣衆的意見，我從手邊流行的報章及評論雜誌摘述如下：

「是我們的海軍的武勇……：我們在海上的優越地位……：建立了大英帝國與它的商業。」——泰晤士報社論。

「因爲它的貿易有受無限損傷的可能，又因爲它的人民要依賴貿易以獲得糧食，要依賴工金以購買糧食……：英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海軍，一個支持海軍的完善的組織，以

及防衛的軍隊。在這一切還未具備以前，這個國家將永遠受到德國的大胆者之在生長中的海軍的威脅，這個在生長中的海軍已把黑海作爲它的訓練場。一切的保證將會消失，而英國的商業與工業，在無人預知明日將發生何事的時候，一定會迅速地衰落，如此便加促了英國的退步與衰落。」——威爾遜在在一九〇九年五月份的國民評論發表的文章。

「海軍力是德國與國際貿易的優越地位之間最後的障礙。目前德國只能運輸約值五千萬磅，或七分之一，它的出產品到美國及歐洲以外的市場，……明瞭這個問題的人，會否以爲德國或世界將有一種力量，它可以阻止已完成第一期工作的德國，爲了在二萬萬四千萬磅的海外貿易中求得更大的一份，與英國肉搏？我們在此暴露這個一如真像的陰影，它支配目前一切的外交活動，同時支配作爲爭取制海權的好鬥爭的一種準備之巨大的擴軍。」——基德先生著於半月評論，一九一〇年四月一日

「除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一致答應放棄一切自私的野心，談『限制軍備』是無效的……國家，如個人一樣，最關切的是它們自己的利益，當這些利益與他人的利益發生衝突時，鬥爭必隨之而至。如果受壓制的一方是個弱者，無論它是如何的有理，他也往往向隅，而那個強者，無論他是個侵略者與否，他往往得以如願。在國際政治裏面，

經濟該始於本國；一個政治家的責任是首先爲他自己的國家的利益切想。——*聯益雜誌*，一九〇九年五月。

「這個大英帝國是如何建立的？戰爭建立這個帝國——戰爭與勝利，當我們因戰爭而統治了全球三分一有居民的士地，當我們向德國提議縮小軍備，縮小它的海軍或減小它的陸軍的時候，德國當然拒絕了；它公道地指出英國以刀劍在手攀至它現在無敵的優越地位之路子，并且公開地，或用外交詞令，稱宣，如果沒有別的辦法，德國決取同一路徑向上升：我們當中，知道這個國家的歷史，知道那些曾使人類紀事增光的國家與城市的歷史的人，誰能譴責德國，或者對它一年半以前所發的（或者柏思哈特將軍三個月前所發的）一個最偉大的聲明不生一種尊敬之念？」——*羅伯特男爵所著*，「給國家的追牒」第八至九段。

「國家的本質，它們的產生，活動與死亡，都爲統治一切生命、植物、動物、或國家的同一法則——鬥爭的法則，生存的法則——所統治。……」

「以國際仲裁來替代統治政治本質的自然法規，這個思想之所以發生，不單由於它否認了自然法規的意旨與忽視了它的實施，并且整個地誤解了戰爭的原因與意義。」——*利將軍所著*「無知的勇氣」第八十八頁。

「讓我們想像英國的海軍打了一個敗仗，大不列顛從它海上霸主的可驕的地位降抑下來……德國需多久才派軍隊在角鎮及依利沙伯港口登陸？我們美國的從兄弟需幾久始發現加拿大及西印度羣島變為美國的一部是一種顯然的命運？羣鼠將從全球的每個角落會集起來吞噬這個將死的身軀，這對英國的工業將有怎樣的影響呢？日本奪取我們澳洲的商業，俄國奪取我們印度的商業，美國奪取我們加拿大的商業，大筆戰爭的賠款需清付，同時市場又弄得紊亂非常。破產的資本家，寂然無聲的工廠與失業者——這就是答案。

「一切歷史的教訓是商業在武力的庇蔭下生長。我們不是曾經與荷人及法人戰爭以奪取印度的商業嗎？我們不是曾經是最強大的國家而戰敗了荷蘭及法國嗎？如果我們不是獲得了制海權，我們可以戰敗荷蘭或法國嗎？

「裁減軍備不會消滅戰爭；你不能在一個競爭的文明制度內廢止戰爭；競爭是這個文明制度的根基，而競爭就是戰爭。當一個商店用減價的辦法來壓倒一種商業在市場上振興時，它所經的過程有如一個商業國家用武力來壓倒一個商業的對手一樣；手段各有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貫的，而問題中道德的理論是相同的。在這兩種場合內，弱者都得回購：在這兩種場合內，失敗者總是不幸受罰」……「為麵而鬥爭」，利夫曼著。

「擁有日下的人口的大不列顛，是藉它的對外貿易以及它對全球運輸的統治而生存的；打敗仗將使以上兩種專業轉移到他人手裏，結果大部份的工資生活者流爲餓殍。」——馬丁於『世界雜誌』。

「我們奉獻一個很豐富的戰利品，如果我們不能保衛我們的海岸；我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我們所獻的戰利品將爲或人所得，他的力量足以克服我們的抵抗，并吞併我們一大部份的財產。」——英國下議院院長在格累斯托克演詞，泰晤士報紀錄。

「我們似乎忘記了基本的真理，已經所有歷史證實的真理，即好戰的民族將繼世，自然規定在永無止境之生存競爭中，適者生存……我們切望減軍，我們尊敬獨立新教信徒的良知的溫柔誘導，以及鸚鵡似的複述那個誤人的，『英國最大的利益是和平』的信條……這種種行爲必難免給那些垂涎我們的財富及領土的人……一種給帝國的心臟——無防衛的倫敦——以迅速的致命的打擊之野心。」——布拉克武德雜誌，一九〇九年，五月。

這些是英國方面的意見，但是其他歐洲人士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與它毫無差別。

在第一等古文權威者的文章內如克勞塞維茲等，我們看到完全認許上述意見的文字而這些意見却是討論世界政治的最流行的德國政治論文之特徵。

上述的危機，甚至那些真心期望和平的人，絕不是極端愛國主義的人，也深切的感覺到。他們憂慮程度之深，可於哈禮孫先生的話見之。詳例舉證，我以為并不是錯誤的。在給泰晤士報的一封信內，他說：

「如果我們的帝國及海軍霸權遇到挑戰時，這個挑戰一定發生于一種武力的侵略，非利普與巴馬，以至拿破崙都計劃過的武力侵略。這個必定的事實逼使我修改我不斷地主張了四十年的反躡武主義的政策。……：在我看來，現在不是喪失威信的問題！不是帝國低落的問題；是我們做一個第一流的歐洲國家，甚至做一個強盛的國家的問題。……：如果我們的海軍防衛打破，我們的海軍一個時期被壓倒甚或解散，同時我們的兵工廠，船塢，及首都被一種武力佔據，則我們將遭遇現代歷史上無與倫匹的滅亡。被消滅的，不是帝國，而不是不列顛；對於我們，一個成功的侵略，即等於我們的帝國，我們的商業，以及島上四千萬人的一向倚賴商業維持的生計，都整個崩潰了。如果有人問，『爲什麼侵略對於我們比對於我們的隣國會生更可怕的结果？』答覆是：英國是一個異狀的結構，在現代史上沒有真正可與匹敵的，只有在葡萄牙，威尼

斯·與荷蘭史上，以及在古代史上的雅典與迦太基可以找到類似的組織。我們的帝國特別易受攻擊和毀滅。如果它被一個位於泰姆斯的敵人所毀滅，其結果的可怖是不能預料的，所以單獨一條防衛線是不足以保衛它的，無論這條線是如何之優良，目前是如何充實。……我反對任何方式的侵略，海外領土的擴張，以及大陸的軍國主義，至今已四十餘年了。很少人有我這樣熱誠的反對把社會改良及人民的福利放在次要地位，而重視海外領土的征服，以及亞洲與非洲的冒險。對於曾經發表的話，我並不食言。但是，在我們的國家未能避免一種將使老百姓陷于不可言狀的窮困與痛苦之災害——將摧殘工業，使糧食的價格增高，同時關閉我們的工廠與工場——以前，一切工業改革等理論，是如何的空洞喲！」

### 第三章

## 國際迷夢

雖然前章引證所表示的見解是一般人的見解，它們忽略了我們的宇宙之明白簡單的事實，因而造成一種粗劣的與危險的錯誤觀念。現代世界之征服的結果并非是一組的原主或商人的財產或商業轉移到另一組的原主或商人手裏，僅是一種政治統治的更易。如果領土的奪得可以增加勝利者的財富，則大國的人民將比小國的人民富有。事實呢。就說亞爾薩斯洛林的「現金價」吧。誰取稅錢呢？

我以為大家都會承認的，前章末所引的例證之大意，很少有叫人誤解的地方。哈理遜先生說得特別明確。冒着「可咎責的復述」的危險，我將再次提出一個事實，就是他只發表了關於歐洲政治的公認的原則之一種。這個原則以為一個國家的整個經濟上的安全，它的財政的與實業的安定，它的商業機會，簡言之，它的強盛與福利，有賴於它之能夠抵抗他國的侵略。而這些國家，如果有力氣，將企圖進行這類侵略，因為如此它們

便會在犧牲弱者與被征服者的情形下增加它們的權力，因而增加它們的強盛與福利。

我所引的例證大都是新聞記者，政論家，各種公法家的言論。因為我想表出不單學者的意見，就是真正影響政治的一般意見，雖實際亦即學者，國際問題專家的意見，也與一般輿論一致地接納那種作為這些態度的基礎之假定。這個假定認為武力，如果夠強大的話，可以把財富，商業，財產，由失敗者手裏轉到勝利者手裏，武力這種潛伏力量說明每個國家都需要軍備。

本篇的目的在于指出這種普遍的思想是一種錯謬而且極端危險的誤解，它有時帶有幾分錯視的性質，有時又帶有幾分妄信的性質。——這一個誤解不特是錯謬和普遍的，並且很危險地誤導人類一大部份的力量，除非我們能從這個誤解中解放出來，人類的文明也將會受到威脅。

這整個問題的最非凡的特點之一，是它對於謬見的整個指示，對於產生謬見的迷夢的揭發，並不混亂，也沒有可疑之處。這個指示並非以任何苦思出來的法則做基礎，而是根據在我們週圍進行着的歐洲經濟生活的最明顯的事實之最簡單的敘述。這些事實的本質可以如下的定理表示之；

1 對於不列顛因被征服而受的災害，其程度甚至幾與哈理遜先生所預示的相若的災害，那個侵略勝利者也只能用作一種很浪費的處罰手段，或者，作為一種加害於人的不

自私的與昂貴的願望，它的加害于人只爲了這個行爲本身是種快樂的。因爲商業有賴于天然財富與可以開發這個財富的人民，一個侵略者不能「完全毀滅它」，除非他把當地人民毀滅了，而這是不能行的。如果他把人民毀滅了，他便會毀滅了他自己的市場，實際的或可能的市場，這等於商業上的自殺。在這個專圖私利的世界內，假定有這樣一種倒置的利他主義存在，那是不合理的。

2 如果德國的侵略，有如哈理遜先生和與他同一思想的人所說的，真的會使「帝國」，我們的商業以及供養島上四千萬人口的資金總崩潰……會使資財動亂及破壞信用」，那末德國的資財也會因現代金融，商業與實業之國際化及互相依賴性而消失一大部份，德國的信用也會崩潰；恢復原狀的唯一辦法，是德國消滅產生紛亂的因素以制止英國的紛亂狀態。

3 爲了類似的理由，在我們這個時代，向被征服的人民強索貢稅，從經濟觀點來說是不可能的；強索大量的賠償是一件很困難而且直接與間接都非常浪費的事，因而是一種極端不利的經濟動作。

4 爲了與上述同一性質的理由，以武力的征服來奪取別國的國外貿易與運輸業，從物質和經濟兩方面來說都是不可能的。巨大的海軍，對於替擁有它們的國家創造貿易，是無能爲力的。而且，在太平的時候，對於「限制他國的商業競爭」它們也毫無辦法的

• 一個戰勝者亦不能以併吞的方法消滅一個被征服國家的競爭；他的競爭者仍會與他競爭——即是，如果德國征服荷蘭，德國的商人仍需對付荷蘭商人的競爭，且而比原來更尖銳的競爭，因為荷蘭的製造家和商人從此便在德國關稅的邊境內了；敵對者間的商業競爭，可用征服所有敵對者的手段收拾之，這種觀念是奇異錯覺的實例之一，而這個錯覺就是支配這個問題的誤解之後台。

5 一個國家的財富，強盛，以及福利絕不依賴它的武力，我們應該尋求商業上的強盛；沒有這種權力的弱小國家，它們的經濟狀況與福利該明顯地低弱于統治歐洲的大國，然而事實并不如此。瑞士，荷蘭，比利時，丹墨，瑞典等國的人民，其幸運與德意志，俄羅斯，奧地利，以及法蘭西等國的人民毫無分別。弱小國家的每個人民的財富往往比大國的多。這裏所引起的不單是小國的安全問題，我們可以力指為因中立法條而生的安全問題，還有武力是否可轉為積極的經濟利益的問題。

6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從征服英國的殖民地獲得物質上的利益，同時，無論感情上對于這種「喪失」是如何的悲恨，并認為使有血屬關係的人民間的某種有用的社會合作增加困難，英國「喪失」了那些殖民地，在物質上實沒有蒙到損失。用「喪失」這個名詞是令人誤解的。英國並沒有「佔有」它的殖民地。實際上，它們都是與母國攜手的獨立國家，它們之于母國，并不是一種經濟的利益或貢稅的本源（只有把它們看成外國，才

是利源），它們的經濟關係并非由母國決定，而是由殖民地自己決定的。從經濟方面來說，它們正式與英國分開，對於英國是有益的，因為如此它可以減免對它們的防衛費。它們的「喪失」沒有引起經濟上的基本的變化（除了替母國省了一筆保衛它們的費用），并不能招致帝國的滅亡與母國的饑荒，如那些平常討論此事的人所斷言的一樣。既然英國不能強求貢稅或經濟的利益，對於管理殖民地的經驗更少的任何其他國家，而能獲得英國經已失敗的成效，這是不可思議的，尤其當我們看過西班牙，葡萄牙，法國以及英國的殖民地的地位，從我們現在所論說的來說，與自治的國家（即是，它們的賦稅政策有變為它們自己的事情而非母國的事情之傾向。）的地位沒有明顯的差別。因此我們不必假定任何一個歐洲的國家，在明白了上述的事實以後，還會爲了獲得一種所有殖民地史都指明終必失敗的試驗，而企圖做征服英國這個極端浪費的買賣。

剛才所略述的定理——它們充分地研究上章引證的英方與德方所發表的一般意見——不過是歐洲目前的自明的事實之一種陳述。但是這個自明的事實之陳述完全反駁了我所引證的見解，而這些見解却是國際政治的公認的原理。爲對較起見，我會把我的定理分爲六段，但是這個分法是很無理由的，所有的定理可以集合於一大段內：

現代一個戰勝者准一可以實行的政策是把征服地的財富習交該地居民，以爲一個國

家增加了土地便等於增加了財富，這簡直是一種謬見，一種迷夢。當一省或一國被併吞時，身爲當地財帛的所有者之居民也被合併了。政治的統治會更易，無論是好或是壞的，但是這一組所有者的財產却不會轉移到另一組所有者的手裏。現代歷史的事實有許多這種例證。當德國併吞了什雷斯維克荷爾斯泰恩與亞爾薩斯洛林的時候，沒有一個普通的德國人因奪獲了征服地的財產或貨物而致富。武力對於它的國家在商業上及福利上所蒙的損失并不能有所補償。它不能用於奪取或保存貿易。以爲陸軍與海軍可以用來把弱小的競敵者的商業轉移到強大的競敵者手裏，這個思想真是一種迷夢。雖然英國「佔有了」加拿大，并已完全克服了加拿大，英國商人却被（假定是）美國的或瑞士的商人從加拿大的市場驅逐出來。大國并没有銷滅也沒有轉移小國的商業到他們自己手裏，因爲他們不能這樣做。武力并不能決定各民族的經濟地位。政府沒有多大兵力的荷蘭人，與政府擁有二百萬大軍的德國人一樣富饒，與政府擁有四百萬大軍的俄人相比，則其境遇且遠勝之。一個商業機構或一國的經濟的穩定程度大都以它借款所付的利率而定；危險與不安穩可以很快地由它該付利息的提高反的出來。因此作爲對上述各國的財富與安穩的關係作一潦草的，不完全的說明，我們發現在倫敦市場，利息三厘的荷蘭弱國的公債，每百元約可售九十六元，而強大德國的利息三厘的百圓公債，却只值七十五圓；擁有一萬萬二千萬人口與四百萬大軍的俄羅斯帝國，它的三厘半的百圓公債只值七十八圓，而

無一兵一卒的挪威的三厘半百元公債都值九十八元。

如果哈理遜先生是對的；如果，有如他說的，我們若讓妒忌我們的隣人在軍備上佔優勢，并在世界運用政府力量，則我們的商業，我們工業的生計，將會消失。那末，大陸列強被那些力量遠不如他們但在商業發展上往往與他們相等甚或過之的小國所側擊，對於這個事實，他將如何解釋呢？如果這個普通的理論是正確的話，金融家便不會在沒有防禦的國家內投一磅或一元的資本了。然而，事實遠非如此，他們認為向瑞士投資或向荷蘭投資比向德國投資更為安全；就安全這一點來說，在像瑞士這樣一個國家經營實業，比在一個有三百萬全球訓練最完備的軍隊做後盾的國家經營更佳，行動反映出來的歐洲金融家的意見，與行動反映出來的歐洲政治家的意見完全相抵觸。如果一國的貿易真的需唯第一個成功的侵略者之命是聽，如果保護與增進貿易真的需要陸海軍，則小國將處於一種無望的卑下地位，并且僅能賴那些橫行的侵略者的寬容以生存了。然而，從人口的比較的來講，挪威的運輸業比英國的還大，而荷蘭、瑞士、以及比利時的商人都成功地與德法兩國的商人在世界各市場上競爭。

小國的昌盛，是一種事實足以證明不需軍備亦可獲得財富這個理論。正統派政策的代表人——如馬罕海軍上將等人物——辯論軍備是國與國間的經濟鬥爭的必需部份，沒有這種權力的國家，在經濟方面是不利的。

小國的經濟地位證明這種理論是不確的。當我們知道俄國或德國所有的力量都不能為每個人民獲得比小國更好的經濟環境時，這一淵博的哲學只顯得是博學的胡言而已。瑞士、比利時、或荷蘭等國，它們沒有「管轄權」，沒有海軍，或根據地，或「歐洲各種會議上的力量」，或「一個強國的威信」，但是它們的人民却與德國的人民一樣饒富，其境況且遠勝於奧國人或俄國人。

即使人們可以爭辯說小國的安全是由于各種條約保證它們中立，但是他們不能辯說那些條約予它們以陸海軍的力量，國際各種會議上的力量。而這些力量是海軍上將馬罕與其他正統派政策的代表人目為國家強盛的必備條件的。

我要盡力指明我所想強調辯論的限度。我的辯論不是說上述的事實表明軍備的有無是國家的貧富之唯一的或決定的因素。也不是說廣闊的國土沒有好處。實在是有好的（例如，關稅與賦稅的闕如）。但是上述的事實却表明財富的安穩是緣於軍備以外的東西；政治的與軍事的力量缺乏，對於一國的昌盛并無防礙，同樣的，這種力量的佔有亦不能保證一國的昌盛；統治面積之大小與該地居民的財富沒有相連的關係，正如一個住在倫敦的人，他不會因為倫敦城較大，且有較大的預算，而比一個居住於利物浦的人富有。

對上述論辯的一個很普通的答覆，是小國的安全也需倚賴軍備——保證它們中立的

國家的軍備。但是如果條約的保證足以保護小國，爲什麼不可以保護大國呢？當我們這樣獻議時，黷武主義者一定會轉過來說條約對於保護國家的安全一層是無効的。於是麥累少校說：

「一切條約最後的去處是歐洲的字紙簍，在隨時可以擲於字紙簍內的東西上面繫着我們國家的安全是無謂的。但是這個國家仍然有許多向我們引用條約，好密我們可以倚賴它們，因爲它們是永不會被撕破似的。他們是非常巧舌的與非常危險的人——是理想主義者，對於這個以力量爲主要法則的艱苦殘酷的世界，他們實在是太好太天真了。但是甚至現在的議會內仍有這種天真的人。我們希望將來的議會不復有這種人存在。」

然而，如果一國的財富的安全只能由權力加以保障，條約只是廢紙而已。那末比較沒有權力的國家，它的財富却獲得明顯的安全保證，對於這個事實，我們將作何解釋呢？是由於保證它們中立的那些國家間的互相嫉視嗎？那末互相的嫉視也同樣地可以保證任何一個大國的安全了。

對這個現象的正確的了解，需有若干區別，即經濟的安穩與政治的安穩之區別。小國的政治的安定不是確實的；如果德國想嚴重地威脅荷蘭，無人會大注的賭賽它能夠保

存它的完全的政治獨立。但是荷蘭的經濟的安穩是確實的。歐洲每一個金融家都知道如果德國明天征服荷蘭或比利時，它需原封不動地留下它們的財富；充公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沒有充公的危險，并且最少還可免付一部份的軍費，這就是小國的債票比陸軍強國的債票高十五至二十點的原因。從政治的意義來說，比利時明天許會消失；它的財富將大致保留不變。

如果侵略者與金融家，特別是專家，認識了這個真理——一個沒有保護的國家的財富是安全的，人家不能奪取它——則政治的危險，侵略的危險，將從何來？原因是侵略者，金融家，商人用來處理他們熱識的宇宙事件之已承認的真理，並沒有應用於他們較生疏的政治思想。一般商人沒有看到他做商人的日常行為與他鼓勵政府採納的政策間之矛盾。他以為大量地投資於沒有海陸軍保護的事業是一件事，稱讚哈理遜先生——當哈氏說只有英國海軍能阻止外國人在我們所佔有的財物內取一辨士，或者類似的話——又是另一件事，兩者無調協之必要。

金融家與投資者所實行的真正政策暗示他們并不相信優勝權力可以「取得財富」。但是各處仍在追求優勝的權力，認為這是國家致富的手段。在歐洲的政治裏面，權力成爲比一切都引人渴望的目的。例如，德國有汎德意志主義者。這個團體的目的是把歐洲所有的條頓人團結在一個強大的國家之下。如果這個目的可以達到，則德國會成爲大陸

的最有勢力的國家，并且許會成爲全世界最有勢力的國家。依照國家利益那個公認的理論，這樣一種成就，從德國的觀點來說，是值得德國人的任何犧牲的。這是一個如此重大，如此稱心的成就，德國人民應該毫不猶豫地貢獻一切，甚至生命，以求其實現。很好。讓我們假定在付了重大的犧牲，一個現代文明國所能付的最大的犧牲後，目的達到了，比利時與荷蘭與德國，瑞士與奧大利，都變成大德意志盟主的一部份；有那一個普通的德國人民可以說這種變遷會增進了他的幸福。德國從此「佔有」荷蘭了。但是有一個德國人因此種「佔有」而更加富裕嗎？荷蘭人將由一個細小而且無足輕重的國家的人民，一變而爲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的人民了。這個荷蘭人會因此更富有或幸福嗎？我們知道事實上無論德國人或荷蘭人，其境况都毫不會因此更佳；我們也知道兩者的境况十之八九會變得更壞。我們可以說，荷蘭人的境况一定比以前壞，因爲以前他只需對荷蘭政府付輕微的捐稅及服短暫的兵役，而現在却要對「大」德意志帝國付重大得多的捐稅與服長久得多的兵役。

對這裏所闡明的論題，即現代的武力征服只引起政治統治上的變遷，無論是好是壞或是無足輕重的，却不能把一組所有者的財產轉移到另一組所有者的手裏。一般人最普遍的反駁是我忽略了征服者可以徵收捐稅。這些批評者說，這是真的，現代的戰勝者必須負重被征服國人民的權利，因爲因它們的毀滅而生的破壞與不安穩局面將會（幾是不

船避的。影響到戰勝國人民所持有的按揭品，商業證券，公債等，換言之，將會產生一種有危險的反應之破壞。他們說，這一切許都是真的，但我忽略了戰勝者可以徵收這個事實。這是真的，當德國攫取了阿爾賽喜阿時，該地的人民仍保留着他們的田畝與房屋；但他們向德國而不再向法國繳稅了。於是一個每日郵訊的作者辯論，「如果阿爾賽喜斯林仍是法國的，按照現在法國的稅率，它每年將繳交八百萬的國課給法國。法國失了這個收入，而這個收入現在却在德國的支配下了」，并且以這點為根據，每日郵訊的金融家還計算出法國失了與德國得了的財產的現金價值。

本書初次問世以來，這種批評已不只一次或兩次了。有學識的人，寫信給我，指出這種「失察」，凡數百起。我確沒有充分地想過這件事；國庫收入的加增必然使一國富裕。在這些批評裏面，永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理論的語句上的矛盾。

每日郵訊評論家說，「德國」現在因每年八百萬的收入而更加富有了，如果不是打仗勝利，這筆收入便屬於「法國」的。但在歸併了以後，「德國」是誰或是什麼？「德國」現在包括有阿爾賽斯林人，他們不單納稅并且收稅——即是，如德國人一樣多的收稅。他們屬於「佔有」這份財產的新團體。受納者的人數與貢獻者的人數，其加增率是完全相等的。

對於這個評論，我答覆如下：

征服是以X相乘的，這是真的，然而我們忽略了它也是爲X所分的事實，結果，就個人來說，是與前一色一樣的。我的批評者正確地記着乘數，但是他却忘記了那個除數。阿爾薩斯洛林對於皇室金庫的登記式的貢獻（不意這個數目不是三百萬，也非八百萬，只是一百萬而已），其比率規定與帝國的其他國家完全相同。普魯士這個戰勝者，每人所繳的稅，與阿爾薩斯這個戰敗者，每人所繳的稅，是一樣的，沒有多也沒有少，而且，如果阿爾薩斯不繳一百萬給德國，它也要付這筆稅——據我的批評者說，是更巨大的數目的稅——給法國；同時如果德國不「佔有」阿爾薩斯，它便可以減輕不祇一百萬而是數百萬的負擔，「所有權」的更換並不就是佔有者或被佔有者的財產地位的更換（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

如果一個大國每次吞併一個領土都可以獲利，而它的人民也可以因領土更擴大而更富有，則小國該比大國貧乏得多了，然而，任你喜歡使用那一種試驗——公債，儲蓄銀行的金額，生活程度，社會的長進，一般的福利——小國的人民，其他條件是平等的，其境況與大國的人民一樣饒富，或且過之。

如果德國因征服阿爾薩斯洛林這樣一個領土，每年獲得了八百萬而致富，英國人民該從他們的「佔有地」獲取多少財富呢？以人口作標準，約爲十萬萬；以面積作標準，則更多了——其數不單足以付我們一切的捐稅，清遠我們的國，供給

陸軍與海軍，且能予當地各家庭以一個附加的豐富的收入。明顯地其中定有不妥之處。

在每個文明的國度內，從一個地方徵收的國課便用於該地，現代政府還未有發現一種手續，它能首先將從一地徵得的財富放入國庫內，然後將那些財富重新分給各個會納稅的人或其他的人。『人民的財富是按照他們的居留地的統治面積之大小而異』，這種說法，與『倫敦的人民比柏明罕的人民富有，因為倫敦有一個較富裕的國庫，或者如果倫敦郡參事會能合併赫特福德郡，倫敦人將更富有』，那種說法一樣合理。整套都是一種由於陳舊的名稱學的催眠術而生的錯覺。正如貧乏在大城市比小城市的更為嚴重一樣，大城市的徵稅比小城市重，因此大國的人民往往比小國的人民貧窮。

但這個混亂的理論有它的另一面，其特徵是一種奇異的矛盾。依黷武主義者的見解，我們必須與他國戰鬥以尋求貿易——以一種正確的軍事意義與他們戰爭，因為保護我們的貿易是我們建立廣大海軍的藉口。他們的貿易必須受制止，他們的貨物必須離開我們的口岸。同時，當我們征服他們的領土時，我們的財富加增了。但是如果我們征服他們的領土，我們并不停止他們的貿易；為反對他們的貨物而設的障壁也都清除了。貨物自由地進口，毫無阻礙。戰爭勝利沒有消滅競爭，却把所有加諸競爭的限制清除了。

不久以前我們時常聽到美國人談及加拿大人與他們在貿易上的競爭，以及需要設立障壁以停止在翁泰利俄與魁塔克的工廠出產品入口。容許那些工廠出產的貨物自由入口，美洲將蒙損失。如此這般。然而具有國家主義的氣質與黷武主義的氣質的美國人常常談論完全的克服加大拿，「以及它所有的財產將加進我國的傳製財產。一但是這等於說同樣人所佔有的同樣工廠內同樣的手造出來同樣的貨物，現在將自由地與戰勝者的貨物競爭。沒有一個美國人會夢想到再訴苦了，有如賓夕沃尼阿人之不會控訴馬薩諸塞人的競爭（或者蘭卡郡人之不會控訴約克郡人的競爭）一樣。這似乎是商人或製造者的政治身份，而不是經濟的事實，決定他不是是一個競爭者。但是這樣我們都誤會了；經濟的鬥爭，「不可免的生物學上的鬪爭」，變為一個國旗的爭執了。敵人一旦歸到我們的國旗之下，「敵人不死決不能罷手的麵包競爭」即可停止。決定我們是準備為經濟的需要抑為國徽而戰，這不已經是時候嗎？

也許我們從未問過我們自己所真正鬪爭的是什麼；因為我們大都沒有分析我們宣稱為征服的目的之財富的本質。讓我們來析一下吧。

## 第四章

### 新世界與舊政治

現世界的財富不是一種有限度的貨物，這個人取了一部份便等於別人損失了一部份，它是一種積漸或流動的產品。現世界最大的危險不是物資的不足，是交易手續的沒有規律。而在我們的經濟學內，交易手續是唯一的辦法使宇宙上的果實能以供給人類的消耗。指國與國間的鬥爭是由於目前財源的缺乏，這簡直是忽略了現代經濟的簡明事實；每一個國家都在設法防止他國的物品進口，并推銷自己的貨物，因為在這一個人分工的宇宙內，只有你能夠推銷它，製造品才算財富。

在十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內，安那夫海賊三次侵入挨塞克斯，并且每一次他都獲得不少好處；他的九十條船駛出海股時，重重的裝載着小麥與皮革，裝載着從寺院拿取的

美麗的沙布，裝載着盤碟與華飾，有時裝載着女人與奴隸。

服從歷史的基本力量與人類的動機不變這個教訓，我曾幻想英國人，現在我們佔優勢，在十七世紀後作一個答禮；我們的海軍用我們不少的商船來裝載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農工產品，並將一船一船的牛油、醃豬肉、以及乳製的食品；一船一船的瑞典木質纖維原料，紙、鐵、傢俱、鐵器、織物等，傾銷到英國。然後……

不錯，以後怎麼樣呢？……：廉價推銷於英國市場。

我們的麻煩來了。

我們該記得當我們的製造家發現外國政府用公款獎勵人民輸運某種產品，例如糖，到我們的國家時，什麼事情發生了。我們召集國際會議，爲的防止價格低於產出費的外國貨物進口。但是如果有一個現代的英國安那夫，他除了掠奪外不需費一文錢便獲得了大幫的外國貨物，並且在市場上廉價出售，其結果將怎樣？

英國的農夫與實業家將立刻大聲疾呼地堅求一種稅則或條約，以防止這個「爲麵包而競爭」的太坦白的表示。英國的農業與實業將歸于盡，鄉土的昌盛將成過去，等等聒叫聲震耳欲聾。……我們有一種複雜的情形是安那夫所不需應付的。製造品的市場，農產品價格的漲落不定，製造家公會的政治上的優勢，並不特別使他爲難。

但是如果一羣英國的流氓作一種阿楚拉式的侵入波羅的海並將當地的財物充公，則

其複雜的情形更不止此。英國與斯干的那維亞及波羅的海間的煤炭貿易是一種極端重要的貿易；我們一部份的航業也有賴於這個貿易；運煤與載貨兩者使我們獲得全球不少的運輸生意；如果我們現代的海賊開始劫掠斯托克荷爾姆，或科彭崑根或克利斯奧那，則他們實際上幾等于劫掠紐卡斯爾的或巴羅的或卡提夫的勞動階級的家庭一樣有害，使英國的鑛工，英國的工廠工人，英國的船匠，英國的水手失業並受饑餓。

當安那夫掠劫馬爾頓或科爾徹斯忒時，我懷疑是斯干的那維亞的運輸業會受到重大的影響，抑或是失業的程度增加。然而這只是一個現代的安那夫所需應付的複雜情形的開始而已。英國的保險公司已經保險了我們的英國海賊要焚毀的建築物；這樣被毀了的商業股份都屬於英國的投資家；英國銀行會借款給現在已傾敗的商人，或者以扣減期票百分之幾的辦法，早付了款給他們；或者借款給其他商人，他們會以扣減辦法早付了款給這些已傾敗的商人；如果這種掠劫行為橫過北海，英國的銀行將大受窘迫，並且爲了安全起見，他們將把放給英國商人的借款收回，提高英國銀行的利率，增加英國商業與英國企業的財政管理方面的費用與困難，結果英國的投資家喪失了他們的財產，英國工人喪失他們的職位。

我沒有很留心的研究海賊的歷史，但是我非常懷疑當安那夫毀破挨塞克斯的時候，斯干的那維亞的第十世紀的證券交易所是否大受影響。

但是，非常有學問的人，歷史及政略理論的著作家，仍然告訴我，一千多年前「驅使條頓戰士們橫過萊茵區」的「同樣的鬥爭」，將以同樣的方式繼續進行。好，我認爲這樣將引起糾紛。

一位熱烈的愛國者寄了以下的信給一家倫敦的報紙：

「當德國軍隊掠劫英國銀行的地窖，並且把我們全國財產的基金拿走的時候，現在大聲疾呼說多造四艘無畏艦是浪費的這種愚言者，也許會明白爲什麼神志清明的人認爲這種說法是叛逆的胡言。」

讓我們清醒地細想一下，德國軍隊在倫敦這種行爲將生什麼結果？第一個影響，因爲英國銀行是所有其他銀行的股東，所有的銀行將因此停止支付硬幣；我們的錢銀將變成鈔票，無人知道一星期後它的價值幾何。這是很可能的事，倫敦所有的銀行都發生擠兌，因而都停止支付。但是倫敦是全世界的期票交易所，從它那裏發出的，但是爲外國人所有的期票，將不能支付；在國外的金融中心，可借的現時的價格飛漲，而信用證券却大大跌價；各種股票的價格低落，股東們都有頻于破產之虞。德國的金融將呈一種與英國一樣的混亂狀態。無論德國證券因擁有英國的黃金而獲得如何大的利益，德國這種輕率的態度所產生的一般災難，正可抵消這個利益而有餘。一個可以掠奪銀行的預備金

的國家，將是國外投資家所逃避的一個好國家。證券之所以能發生效力是因為它的信用，那是不履行支付的人必爲他們這種行爲付一個很大的代價，在倫敦的德國總司令也許並不比安那夫本入文明，但是他不久會發現他與安那夫之間的不同之點。安那夫不必顧慮到銀行利率及類似的複雜問題；但是這個德國將軍，在設法掠奪英國銀行當中，會發現甚至他的最有利的投資，它的價值也減少了：爲了掠奪，爲了使他的軍隊每人可獲數金磅，他將要犧牲他個人的財產的一大部份。如果德國軍隊犯了這樣的經濟暴行，沒有一個德國裏面的重要機構能夠避免嚴重的損失——證券與安全所蒙的嚴重損失將大于掠奪得來的價值——這是必然之事。

有若干事實證明工業革命以後，財富的性質已經改變。我將于以下幾章詳論此事，但在此也得略爲提及。生活在一個以分工——機器生產主要是分工——爲原則的經濟社會內，生產品如木料、或煤、或生鐵、或銅、或咖啡、甚至小麥、也只有在一個條件下可以變成財帛；生產者把它賣掉。這是現代財帛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每個生產者都設法賣掉他的出產品。鑛工不能吃煤，不能衣煤，也不能用煤來佈置他的房子。如果他想把它變成食物與衣物與傢具，他須拿它去交易，這即是說拿它去交換金錢；出賣它。但是想賣它便一定要那個買者有錢，而那個買者找錢之道也只有一個；出賣他的出產品或服役以獲取金錢，而他的買主也是只有由出產品獲取金錢……如此類推，循環宇宙。

現在，如果你環顧週圍，你會發現這是現代生財的特徵。這不是一種材料本身有缺乏之真的材料本身之爭取。材料缺乏的恐慌並不是問題。在我們的工業經濟裏面，市場是主要的問題。市場有賴于有錢人來購買你的貨品，而那些有錢人也只有從出賣他的貨物獲得金錢。這即是說，市場與金錢都有賴于一種流通，一種精密的交易工具之流暢的運用，一種手續的維持。現世界的重大危險，不是資料之絕對缺乏，是交易手續的脫節，而這交易的手續又是使地上果實可以供人類消耗，生產品可以變成財帛的唯一方法。現在的問題在使貨物不斷地在全世界的通商大道移動，防止貨物擠擁，貨物堆塞。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才可以利用公路來運輸我們的貨物去市場。各人武裝他的手車或摩托車並設法命令其他使用這條公路的人，或者使用一部比任何他會衝撞的汽車都大的車，這兩個辦法都不足以防止擠擁或堆塞。總之，這簡直不是個辦法。禁止他人使用公路也是無用的，因為如果其他的人不用那條公路，便不會有市場來銷你的貨物；市場之所以存在，完全因為你的願主能夠把他們的貨物拿到市場去。

如果主要目的在使貨物自由移動，如果貨運一旦停止財帛的流通即告停滯的話，使它暢運的最壞的方法，便是各人武裝他的車輛以「保護自己免為其他使用公路的人所干涉」。只有一個使貨物能以真正暢運的方法，即訂立運輸的規則，一種公認的規則。現代財富的特質愈發達——即是說，我們現代經濟的工具愈精密，錯雜、脆弱——這種概

論愈真確，而訂立規則的需要愈大。以往，訂立規則的需要並不大。如果安那夫的牛車，在他的十七世紀的道路上走，遇到一個薩克森人的牛車，一個向左邊駛，一個向右邊駛，結果兩車相陷，經過雙方互相辱罵以後，那對牛車便被分開，並各走各路。但是在現代的摩托車公路上，你不知道另一部車，以每點鐘五十里速率行駛的車，是照英國的辦法向左邊走，或照大陸的辦法向右走，在因誤會發生了相撞的事情以後，則你們所爭論的大都是理論上的問題。規則的缺乏會很快的把車輛逐出我們的公路。各人建造無畏車，這個辦法實在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都是事實，參照這些事實，我們試觀那些仍把大規模的盜掠行爲看成一種經濟機會的人，將如何去實行這種辦法。因爲從掠劫得來的有形財產，如果像古代的一樣包含有戰利品，黃金及銀杯、等等，是非常細瑣的，同時又因爲德國人不能把倫敦地墜的一部份帶走，我們也不能把柏林及夏姆柏爾的一部份帶走，所以我們只能吞併證券！鐵路及各種企業的股票及債券。但是這些證券的價值有賴于，第一，人民能夠如常地與活動地生活；第二，證券所訂契約之履行的可靠性。

讓我們試看介乎我們的時代與安那夫時代之間這個時期所發生的事情——雖然大多數的事情都發生于我們與他相距的一千年中的最後五十年內。

當分工制度仍是很不發達，每家都各產所需的時候，即使家庭與世界隔絕數星期或數月，也沒有多大關係。隣村的人或隣人許會被殺或劫掠，但是這並不發生什麼不方便的结果。可是如果現在一個英國的小郡因鐵路工人罷工而與世隔絕只四十八小時，則那個地方的居民便有饑荒之虞。如果，在安那夫時代，英國能夠用一種魔術把所有的鄰人殺了，她的境况許比現代好。現在她也可以這樣做，但是一半她的人民將成餓殍。如果在國境的一邊是個產小麥的社會，而在另一邊是個產煤的地方，則雙方的生存事實上都有賴于彼此之能繼續工作。不能以煤為食糧的礦工無法在一星期間從事種麥並使它生長。交易的辦法必須繼續，每一方面都期望到時他能刈取他勞動的結果，否則雙方都必定受餓。這種交易，這種期望，只不過是商業與信用的一種最簡單的形式而已；這裏所描述的互相依賴的情形，由于無數的迅速交通的發展，已達到一種複雜的狀態，使任何一種工作的受阻，不單會影響有直接關係方面，並且影響無數驟看若無關係的事物。

這裏指述的生活的互相依賴，橫過一切國境的互相依賴，大都是最近四五十年的工作；在這個期間，它發展到使全世界的首都在經濟方面成一種互相依賴的情況，其複雜的程度可以使紐約的騷動引起倫敦的經濟的與商業的騷動。並且，如果情形十分嚴重的時候，將會迫使倫敦的金融家與紐約的合作以消滅這個危機，並不是爲了利他主義，却

是爲了商業的自衛。現代金礦的複雜，使紐約倫敦，倫敦倚賴柏林，柏林倚賴巴黎，其程度之深且大，是有史以來所未有的。這種互相依賴，是日日使用昨天的文明的發明物之結果——迅速的郵遞，使金融與商業的消息立刻傳播的電報，以及交通速度的驚人的增加，它使半打主要的基督敎國的首都在金融方面獲得更密切的接觸，並使它們互相依賴的程度比數十年前大不列顛的主要城市間的還要深且大。

世界的機構有一個知覺神經——當這個神經的一部份受傷時，它會使整個神經也感到受傷。這就是使整個國家的財產充公成爲不可能的主要原因。這種損失會反應于充公者身上，一方面是由于現代金融所具的力量，同時又由于一種事實，即是由于金融的發展，大多數的財產現在已不在可以帶走的——可以用武力由一方轉移到他方的——動產裏面，却是在社會的種種活動裏面，而這種活動不單須有生產的自由，並且須有享受與消費的自由。——這個黃金島的燦爛的財富——政治的小詩人告訴我們，它對於侵略者是非常誘惑的，然而這個黃金島的大部份財富之得來，是由于該地居民的常常乘火車旅行，乘配用橡皮車胎的，使用從俄國汽油井吸取的汽油的汽車，吃從阿根廷河運來的肉食與從加拿大的鐵路運來的麥。如果侵略者使這幾個島的居民陷于饑餓，則這個使侵略者誘惑的掠奪品將化爲雲煙，最可注意的是，侵略者不少的財富，也同樣化爲雲煙。

我有一次問一位被人攻擊爲畏德病者的特許會計師 他爲何以爲侵略英國對於德人

是有利益的。他有一個十分簡單的程序。承認洗劫英國銀行爲不可能之事，他指出德國人會使英國人民淪爲實際的奴隸，並使他們在「來福槍與鞭梢下」爲他們的外國監督工作。他通通用數目字來表明征服者所獲的利益。

很好，讓我們來追求這個經過吧。這個國家的人民不許花費他們的收入，或者最低限度只許花費他們一部份的收入，于他們自己身上。他們的規定的飲食幾減低到同一個奴隸的飲食一樣，而他們所賺的大部份報酬都爲他們的「所有者」取去。但是這種使德人誘惑的入息——鐵路股份的紅利，機械廠、鑛場、百貨公司以及娛樂場的贏利——是怎樣產生的呢？這些紅利有賴于人民之能豐衣，足食、乘火車旅行、及遊戲院與音樂堂。如果不許他們有這種享受，換言之：他們不能用他們的金錢于這種享受，則所謂紅利便沒有了。如果德國監督想要這種紅利，他們必須使之獲利。如果他們允許它們獲利，則他們必須讓人民生活一如往昔：使用他們大部份的入息于他們自己身上；但是如果他們使用他們的入息于自己身上，則那些監督還有什麼呢？換言之，使造成市場的人消費，這是整個事體的要素。斷絕消費，你便等于斷絕贏利。這種使侵略者誘惑的燦爛的財富消失了。如果這些是易於領會的，則這句話便無意義了。概括言之，我們這個時代的征服者只有兩條路可走；不管被征服地的事物，如此他又何必離開他的國土；或者用吞併的方式來干管，如果這樣做，他便會使誘或他的贏利的來源枯竭。

經濟家許會反對說被奪取的英國人的低減了的消費，得由「佔有的」德國人的增加了的消費補償。

如果用政治統治經濟的實施這件事，有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末簡單，則這個反駁是對的，但事實上它并不能駁倒我的設題。現世界的分工非常複雜——國外貿易的最單簡的設施不單影響兩個國家，影響了許多國家——單方面的武力統治一種與好幾方面有關的設施，既不能轉移消費的方式，也不能使贏利成爲征服者的範圍內之獨占品。

這裏有一個德國的製造家，他賣活動電影照相機器給一個格拉斯哥近郊居民（他以賣織具與阿根廷的農夫爲生，而阿根廷的農夫則以售麥與新卡斯提爾 汽鍋匠爲生）。即使德國能把用于看活動電影的閒錢轉移到德國，這個德國的製造家有什麼保證使那些致富了的德人一定需要活動電影片？他們許堅持要香檳與雪加，咖啡與上等白蘭地；而最後獲得這種「戰利品」的法人，古巴人，及巴西人，他們不一定在德國，更少可能向上述的德製造家，購買他們的機器，他們會向美國或瑞士購買。實業職務的重新分配許陷德國實業于危難之中，因爲武力無其量只能統治一個複雜的設施之一部份，許多方面中的一方面。當財富是小麥與牲口的時候，用政治力量或武力將這個社會的佔有權轉移，到另一個社會去，許曾經是可能之事，雖然甚至在那個時候，或在一個較進步的時候，我們已看見羅馬的農民被奴隸開發國外土地這種舉動所摧毀。這種國際間分工的複雜情

形，怎樣使其他征服計劃，如獨占市場，賞稅，賠款，等等，變為無價值，其程度可于下幾章見之。

目前我們所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具特質的現代發展，對於以戰爭為「一種麵包的競爭」這個普遍的觀念之意義，它們對於競爭為戰爭的基本原因之假定有何說明。這是很明顯的，把現代的經濟問題看作一個因可用材料的缺乏而生的問題，以為材料的來源很有限，如果一方獲得了，他方便得不到了，以為人類真正的鬥爭是爭取這種日見減少的財物，這簡直是否認了我們親眼看見的事實，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到國際的場合。根據簡單的經濟事實，使國與國間的經濟關係生出許多憎恨的是什麼東西？是否因為某一地方的出產品不供給其他國家使用，所有的國家都把它們出產的貨物留為自用？世界上是否有一個國家拒絕把它的出產品供他國？沒有一個國家不盼望把它的貨物輸出；除本國外（這個例外不久亦將消失），世上每個國家都拚命用關稅，排斥，額外價金等方法來防止購買他國的產品，使這些產品離開它們的人民；自今國與國間的憎恨之最大的來源，是他國太容易以材料給我們了，賣給我們的價格太便宜了。我們這個時代，戰爭之所以真正爆發，是因為一國設法不採用他國的貨物，設法防止他國太自由地供給它的出產品，設法阻止那些出產品輸入。我們並不需與任何國家戰爭始能自由地接近它的天然資源；獲得它的小麥，或木材，或棉花。我們的經濟上的爭執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每個國

家都憤怒地指責他國設法驅售不需要的貨物給它們。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內，要我們不買外國貨的大都是那些好戰之士。他們常常確告我們，生產之道就是；不買外國貨。我們所爭取的「門戶開放」，不是爲了想入他人的房子去取室內的貨物，却是爲了使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貨物送進房子去。

面對着這一切的事實，而我們的知名之士仍然宣稱我們的危險起於饑餓國家之需要奪取食物，我們的海陸軍是用來鎖閉門戶，以反抗鄰人進來并把房子裏的東西全部搬走這種企圖！自然，「我們所想要的是他們的錢，不是他們的貨物；是市場。但！購買我們貨物的人，除非他們能把他們的貨物賣出，他們那裏有錢來付給我們呢？你不能去外國把他們的錢「掠奪」回來，有如以前丹麥人來掠奪我們的貨物一樣。「掠奪」這個舉動會使「錢」本身不翼而飛，化爲雲烟的。如果你掠奪黃金（世界上的錢財只有一微小部份是黃金），掠奪本身便會使一種造成現代財富的交易陷於停頓；運輸會無望地擁塞於通商大道上，而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都會同樣地在豐裕的環境中受餓。

如果我們想以最好的辦法處置我們的世界財源——如果我們想以最好的辦法處置我們的國家財源——我們必須，重提到我們前時所舉的例證，把世界通商大道上的運輸交通組織起來，使不致發生交通閉塞、車輛堆塞，秩序紊亂，擠擁，毆打，口角，駛着馬力充足的汽車的人不知他車如何駛法，等等情形，否則每個人的特產都變成無價值的。

很明白的，這裏所需要的是一種交通規則的商訂；制度，組織。但是所有的權威者，有學問的大學教授，有名的報紙編輯，政治家，將軍，海軍司令，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告訴我們，合約，交通規則，都完全是無希望的，唯一真正可以辦到的政策，是每人有一部比可能在路上相撞的任何汽車都大而有力的摩托車。當你指出每個人不能都比他人強時，他們會再次以非常廣博的學問告訴你，生命是一種競爭，人是天然好鬥爭的，同時有名的編輯會詢問你是否想無能地聽由異國人指揮你的行爲。

現代世界真正的困難不是不足，不是我們的生產機器不足以供給我們所需要，如果我們盡量利用它。我們許有一天會遇到馬賽氏人口論所說的妖怪（雖然筆者十分懷疑這種理論）但是那個日子還沒有到。真正的困難是使財富流通的合作手續脫了節；現在問題在改善合作，矯正國際間合作手續之脫節現狀。現在的危險是我們不求合作的改善，却依照我們的不正確的戰爭哲學來使合作完全脫離聯絡，成爲不可能之事。

當問題在使一副精細的機器轉動時，光用「力量」或「權」許是完全無効的，你許有「權力」處置你的摩托車，如果你有一根重量足以使它變成粉碎的鐵桿。它對你更有益處，如果你用你的鐵桿時，不顧它的機構的本質。但是，推到類似的事情，如果你以每小時六十哩的速率旅行，則那根鐵桿所予你的對於司機的權力却是十分有限。你不能只鐵桿施於他的身上，因爲擊破頭腦會使你兩人都落於溝渠中。你不能以強力逼他駛車

，如果他不懂得車的機構；但是，如果他對於車的機構的知識比你更豐富，他便會找出反抗你的威脅方法。

只要我們真正有靠於人，我們對他的物質上的權力是有限的；只要我們所要求他的工作是困難的，需要技能，工具，自由活動的，他便可以利用那些東西來反抗我們欲加諸他的權力。只要他能夠滿足你的需要，他便能反抗你。非常簡單的工作如划船槳，斬甘蔗等，管工的皮鞭的純一的威脅可以迫使服從。但是你不能以這種方法去求醫割盲腸。如果說外科醫生笨拙便施以刑罰，這種恐嚇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你許會得不到關於這件事的最後一句話。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便會進行自動的協商，議價，訂約，給費。

爲了獲得經濟利益而對國與國間的關係施以威脅，也會發生同樣情形。如果我們想要一個屬省或殖民地作市場，我們必須使它在經濟與實業方面都向現代的路線發展。但是這即等於讓它變成一個活躍的自覺的社會，有工業化的居民，報紙，議會，并且不久便要求自治，有權管理賦稅課收關稅以抗母國；這是大不列顛領土的故事。甚至軍人的意見也一致認爲你不能「屈服」或永久佔據一個現代工業化的文明國。你限制它的發展，你便限制了它做市場。

然而，這是人類本性的一個事實（對於這點，以後將略論之）只有在我們看到威逼無效的時候，我們才會放棄威逼手段，而代之以訂約與合作。我們誰都寧願做主人來立

下法律，而不願意與一個夥伴錙銖計較地磋商平等的條件。只有在我們看到那個流行的（裝面子的），予惡社交的本性以實念主義的外表之哲學的謬誤見解時，我們才會考慮合作的種種困難，才會從毀滅之路轉向生存之路。

在上章，我曾從各種政治的，文學的與科學的活動範圍內引證無數關於這個信仰的表示，即戰爭是「爲生存或麵包的最終的競爭」，人口在有限的宇宙內作無限的增加中的一種爭鬥。我以爲所有那些表示都忽略了若干明顯的真理，尤其忽略了與合作事實有關的真理，這種合作使人與草木禽獸有別，因爲於生命有用的資源對於他并不是有一定數量的，由于他的活動它們可以增加至無數之多——實際是無限量的多；然而，如果他只知與他的夥伴爭鬥，不能與他合作，則這種活動是不可能的。

在那個原來幾十萬印度人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部落與部落間爲了獵場而戰爭的地方，現在住了一萬萬的現代美國人，他們都過着富裕的日子。印度人之不能增長與繁茂并不是因爲他們缺乏勇武的體力，拒絕作戰。他們常在戰爭中，是壯大的戰士。替代他的歐洲人也會如他一樣地不能使那個地方供給一萬萬居民，如果現在的英合衆國當時分裂爲幾百個部落——甚或幾十個國家。歐洲人之所以成功，印度人之所以失敗，并非因爲前者比後者好鬥，勇武，是因爲前者較知合作之道。

這即是說人類的最終的競爭并不是人與人的，而是人與自然的——包括人性——競

爭。概言之，在人與人鬥的情形下，他變為自然與身外環境的犧牲品；在人能夠聯合他的力量以抵抗共同敵人的情狀下，他加強了他生存的機會。在增加合作的效力中，我們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不單因為合作造成財富生產的機構，並且因為它建立社會的習慣，推動社會的行爲，教導我們修練非社交的衝動，這些衝動 如果聽其放任，必困使我們成爲自然——寒冷與天旱，疾病與凶荒——的奴隸。

競爭許是人類圖生存的定規；但是這是人與宇宙的競爭，而不是人與人的競爭。

如果人類的隊伍因互相殘殺的競爭而分裂，則他鬥爭的效力必因此大減。「狗不食同類」。能以最大的團結來對付敵人或餌物的人羣可以生存。人類的餌物是宇宙；他的敵人是認見及任性。

不錯，這種說法不能一概而論，因為也許有人反駁說，強力，脅迫，戰爭，往往成爲一種確定及擴大合作辦法的手段；羅馬帝國在古代的統治權與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權都曾完成了相當程度的合作，沒有它永久不能成功的合作。因爲埃格柏特在這個國家建立了一種七個王國的統治權，所以他們之間能建立一種和平。

關於問題的這一方面，我目前將有一句話要說，尤其因爲它把警察的職能與陸海軍的職能生硬地混亂了。讓我們首先考慮剛才略述的一般原理，如何見諸實用。

## 第五章

### 國外貿易與武力

戰艦怎樣奪取貿易？海軍用什麼技術可以逼使人民購買我們的貨物，如果他們沒有錢？這些問題從未獲得答覆。從那一點我們可以正確地說世界沒有所謂「德國」貿易或「英國」貿易，甚或國際貿易；只有個人與個人間的越國界的貿易。如果我們是因外國人的「滅亡」而獲益，那末所有外國人都被「滅亡」時，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再引證幾個我們有名的政治哲學家的話：

「讓我們設想英國艦隊慘遭失敗，大不列顛的海上霸主的光榮地位被屈辱了……：還有多久德國便派軍隊在撥普坦及伊利沙伯港口登陸？還有多久我們的美國從兄弟便發現加拿大及西印度羣島明顯注定了是美合衆國的一部份？羣鼠都從地球的每個角落集合起來吞嚥這個將死的體軀，這對於英國的實業將有怎樣的影響呢？日本奪取

我們在澳洲的貿易，俄國奪取我們在印度的貿易，美國奪取我們在加拿大的貿易，還需清付一筆巨大的戰爭賠款，同時市場在混亂的狀態中。破產的資本家，寂然無聲的工廠，以及失業——這就是答案。

「所有歷史上的教訓都是商業在武力的庇蔭下生長。我們不是與荷蘭及法國戰爭而奪獲印度的貿易嗎？我們戰勝荷蘭與法國，不是因為我們是最強者嗎？如果不是我們在海上有霸權我們可以戰勝荷蘭或法國嗎？」（爲麵包而競爭——來福曼着。）

「如果德國明天被消滅了，則後天世界上便沒有一個英國人不比現在富有。國與國間曾爲了爭取一個城市或王位繼承權而作戰經年他們不該爲爭取每年二萬萬五千萬磅的商業而戰嗎？」（星期六評論）

讓我們看吧。

所有這些作家，如我在第二章引證的許多作家一樣，都說德國準備攻打我們以奪取我們的貿易。

然而迄今已十年矣，我們的報章載德國在世界各處奪取我們的貿易的消息；在遠東，在近東；在巴西，在阿根廷；在埃及，在我們自己的帝國印度。在各處，德國的貿易都在生長中，而我們的貿易則在衰落中。

但是請注意，這并不是德國海軍所造成的結果；我們的海軍也無法防止這事情。

德國并不需要征服我們以獲得這種結果；它可以向阿根廷的農夫，向巴西的咖啡老板，出售它的比我們的更便宜更可人的利器及機械，結果獲得定貨。它何需乎擊沉我們的海軍以繼續這種經營？對於這種現象，我們的海軍有什麼辦法嗎？我們的海軍怎樣阻止它繼續這種經營呢？有什麼辦法阻止它呢？

讓我們從另一觀點來考慮它吧。我們不高興德國用這種辦法來盜取我們的貿易，因此我們攻打它并消滅它，結果「世界上每個英國人」都因這種「消滅」比以前富有了。這是光榮的事情。但是我知道這有什麼意義。

例如，「消滅它」。假定我們與德國開戰，或它與我們開戰；它的軍艦被擊沉了，它需自承完全失敗——「消滅」。

但是六千五百萬人民仍然存在。完全沒有消滅。我不相信海軍中人會提議我們在勝利的第二天把所有六千五萬男女兒童通通屠殺了。我們感到種種困難。我不信海軍的軍官——或者我們的兵——會真正喜歡這個差事，無論若干有名的報紙如何的鼓勵他們。於是那些人民仍然居留在那個地方，科學家、工程師、化學師、工作者，仍如往昔一樣勤奮——發明新機械，發現新辦法，學習工作的新方法，以較便宜的方法來出產我們出產的東西，并且如昔日一樣的出售較便宜的東西給巴西人、土耳其人、俄國人、斯干的

那維亞人。我們該怎麼辦呢——用我們的海軍嗎？

「以一個恆久的封鎖來對付」。

好吧，讓我們來考驗這個辦法。即使我們的海軍能够——我們都知道其不可能——禁止世界的船進入德國口岸，也不能阻止他們在俄國、西伯利亞、更由彼處進亞洲經商；不能阻止其在斯干的那維亞經商；不能阻止其在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經商；亦不能阻止其在遠東南歐經商。這不單是一件封鎖德國的事情，如果德國被禁止直接輸出貨物，我們知道一星期之內便會有荷蘭、瑞典、丹墨、希臘、土耳其商人經營德國貨物，需要的話，他們會把它們當作荷蘭、瑞典、丹墨、比利時、法國、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或土耳其貨物，輸運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們是將否建立一個平時檢查船隻的新權力——一種權力去停止公海上任何一國的船隻，檢查它的載貨，并決定那些所謂荷蘭或西班牙或意大利貨物是否屬實？回想一下以往甚至戰時的一種暫時的封鎖，它所予我們的紛亂；大概即使其海軍中人不致力爭這種海上的新法律之建立。如果這樣一種法律建立了，其最先的結果是世界上最部份的運輸業將轉移到非英國的船上，把貨物載在英國船上即等於使它冒着「仇貨」的罪名被奪取之危險。於是我們的航業對於封鎖德國方面許有多少成績可言。但是還有其他呢。煤業與航業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我們的運輸業大半有賴於一件事，就是煤的輸出使我們能兩路載貨。毀壞航業，則我們大多數

的煤業亦被毀壞。其中還有我們輸往德國的貿易——其數目之大幾與輸往加拿大的相等。這裏使我們想起加拿大售一大部份它的麥，澳洲售它的羊毛，印度售它的黑蘆與德國。我們的「消滅」德國是否連這種貿易也消滅了？假使我們提議容許加拿大售它的麥，澳洲售它的羊毛，印度售它的黃蘆與德國，德國怎樣找到錢來付這些英國領地的出產品呢，如果我們禁止德國輸出？黃金？德國所有的黃金都不足以清付一年的國外購買，然後怎樣？這些貿易——英國的貿易，加拿大的貿易，澳洲的貿易，印度的貿易——都必至停頓，除非我們許可德國以經濟學所指示的唯一方法，它自己出售貨物的方法，找到款來付麥及羊毛及黃蘆的價錢。

讀者不耐煩地斥說：無人提議永久的平時封鎖這種乖謬的辦法。我與讀者同感苦惱，但是我正在忍耐地設法在這些海軍界，外交問題著論者，新聞界，以及我曾引證的權威者所自由地爭論的語句中，找尋一點解說。每一個討論這個問題的人都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我們的海軍，我們的貿易便消失了；德國企圖以消滅我們的海軍的方法來奪取我們的貿易；我們必須防止它；當為商業的生存而競爭的一部份，我們必須用戰爭來「消滅它」。我想知道我們該怎樣做；它的程序怎樣；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用這些語句的人心中作何想法。他們通常都是非常自信的；以為他們是討論世界的真事實；是空前絕後的實證論者，既實際，又肯定。但是人們立刻詢問工作的詳細辦法，想知道海軍怎樣增

進貿易。在那一種方式之下我們把勝利轉為商業的帳目，答案永不會出來。我們可以推論，在一種不甚明確的辦法中，一個強國可以它的巨大海陸軍所帶有的威勢來幫助它的人民貿易，並且可以運用交涉的權力來與他國磋商關稅。但是歐洲小國的情形又推翻了這個假定。

這是明顯的事，外國人士不會因為我們有較大的海軍而購買我們的出產品，不買德國的出產品。我們可以想像，假如一個英國公司的代表與一個德國公司的代表相遇於一個阿根廷，或巴西，或保加利亞，或芬蘭商人的辦公室內，兩人都是賣利器的，那個德國代表之所以獲得定貨，並非因為他能夠向阿根廷商人，或巴西商人，或保加利亞商人，或芬蘭商人指出德國有十二艘無畏艦，而英國只有八艘。德國代表會獲得定貨，如果他能夠對買主提出一個較適宜的價格，這是他做成生意的唯一原因；買主會去找任何一個的人，無論他是德國人，或瑞士人，或比利時人，或英國人，並不理會到售者本國有多少陸軍與海軍。當討論到關稅問題時，海軍與陸軍也不見得有什麼力量。瑞士與德國作一種關稅的戰爭，結果瑞士勝利了。各小國的全本貿易史，表明大國的政治上的威勢所予他們商業上的利益，到底是十分小的。

我們繼續的說，在若干特殊觀點上，我們的運輸業是我們的大海軍的結果，但是那威也有運輸業，以人口作比較，它的運輸業比我們的幾大三倍。一個異國既不能把英國

銀行的預備金充公，由於同樣的理由，一個異國亦不能於英國海軍失敗之日把英國的航業併吞。從那一方面可以說我們的運輸業或其他貿易是要依賴武力呢？

如果歐洲的政治家告訴我們一個大國如何運用它的武力以增進它的人民的商業利益、對我們解釋這個方法，而不以「運用應有的力量於國際會議」這種大而含混的辭句對我們說話，我也許會接受他們的哲學。但是在他們這樣做以前，我們可以假定他們的政治用語簡直是一種遺物——一種已成過去的遺傳。

一個作家說，德國失敗時，「它便會為鄰國所吸收而滅跡了；一部份歸入法國，另一份歸入丹墨。等等。於是「德國」的競軍便解決了！同樣的工廠仍在大肆活動，同樣的手製出同樣貨物，同樣傾銷到世界的市場去，但是它們不是「德國的」——它們將是丹墨的，或法國的，或瑞士的。這是他們所真正爭取的嗎？

在本章開頭的引證中，有一位先知的說話，他預言英國海軍失敗後的一種結果是美國「奪取」加拿大。現在美國有力團體都要求美國增加關稅以排斥加拿大的貨物——英美國間的迫切的商業競爭的全部。加拿大的貨物有害於「美國」。但是，假如我們的先知所預言的英國海軍失敗的結果真的實現，加拿大被併吞了，則加拿大的貨物便不會被排斥。它們將自由地與美國貨競爭。如果英國失敗以前的競爭是不利的話，則失敗後怎樣會順利呢？人家告訴我們，權力的用意在反對外國的競爭；但是由於併吞加拿大這件事

美國變了用它的力量來增加上述的競爭。

最後的判斷是屬於一種進步的。貿易是國與國間的一種「殊死」的戰爭。他國獲得，便是我們損失，外國人是我們的競爭者。如此這般。讓我們不止「消滅」德國——他們告訴我們，這種舉動會使所有的英國人民富有——并且消滅所有的外國人。那時我們確該富有了。但是我們真富有了嗎？一半我們的人民將成餓殍。假使我們可以用一種法術將所有的外國人消滅了，我們的國外貿易便會完全消失，到那時約有一半我們的人民會因沒有糧食這個簡單的原因而遭遇到真正的滅亡。

很明白的，我們不能「消滅」所有的外國人或所有的異國。我們需要有些人，他們是有資力的，他們有錢花，并且在賺錢，以出產貨物這個唯一的方法來賺錢。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誰是我們必須「消滅」的「壞」外國人，誰是我們該保留的使我們能有國於貿易的「好」外國人呢？我們怎樣區別願主與競爭者呢？

許多我們的紛亂的理論是起於我們之慣於把每個國家看成一個完全的經濟單位，好像國家都是競爭的商業公司。

就我們一種最大的貿易——棉花——來說吧。一個叫作「不列顛」的貿易公司并不是從一個叫作「亞美利堅」的公司那裏購買棉花。

一個曼徹斯特的製造家爲了與一個德國的染色業者維持合約而與一個路易斯安那的

商人訂約，於是三方面或更多方面參入一種有實無名的，或真正的合同，形成一種互相依賴的經濟團體（連訂約的幾個企業的勞動者在內，人數約有幾百萬）——一種并不能包括一切有組織的社會之經濟團體。這樣一個團體的特殊利益許會爲另一個團體所敵視，但是這種敵視可以說不是一種「全國性的」，而是一種類似的組織的敵視，如航業會社或幾組萬國銀行家或證券投機家。這種團體的邊界與國家行政的面積并不符合。一個國家，譬如說英國，怎可以爲上述團體而有所行動呢？以壓力施於德國或美國嗎？但是那個英國的製造家要求加以壓力的團體并不是「美國」或「德國」——德國人及美國人都是他的夥伴。他要求對航業會社或投機家或銀行家施以壓力，而那班人當中也有一部分是英國藉的。如果英國損害整個德國及美國，它必致損害到它志在保護的經濟團體。

我們以爲「英國的」貿易與「德國的」貿易在競爭。但是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組合。正確的說，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全國性的衝突，從這個意義來說，根本就沒有所謂「英國的」貿易或「德國的」貿易這回事。北明翰的鐵商的貿易許因競爭的關係而被厄森的鐵商奪去，正如他的貿易許會被格拉斯高的，或伯爾發斯特的，或匹茲堡的鐵商奪去一樣，但是在現代世界這個分工的情形之下，如果我們說英國因德國的競爭而蒙損失，其不確性有如我們說淺色頭髮的人因深色頭髮的人的競爭而蒙損失，或說住雙號房子的人的生意必被住單號房子的人奪去。這樣的界限并不是經濟的界限；經濟的功能把這些

界限模糊了；這兩種界限并不符合；雖然我們很合法地願意看見一個英國的舖子在商業上將一個德國的舖子打倒，但是這還勝利并不是對於我們整個有利或與他們整個有害。

當我們在國際的範圍內談及「德國的」貿易，這是什麼意思呢？這裏有一個厄森鐵商，他為一個阿根廷省的輕便鐵路製造火車頭（它的資本是從巴黎募集得來的），這條鐵路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要將羊毛輸往布刺佛德，布刺佛德羊毛業之所以發達是由於可以在美國高價出售，羊毛之所以高價又由於西方農業之發達，把牧羊場毀了。如果不是在巴黎募得資本（由於大半售於倫敦及紐約之橄欖及製酒葡萄的好收穫）及布刺佛德製造家之需要羊毛（他在蒙大拿的採礦家當中找到市場，而那些採礦家是溶銅製造發往中國的電線的，中國之所以需要電線是因為中華民國予教育方面以一種鼓勵，使中國報紙印歐洲的新聞）——如果沒有這些因素以及全世界整串同等互相依賴的因素，厄森的鐵商便不能出賣他的火車頭。因此，你怎樣可以說它是與「英國」或「法國」或「美國」貿易競爭之「德國」貿易的一部份呢？如果沒有英國的，法國的，或美國的貿易，它簡直是不能存在。你許會說如果厄森的鐵商不能出售他的火車頭，則這個生意會歸英國鐵商。但是這個德國勞動者的團體，因阿根廷的貿易而產生的團體，由於它的消耗咖啡，維持了一個在巴西的田園，而這個田園所用的機器是在設斐爾德購買的。因此，破壞厄森的貿易，也許可以予英國的火車頭匠以一宗生意，但是却把一個英國的農業用具製造者

的生意奪去了。經濟的利益產生各種團體，並不理會到國籍。

爲什麼我們從未聽到美國人講及馬薩諸塞的貿易與賓夕法尼亞或新澤西的貿易殊死的競爭呢？如果原有的十三州不能團結，並且變成各自獨立的國家，我們該已聽到人說及賓夕法尼亞的前進損害了新澤西的貿易，或新澤西的前進損害了賓夕法尼亞的貿易，有如現在國與國間彼此爲貿易而競爭的一樣。上面已經說過，美國的製造家早已嚴重地訴苦說加拿大在某種場合與他們競爭，他們運動與要求對加拿大貨物加以高度的關稅，結果他們當然成功了。但是如果加拿大被吞併，而且變爲美國的一部份，則關稅問題便不會有了；我們該不會聽到人說「美國的」貿易蒙損失以及願用外國人使美國工人失業了。但是同樣的競爭仍然存在；同樣的貨物在同樣的工廠內由同樣的勞動者製造出來，贏利歸於同一的廠主，而那些貨物仍被購買。但是那時我們便聽不到人們說一句話，沒有一個美國人爲這種「加拿大的競爭」所騷擾。

結果是這樣；我們不以競爭爲意，如果那種競爭是起於我們自己的國人；但是如果那種競爭是起於外國人，我們便非留神不可。換言之，這是一種政治的偏愛。但是無論如何，戰爭怎樣幫忙呢？

因本書第一版而引起的以下的通訊，對本章所討論的若干點，許能予以說明，民意雜誌一個通訊員批評這裏所討論的題目之一部份是「一組半真實的東西」，并作如下的

詢問；

「什麼是「天然的財富」，我們怎樣可以經營它，如果找不到它的市場？作者是否說武力的征服不能使市場長久地或嚴重地受影響，尤其如果戰勝後，失敗者被逼為戰勝者的利益做成種種商業的環境？……：德國因逼法國在法蘭克林條約內補入最惡國條款而獲得了，並且繼續獲得，巨大的利益。……：這是真的，卑斯麥過低估量了法國的經濟的反彈力，因而感到非常的失望，當法國以驚人的速度把賠款清還，並且因此免除了維持佔領區的德國軍隊這個同樣重壓的負擔。他後悔不要兩倍這樣大的賠款。德國不會再陷於這種錯誤，如果任何一國將來不幸為德國所敗，它的商業的發達將受百十年的阻礙。」

對於這個詢問，我答復：

「請你的通訊員原諒我的說話，即當他談及半真實的道理時，這整段話證明那個特指的半真實的道理，為本書所討論的迷夢之來源的半真實的道理，在估優勢。」

「什麼是市場？你的通訊員簡直以為它是一個出售東西的場所。這只是真實的一半。這是一個購買與出售東西的場所，兩者缺一不可。一個國家可以永遠賣貨永不買貨，這個觀念簡直把永續運動的學理用於經濟學了；國際貿易之不能以永續運動

爲根據與工程學無異。在經濟方面極有組織的國家間，一個顧客必定同時是個競爭者，這是槍劍不移的事實。如果他們當他是個競爭者把他毀滅，概括言之，則他們也毀滅了他顧客的地位。

「已故的薛當先生以爲英國是以「淥水一樣的金磅」購買貨物，而這些金磅則是由日見減少的貯藏庫內流出來的。這位非常藐視「只是理論」的腳踏實地的人，自己成爲一個純粹的理論的受騙者，從他內心想像出來的那幅圖畫，事實上是存在的。大不列顛的黃金不足以付一年的稅，如果它用黃金清付她的進口貨。三個月內它的貯藏庫便空空如也；它真正用來付進口貨的辦法已實行幾六十年了。苟它是個購買者則她也是個出售者，如果它要買德國的貨物，它必須用出售貨物與德國或他國的辦法獲得金錢來付德國的貨物，如果這個出售的手續停頓，則德國不單喪失了英國的市場，而且喪失了那些倚賴英國的購買力獲得金錢的市場——即是說，欲出售貨物沒有購買這個手續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的通訊員心中有這種手續程序的整個的而不是一半的觀念，我以爲他必不致寫出我所引的那一段話。在他贊成卑斯麥的政治經濟觀當中，他明白地認爲一國的獲得便等於他國損失，各國是以掠奪鄰人爲生的。這是暴野人式的，紅印度人式的經濟，與現代商業貿易的真正事實無關。

「事情的一半的觀念支配了你的通貨員的整封信。他說『德國因逼使法國在法蘭克條約內補入最惠國條款而獲得了，並且繼續獲得，巨大的利益』，這是很真確的，但是他遺忘了其餘一半的真相，而這個真相對於我們的討論是非常重要的。』即是，法國也因此受到很大的裨益，因為無結果的關稅戰爭的範圍大大的被限制了。

「另一個說明：爲什麼德國要因法國的迅速恢復而大感失望呢？德國人民並不會因有一個貧鄰國而更富有——相反的，他們將會變爲更貧窮，沒有一個負有聲譽的經濟學者，無論他的賦稅政策的主張如何，會否認這點。

「德國怎樣安排一個與失敗的英國訂立的商業協定，使失敗者貧乏，勝利者富有呢？再來一個法蘭克福條約，使英國港口開放以容納德國貨物嗎？但是英國港口已如此六十年了，德國用不着以這樣浪費的戰爭來使其實現。德國將拒絕我們的貨物入它的市場嗎？但是，它已經這樣做了——不用戰爭，只用一種我們從未夢想過否認的權力。戰爭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最近十年來，我曾不斷地要求歐洲的政論家及政治家對此問題作一個詳細的答覆，至今我仍得不到答覆，有的只是些無人能闡明的更含糊的說話，講及商業的優勝權，倔強的外交政策，國家的威信等等更精妙的名詞，但是從得不到人們可以分析的一種真正的政策，一種辦法，一個決算表。直至獲得這種答覆以前我將繼續相信整個說法是一種迷夢。」

讓我們略述英國的經濟地位與世界各地的關係之最顯著的事實吧。我以為是這樣：島上居住的人數比島上所能供給的——合乎文明標準的供給——多一倍。在現在學校讀書的兒童一生中，我們的土地許要供給五千萬或六千萬的人口。當我們已用盡種種可以辦到的機會，如由國家幫助移居到殖民地去，法國式的園藝方法，強度的文化等等，明顯的事實指出，大多數人民賴以生存之唯一方法，也是現今他們賴以生存之唯一方法：仍是經由國外貿易的點金術，將煤變成麵包。即是說，我們必須以我們的煤，或製造品，或服務，以換多餘的原料，及外國人出產的糧食。

只有海外各地出產多過自己需要的糧食與原料，並且願意以它們來換得我們所做的而不是他們所做的工作時，煤，製造品，工作才可以成爲供給這一部份過多的人口（佔全部的大多數的人口）的資財，決定我們的煤在用以購買外國糧食及原料時的價值之主要因素，是國外盈餘之數量。如果沒有盈餘，如果國外各地的生產量減低至只足自給，則我們出售煤是不會成功的。外國人太窮了，他不能供給我們一個銷路。一半我們的人民便須受餓或移居國外。盈餘的數量愈小，我們用貨物來交換的糧食及原料的價值愈高。

欲保證一個經常的與不斷的海外盈餘，（換言之，一種高度之生產量），唯有使每

個地方從事對它最適合的生產，以交換它的收穫。這是指，每個國家都可以購入他國的原料，運輸橫過政治的邊境通行無阻，俾若干實業能獲得大量的生產，互相不違背商約並免除財產的賦稅，一個穩定的貨幣及信託制度。

這種重要的國際制度之所以崩潰，大部份由於政治的國家主義及它的招致戰爭危機的結果；由於各國之倚賴自己的孤獨力量與經濟自足以爭取各自的獨立；由於使政治的單位同時成爲經濟的單位之努力。不能維持大多數的經濟的分工，不但使那決定我們的煤在用於購買糧食及原料時的價值之盈餘減少，且使我們喪失我們的經濟存在之因素；外國人堅持要做他們自己的製作者。

用我們國家或同盟國的政治的或武力的優勢來使敵手唯命是從這種方法，來穩固現制度，是不可能的。上面列舉的因素是不能以物質的威逼方法獲得的，這種方法失敗之原因很簡單。如果他們要清付或購買，他們必定活躍地生產！——即是，必定在經濟方面強健，並且早晚必抗拒我們的威逼。如果我們使他們貧弱，則他們便不能清付；如果他們是強健的，他們會清付他們認爲公平的價格，或用他們的金錢以尋求抗拒我們的方法。這就是優勝力量可以阻滯貿易與生產，但不能保證它們的原因。

## 第六章

### 各殖民地是怎樣佔有的

人家告訴我們，我們「佔有」全球五分一的面積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那末爲什麼財政總長爲了幾百萬磅的社會事業費而智窮力竭呢？我們完全沒有「佔有」這個帝國。就大部份而言，這個帝國已經告終，它變成只是一個各獨立國的同盟而已。「帝國」的奇論；英國在它自己的殖民地中所處的地位，比在各外國所處的地位更爲惡劣——但是它仍是歷史上最實利的殖民者。德國能希望做英國所不能做的事情嗎？英德兩國都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問題；但是這個帝國並沒有予英國以德國不能利用的解決方法。

各國爲了土地而彼此劇烈地，無止境地戰爭，排除了大多數其他重要的活動而從事戰爭，因爲他們以爲一國土地的增加即是財富與糧食的加增，同時也可使它的人民富有

在五十年紀念的遊行陰禮中，有人聽見一個英國的叫化子說：

「我佔有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印度、緬甸、以及太平洋羣島，但我却因爲得不到一片麵包皮而受餓。我是現代最強國的人民，所有的人都該對我的高貴地位致敬。然而昨日我却爲求施捨而諂媚一個黑人生番，他嫌惡地拒斥我。」

如果我們想用我們帝國的權力來「取」我們的臣民的財富以飼養我們自己的人民，有辦法可以做到嗎？

是的，他們曾說，用移民的辦法；我們的「叫化子」可以移居國外。對於這個辦法的答覆是，沒有一所英國人民有權居住的英國殖民地是適合於北方民族居住的；沒有一個領地的法律不剝奪英國人自由出入該領地的權利。英國的勞動者，即不是資本人家，進入澳洲時所受的限制比入阿根廷或墨西哥時所受的還要多。他的勞動所受的限制與他的勞動產生出來的品物所受的限制同樣使人煩惱。我們所用的「佔有」，「佔領」等字句，沒有比用於現代式的「帝國」時需要更多的考慮了。

有什麼事實嗎？大不列顛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殖民國，它的經驗所使她採取的政策，已爲劉卡司爵士，殖民問題的最大權威之一，概略言之。談及美洲的英國殖民地史時，他這樣說：

「我們已經看到——但是如果美國沒有獲得它的獨立，我們也許看不到——英國的殖民，有如古代希臘的殖民一樣，是在與國內的人民平等，而不是附屬於他們的條件下出國的；當他們成功地拓殖了另一個遙遠的土地時，他們必要在最廣闊的範圍內統治自己；無論他們是對的，或是錯的——也許他們是錯的時候比對的時候多——母國不能用武力管轄他們；只有互相親善，共同利害，以及避免對他們的理論的斷定強作合理的主張，才能團結一個真正的殖民地的帝國。」

但是，根據常識而言，德國征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如它只能採取讓他們為所欲為的政策「無論他們是對的或是錯的——也許他們是錯的時候比對的時候多」？而且征服他們有什麼裨益呢，如果戰勝國不能以武力管轄他們？無疑的這使整個事情變成愚笨可笑的了。如果像德國這樣一個強國，用武力來征服殖民地，它將會發現它不能以武力管轄他們，並且唯一可行的政策是讓他們做未被它征服以前一樣的事情，如果他們要追求的話——許多英國的殖民地是要這樣的——許可他們待母國如異國。

最近加拿大在作一種討論，即若遇戰爭，加拿大領地對母國應取如何的態度，討論的結果使加拿大的態度非常明顯。它的結論大略是這樣：「我們必須時常有援助或拒絕援助的自由。」

一個異國能說比這個結論更多的話嗎？阿士克夫先生正式地同意這個意思。

這即是說，英帝國是幾個獨立自主國的一種不嚴密的同盟，甚至遇到戰爭時，彼此也不必負互助之責。奧國與德國的軍事同盟，比英帝國各部份爲了戰爭而結成的關係還要嚴密得多。

論及這點，一位評論家說：

「無論我們以何種語言來形容這個海外領土的防衛的新運動，它實在是各殖民地趨向完全的國家的獨立之更進一步。担負起自衛這個責任的意識，不單予愛國精神以新的勇氣，並且指出全權，配外交關係的必要。現在加拿大已經獲得了這種權，它有權限定各種與它的利益有特別關係的條約或其他定約。把這種權利擴展到其他殖民地國家，已認爲是一種當然之事。地方自治的國防這樣建立了，使帝國的聯繫減弱到最低的程度。」

更重要的，許是以下的鮑爾福先生親自發表的有力的宣言。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在倫敦演講的時候，他說：

「一個帝國的存在有賴於幾個絕對獨立的國會之合作。我並非以律師的資格講話；我是以一個政客的資格講話。從法律觀點來看，我相信不列顛國會比加拿大的或澳

大利亞的或好望角的或南非洲的國會都要尊高，但是事實上它們都是獨立的國會，絕對獨立的，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並且把不列顛帝國結構在幾個絕對獨立的國會之合作上面。」

自然這即是說大不列顛在加拿大或澳洲所處的地位正與大不列顛在任何其他獨立國家所處的地位一樣，它對澳洲沒有「所有權」，有如它對阿肯色沒有「所有權」一樣。誠然，最近英國歷史的種種事實已不能控制地建立了這個荒誕的奇論；我們對外國的影響比對我們自己的殖民地的影響較大——這即是說，對外國有較自由的機會來實行我們的見解。劉卡司爵士說：「無論他們是對的或是錯的——或者他們是錯的時候多」，母國必須聽其自由，這即是說，我們在我們的殖民地所處的地位比在外國所處的還要低微。在現時的國際趨向中，我們永不會夢想過主張我們服從異國，當他們不對的時候，近代歷史正在啓發這點。

我知道人們反駁說經濟以外的許多問題都牽涉在內；名譽心，英國在世界上的理想之保存，為英國式的，而不是外國式的，生活所支配的社會之建立。

在現代的世界內，征服一舉對於上述那些目的能達到多少呢？在我們較近的海外領土的擴張的事實看來，征服一舉對於上述的目的又能達到多少呢？

拿征服南非洲黑人共和國這件事來說吧。

驅使英國與荷人共和國作戰的較大的動機是什麼？維持不列顛民族在南非洲的優越地位，強行英國的理想以反對南非荷人的理想，變取英屬印度人及其他英國的臣民之權利，保護本地人使不受南非荷人的壓迫，從一種當時我們目爲「天生不能有文化」的民族手裏取得那個國家的統治權。費了二萬萬五千萬金以達到這些目的，其結果是怎樣？現在的脫蘭斯瓦爾政府是在南非荷人——部耳人——政黨的手裏。大不列顛曾造成部耳人及佔優勢的南非聯合國。大不列顛曾在脫蘭斯瓦爾及納塔耳的英屬印度人中實行同樣的部耳人的法規，而這些法規却是我們戰前認爲不平的，同時上議院及衆議院又剛剛批准了南非聯合國的一種法令，這種法令使部耳人對本地人的態度成爲法定的及永久的。在衆議院辯論南非洲的議案時，查理第爾爵士對於這點說得很明白。他說：「英國對於南非洲本地人的待遇之理論，與部耳人的理論不同，前者是主張所有的文明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的。在南非洲戰爭開始的時候，政府告訴全國這次戰爭的主要目的之一，同時當然也是任何媾和條約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保證英國的理論以反對部耳人的理論。現在部耳人的理論支配了整個南非。」代表英國政府的阿士克夫先生承認了這個事實，並且承認「對於反對聯合國會內的黑人席這件事，本國的意見差不多是一致的。」他繼續說「英國政府的意見與英國人民的意見切勿干預到一個自治的殖民地。」于是，在費了比

法普戰爭結束時德國從法國處強取得來的數目還要大的款項以獲得勝利後，大不列顛竟不能在被征服的人民中實行那個不惜一戰以維持的理論。

約在一年以前，倫敦來了一個脫蘭斯瓦爾的英屬印度人的代表團，他們指出脫蘭斯瓦爾的制規使他們喪失了英國人民原有的權利。英政府告訴他們脫蘭斯瓦爾是一個自治領地，所以帝國政府不能為他們想辦法。現在我們不會忘記，有一個時候，當與保羅克律革爭執之際，我們的不平的訴苦之一是英屬印度人的待遇。克律革被征服了，我們現在「佔有」着他的國家，我們自己所做的事是否即我們以前強迫克律革這個異國的統治者做的事？不是的。我們（或者無寧說是殖民地的負責政府，對於它我們是不敢干預的，雖然我們以前很容易便向克律革有所建議）只是完全實行他自己的規律。還有，澳大利亞與英屬哥倫比亞對於英屬印度人的見解與克律革總統的相同，而這個見解却曾經成爲我們作戰的理由之一部份。於是過程是這樣；一個異地的政府做了一些事情，我們要使它停止這樣做。異國政府的拒絕便成爲戰爭的理由。我們打仗，我們勝利，結果問題中的土地變成我們的殖民地之一，而我們却容許這個殖民地的政府繼續做我們曾經拿來作戰爭理由之事。所以，我們不已是達到我曾指明的可笑的境地——我們在自己的土地，即是說在我們的殖民地，實行我們的意思比在異國地方還要困難？如果一個異國政府永久地對我們的人民中的重要部份施以鄙野的壓迫，我們會馴良地屈服嗎？我們當然不會

的。但是如果施行這種暴虐的是我們自己的殖民地政府時，我們便毫無動作。一位英國的偉大的權威者說，即使殖民地政府是錯的時候比對的時候多，我們亦必須無所動作，并且，雖然殖民地政府是錯了，我們也不能以武力管轄它。我們亦不能說在這方面直轄殖民地與自治領地有什麼重要的分別。直轄殖民地不單有獲取自治領地的實際權利之傾向，同時它們的特殊利益又須不被忽視。

也許有人反駁說德國在勝利之翌日會計劃實行一種使它在殖民地內獲得物質上的利益之政策，有如西班牙與葡萄牙曾經計劃實行的政策一樣。但是，在這個時候，沒有殖民經驗的德國，可以施行一種大不列顛一百年前已被逼放棄的政策？如果大不列顛曾經無法維持一種政策使各殖民地付類似貢稅的<sup>西</sup>西給<sup>以</sup>德國，而沒有經驗的，在語言、習慣、種族關係及其他方面都處于不利地位的德國，却能夠實行我們不能實行的政策，還是可以想像的事情嗎？

固然沒有人會說英國現在之所以能維繫各殖民地是由于英國的仁愛或豪俠。它是由于遽斷開拓那個舊制度的崩潰。一個制度在社會，商業與政治各方面都完全失敗很久以後，才為法律所取消的。如果大不列顛堅持用武力使各殖民地處于不利的地位，則它會步西班牙、葡萄牙及法蘭西的後塵，喪失了它的殖民地，而它的帝國也會瓦解。

在南非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們聽到許多人言金礦山是促成這個衝突的一個因素。英

國及大陸的一般人都以為大不列顛是在「追求金礦山」。一篇長通訊在泰晤士報發表，論及那些金礦山的真正價值，并且考究大不列顛值得費多少金錢來「奪取」它們。好了，現在大不列顛已戰勝了，她奪取了幾個金礦山呢？換言之，英政府握有多少金礦山的股份呢？英國勝利的結果，有多少金礦山由從前的所有者轉到英政府的手裏呢？投了二萬萬五千萬金于這種冒險事業的結果，使韋斯敏斯政府強取了多少貢稅呢？

事實是英國政府並沒有獲得價值一鎊士之財產。金礦山屬於股東，並不屬於其他任何人，在現代世界的情況下，一個政府在戰爭勝利以後「奪取」價值一鎊的這類的財產，即使可能，也是沒有好處的。

而且，事實上這是主要之點，這個擁有世界黃金巨大富源之一的地域之政治統治權，已在漸漸從英國手中擺脫出來了。曾在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發生的事情，也將在南非洲發生。俄頃，英國衆議院的法令將不復在南非洲發生效力。「英國」對於這些金礦山的管治事實上將成過去。英國將要完完全全的及絕對的把這個管制權讓出來，一如這些金礦山已為某外國所「征服」。

我們目前的謬誤的術語造成一種印象，即是，由于早年就從事帝國的侵略戰，英國已解決了為德國及其他較不幸的國家所仍未能解決之領土的擴大與貿易的出路等問題。但這是曲改了真正的情形。德國遭遇過市場的擴大與繁榮的方法等困難問題。但是英國

遭遇到同樣的困難，指說英國由于「擁有一帝國的關係，應有與德國所無的解決方法，這簡直是太大的曲解事實。德國的情形與英國的情形實際上的差別，比這個謬誤的術語使我們推想的微少得多。

德國人常常對我說，英國有一個「廣大的帝國」予它的實業以市場，并予它的過多的人口以出路。英國沒有這樣一個東西。英國的貿易漸為那些決意變成自己的製品家之殖民地的關稅所攔阻。儘管有種種關稅的特惠，各領地的仇視性質的關稅，對於我們的工業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其嚴重的程度與外國的關稅一樣。異邦人簡直不相信這點。我知道有些德國大學的有學問的德國人，他們斷然地否定各領地是賦稅自治的，并且指出樞密院的議決案，「證明」英國仍保留不認可權。這簡直是一種博學的胡言，有如鮑爾福先生所曾經正確地指出的一樣。各領地對於賦課關稅是有最後權的，帝國已不復是母國貿易的維持者了；維持貿易的帝國的方法已崩潰了。如果明白了這種情形，則對於德國人（還有許多英國人）說英國處于非常優勝的地位，掌握所有的好處，而德國却受着饑寒交逼之苦，這種描寫可知是一種與事實不符的空想了。真正的事實是兩國在為增加着的人口找尋工作中，都遭遇到同樣的困難，而且是程度相同的困難。這個問題絕非「帝國的」，征服土地的方法可以解決，欲求這個問題的解決，惟有採用現代的辦法，使一個工業國家因開發一個它并不佔有亦無政治的統治權之土地而得以供給它的人口。

每一個現代國家的情形都是如此，即是它在海外開發最成功的地方是它并未佔有一尺土地的地方。甚至最長于殖民的大不列顛，它大部份的海外貿易也是經營於它并不企圖「佔有」，統治、壓迫、或支配的國家——它甚至偶然停止與它的殖民地進行貿易。

千百萬普魯士及威斯特發里阿的德國人在他們並沒有政治統治權之外國贏利或謀生。現代的德國人留在國內開發南美洲。如果他拋棄了這個原則，企圖以政治力量來開發一個地方，結果只有失敗。德國的殖民地是可笑的殖民地。德國政府須賄賂德國人到那些殖民地去；它與它們之間的貿易是極其微少的；如果德國在世界大戰（第一次——譯者）以後增加的二千萬人口需要倚賴他們國家的政治征服來供給，他們早已受餓了。供給他們的是那些德國從未「佔有」，而且從未希望「佔有」的國家；巴西、阿根廷、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法蘭西、以及大不列顛（德國，它從未用過一個馬克來作政治的征服，西班牙爲了征服南美洲會犧牲無數的金錢與血肉，但是如今德國在南美洲所獲的利益却比西班牙多）。這是德國的真正的殖民地。但是，它們所代表的巨大的利益，對德國有絕大的關係，沒有它們許多德國人民便沒有糧食，在外交家及軍人看來却是次要的東西；它們所代表巨大的貿易并非得力於外交家，阿加得事變無畏艦；它是商人和製造家的獨立無助的成績。所有這幾種外交的與軍事的衝突與競爭，財富的消耗，黎波里所顯示的難以形容的可耻的事情，都爲了交戰國雙方均能犧牲的若

千東西而發生，其實犧牲了這些東西不單沒有損失，而且有利益，義大利，它的政治家曾經忠於一切的舊原理（請恕我），將會很快的發現這一點。甚至它的犧牲者現在也停止力說它也許可以從這種巨大愚蠢的事情獲得任何真正的利益。

讓一個局外人——我很相信，他并不如地位較優者之為外交妄語所惑，也不如他們之為一種陳腐的說法所奴役——堅決要求在高位位的專家必需知道事物的真實性，比率，及對數目字有相當的知識，并且對於工業史，與人類合作的真正辦法，粗具學識，此豈非其時嗎？

如果我們能夠不為這種「地圖的迷景」的催眠所困，我們將來會放棄這些無益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即使成功，也不能解決任何真正的問題——把我們共同的力量用於重大的需要上，克服真正的困難。

因為現代世界確遭過着一個人口問題，一個武力許要担任職務的問題——這個職務將於下章陳明。

## 第七章

### 戰勝與人口問題

英國與德國的確都有人口問題，但是征服英國的殖民地並不會使德國解決這個問題，正如「佔有」了那些殖民地並未有使英國現在解決這個問題一樣。戰爭勝利只玩着變換國旗的把戲，並沒有改變了基本的經濟問題，而且實際上並不能予人口問題以解決的辦法。

在第二章的一個引證告訴我們德國的在加增着的人口需要加拿大的麥和澳大利亞的羊毛。並且繼續說，因此德國必須征服那些地方。

但是德國現在不是也可以利用加拿大的麥與澳大利亞的羊毛嗎？那些地方的農夫與牧羊人可否拒絕售賣他們的出產品給德國？德國人是否須付比我們較高的價錢來購買加拿大的麥或澳大利亞的羊毛呢？

「是罷……但是……如果德國佔有加拿大或澳大利亞……」

親愛的讀者，你（假定你是個英國人）「佔有」加拿大。（當你的銀行透支已超過了限度時，你便會想及這個事實。）你是否因此不費一文便可以獲得加拿大的麥與澳大利亞的羊毛呢？你不能。你必須清付你從你所「佔有」的這個加拿大取得的每一斗麥與每一磅羊毛，正如從阿根廷的小部落或美國購買的一樣。你可以用比德國人較便宜的價錢向加拿大購買麥嗎？

如果德國征服了加拿大，德國人可以不費一文便取得那裏的麥嗎？德國人也不是需要像現在一樣的付錢嗎？戰爭勝利能否在經濟方面發生真正的影響？

「條頓精神」與「生存競爭」這種美辭巧語，豈非只是一種與現世政治的事實不符的誇大的理論而已？我們的問題是因為獲取麥或羊毛困難嗎？各國是否企圖把他們的出產品留住不出售與別人呢？但是，各國所訴苦的並不是麥與羊毛與其他必需品之不可得，之被阻留，而是這些必需品之賤賣過速。每一個國家所注意的並不是設法奪取麵包或衣服，却是設法使那些品物不能運登它的海岸。

但是與真實背馳的趨勢愈來愈利害了。他們暗裏的意思是澳大利亞及加拿大一方面拒絕德國的發展，可是一方面却容許英國發展。它們是如此嗎？我們的國人可以毫無障礙地到這些我們「佔有」的地方嗎？我們可以自由地出售我們的貨物嗎？我們誠然佔有

這些地方；同時人們可以從「我們」手中把它「奪去」，因為每一個政論家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都用這些詞句。但是由於一種奇異的抗論，我們發現英國法律絕沒有在這些地方施行，這些「英國的佔有地」可以排斥英國貨物及英國人民，特別歧視我的貿易，禁止我們的船隻駛入它們的港口（最低限度在爲了若干目的，如爲了在沿海地點間運輸時是如此），禁止我們的工人在這些「英國的佔有地」尋找工作，爲了若干在英國并不算過犯的過犯，把英國人民驅逐出境……但是我們仍然「佔有」它們，而德國却正在設法從我們手中把它們「奪去」。

我認爲這些可以「喪失」，可以被入「奪去」的「佔有」，「所有」等名詞，用于英國聯邦是毫無意義的；這些「所有地」已變成獨立的國家，已如其他獨立國一樣的不復受我們所管治；我們之佔有澳大利亞，與我們之佔有阿根廷或阿肯色或亞利桑那，其情形與程度是一樣一樣的，對於我們的加增着的人口——對於德國的加增着的人口——這一國的資源與那一國的資源其可以開發的程度都是同樣的；德國利用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的資源來供給它的人口，其自由的程度與狀況與我們一樣。

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的事情，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至十分鐘之久，而沒有人力說既然英國曾用刀劍來獲得它的殖民地，很明顯的刀劍會爲希望殖民地的現代國家做同樣的工作。人們可以同樣合理的說，昔日的部落與國家既然會因奪去鄰近部落的奴隸與婦女而

致富，却奪取婦女這個慾望將永遠成爲國與國間交戰的有效力的動機。

在十六世紀的冒險商人面前的問題是什麼？他相信若干新近發現的外地裏面有金銀寶石與香料並爲野蠻人或半開化人所居。如果別一個商人獲得了那些寶石，很明顯的他便得不到了。因此他的殖民政策趨向于兩個目標，第一，對那個地方作有效的政治佔領，令他能制服野蠻的或半開化的居民，並且可以開發那個地方的富源；第二，作種種佈置，防止其他國家尋求這種富源如金銀、香料、等……因爲，如果他們獲得了，他便得不到了。

這是法國與荷蘭在印度，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故事。但是一旦這些地方產生一個生存在本地的有組織的社會時，則整個問題立刻發生變化。這些殖民地，發展到這個較後的階級時，其對於母國的價值主要是作一個市場及一個糧食與原料的來源，然而如果它們在這方面的價值能夠充分的發展，它們勢必成爲相當的自治社會，如此則母國開發它們與開發任何其他與它有貿易關係的社會一樣。德國或許能得到加拿大，但是它已不復能以採取金銀或其他排斥他國的方式來奪取加拿大的財富了。即使德國能夠「佔有」加拿大，它也只能像我們一樣的「佔有」它；德國人須清付每一袋麥及每一磅牛肉的貨價，一如加拿大「屬於」英國或他人。德國甚至不能使這些大社會變成一點點的德國化，因爲我們知道它們是種非常堅固的組織。被德國征服以後，它們的語言、法律、風俗將

與現在的無異；正如我們須保留南非洲的荷蘭語言與法律，魁北克的法國語言與法律一樣。德國將會發現德國的加拿大一如現在的加拿大——一個德國人可以自由進去並且已經進去的國家；一個德國加增着的人口謀生的園地。

其實，德國從像加拿大、美國、及南美洲等地取得它的加增着的人口糧食，並沒有遣送它的人民到那些地方去。德國移民的時代已停止，因為複式汽機已使大部份的移民成爲不必要了。使二十世紀的殖民地問題與十八或十七世紀的殖民地問題有極大之不同者，是上述力量所必然產生的種種發展。

但是讓我們暫且假定「國民評論」的理論是絕對及完全對的；德國需要克服澳大利亞或加拿大以供給它的人民；我們需要保住這些地方以供給我們的人民。這種競爭是一種生物學上的競爭，結果戰爭是不能免的。好罷，我們戰爭，結果我們英國人戰勝了，那個生物學上的問題解決了嗎？但是數百萬的嬰兒仍然留存着。對於他們我們怎麼辦呢？在勝利以後，我們是否向德國提議說：我們是勝利的。你們的海軍已被擊沉了。這些你們會佔有的殖民地將轉到我們的手裏。我們的海軍現在統治全球。走開吧，關於你們的嬰兒——這不是我們的事。與我們沒關係。

不錯，但是……那些嬰兒仍然留存在那裏，以我的批評者的假定的用語來說，是沒有麵包遺留存在那裏，我們是否認爲這些與我們的種族、宗教、文化、文明都非非常類同

的，有良好組織的中歐人，應該對待他們的過多的人口，有如拿破侖的主婦有時對待她的家貓所不恰宜地常常產生的子孫一樣？我們將否對他們說：「這個佔有全球面積五分三的帝國的 policy 是那些帝國以外的人沒有任何權利，甚至生存及取糧食的權利都是沒有的，孟加拉人，馬德拉斯人，馬來人，非洲黑人，通通都可以在這裏生存，並且在我們保護之下，可以繁榮增長；但是德國人不行。他們必須死亡。」

好，我們是否期望德國人接受這句話？任何一個不是瘋人院的人會以為這是最後一句話嗎？

自然，這是我們的軍事家永沒有答覆的問題。在達到勝利時，他的腦筋便停止思想了。因為軍事頭腦的人所真正感到興趣的是勝利這一件事的本身。以後怎樣，與他無關。無論他的理智怎樣不以為然，對於他，勝利仍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種手段。

在目前的一個辯論會內，當人們提出「勝利以後怎樣？」這個問題時，答覆是德國將「在地圖上滅跡」，它將復被分解為原來的幾個小國。這就是所謂對於生物學上的問題的答覆。但是，百萬的嬰兒仍會留存；你可以稱它們為巴威人，符騰堡人，來因蘭人，但是它們仍是原來同樣的嬰兒；仍有一樣數目的人口需供給。無論你稱他為來因蘭人或德國人，他總是一樣多的東西，

這種邊界的變幻，怎樣可以改變胃腹對糧食的數量呢？

唯有我們準備割破全數居民的喉，千萬人，包括婦孺，的喉，用武力解決爲麵包而競爭的問題之辦法才會發生效力。而這個辦法俱有事實上的與美學上的不便，關於這點我們不必討論。

於是居民仍是留存。我們禁止他們取用我們帝國的資源，因此事實上迫使他們過一種與苦力相同的生活。現在一個有良好組織的，有訓練的，文明的，有良好教育的，科學的，工業化的人民，遇着苦力程度的生活，這在歐洲中心區域似乎是一件難堪之事。不單德國人民「在地球上滅跡」以後仍然存在，德國的競爭也將仍是一樣一樣。「德國出品」這個字已成爲我們的實業家心中的一個恐怖；朗卡郡對於在印度新興的以便賤的苦力做基礎的棉業極感不安。織造業的主人們問，我們如何在那個工金只需數便士的地方爭取市場——我們的織造業是靠輸出的？但是試假想印度的苦力改爲一個德國的苦力，他是受有良好的教育的，科學的，受過現代德國所具有的驚人的組織能力之訓練，並且非常靠近我們。真是黃禍啊！黷武主義者要我們使德國成爲黃禍。

也許我們的政治生物學家，稱戰爭爲一種「爲麵包的競爭」的政治生物學家，在獲得勝利以後，便把各種事情置之不動；讓德國人繼續有盈餘的麥與羊毛以及其他；並且讓嬰兒繁長，雖然我們曾經戰敗德國的海軍。我們只是否認他們作一個統一國家的權利。我們可以把他們的土地由生物學的變更爲政治的。勝利將成爲一種廢止統一的東西。

好吧。這種現狀將維持多久呢？國際政治的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昨日的敵人變成今日的盟國，與今日的盟國變成明日的敵人，都極端容易的。巨大的戰爭並不是一種單獨國間的戰爭；它們是同盟國的戰爭。一個德國被屈服了，瓦解了，喪失了權利，自然會趨向東方：那一萬萬六千萬正在等待訓練的俄國人，以及在他們背後的，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四萬萬中國人。如果勝利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則它亦不能解決政治問題。

政治的地位對於人口問題固然有其重要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適與黷武主義者要我們相信的相反。如果政治的對敵，以取得政權為目的之政治的對敵，做成紛擾與不安，則你所獲得的是使有效的經濟合作成為不可能的環境，經過政治的巴爾幹化以後，你所得的是一種經濟的分解。讓我重提在上章所舉的一個例證。

在哥倫布時代，如今的美國所在地，只是一個主要以獵狩為生的僅僅足以供給幾十萬印度人的地方。各部落為爭獵場而互相戰爭，他們的哲學家無疑地告訴他們這種部落間的戰爭，是在資源有限的宇宙間為生存而競爭的不可避免的一件事。那幾十萬人從前所競爭的地方，現在供給着多過一萬萬的人民，他們過着一種高貴很多的生活，但是他們却用不着戰爭。事實是，如果那些幾印度人之後的居民也學印度人的榜樣分成幾隊繼續不斷地作戰（有如某一時期，該地的英國人，荷蘭人，法國人，黑人及西班牙人所要做的一樣）則一萬萬人在一個原來僅僅足以供給幾十萬人的地方過着一種非常高貴的生活

，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從這些混合的居民中，做成幾個細小的部落，甚或幾個細小的國家，彼此間繼續作戰，則美國必不會如現在的繁盛，必不能有如現在之經濟前途。這個殖民，雖有它的失敗地方，現在之成爲一個強大的而且較富有的殖民，是因爲它學會怎樣不打仗，以及怎樣保有大規模的經濟合作。

讓我們看一看自己的國家吧。

直至七頭政治的時代，英國僅僅供給一百萬人口，還時常遇着饑荒。幾個小小王國不斷地經常地作戰，批克特人與蘇格蘭人，薩克森與丹麥人，襲擊與掠奪，通通都爲了佔有牧場及沒有耕芸好的田地所出產的財富。現在這個地方供給四千五百萬人民，使最微小的工人也得到一種舒適和物質的保障。但是如果麥細亞，威塞克斯，漫森伯里亞，以及其他王國都堅稱他們的衝突是「生物學上所不可避免的」（事實上，這是他們的歌人所歌唱的話），並且繼續以爲一個不列顛王國攻打另一個王國這種戰爭是一個英國人供獻他的生命之最高尚的行爲；如果，早期英國的拉斯欽與羅斯福企圖保留這軍事的哲學，如果這個島仍是保留有七個國家，互相攻擊，如果戰爭在這個巴爾幹化的地方如在其他巴爾幹地方一樣的流行——則現在英國的人民會變爲十分細小和十分貧乏的了；維持四千五百萬人民在這個島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合作，不單是島國的，而且是全球的合作，他們才可能獲得文明的生活；唯有全球的合作，不管暫時的障礙，我們的人民

才可以生活。

現代歐洲的擠滿的人口之真正的「基本需要」是什麼？是使實業發展的程度，使所有作大規模的地理上的分工之經濟事業，得到保障以及很順利的進行。如果能這樣做，則所有的資源足以提高生活程度，使人口問題，最低限度在西方，得以解決。因為這個問題的一個矛盾是生活程度之提高使人口生產率減少。在生活程度低的農業國家內——在俄國，在愛爾蘭，魁北克，巴爾幹國家——人口生產率是高增的。在生活程度優良及有都市文明的地方，人口生產率大都是低落的。這種事實，連同因省人工的機器而增加生產的巨大能力，地理學上的分工，以及力量的新來源，充分地指出可以驅除凶荒的惡魔之路線。

所爭的問題是清楚了。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不會有凶荒，不會有凶荒這種事情，使高貴的生活與人口生產率的關係變成像剛才所說的一樣，如果我們能利用現代機器與集體生產的巨大的能力，能利用大規模的實業。然而有一件事使這個辦法成爲不可能的：繼續我們國家主義者的軍事的競爭，使全世界巴爾幹化。只有我們能夠把我們的合作事業立於全世界的基礎上，那些等待着我們的財富才能爲我們所用。這不單是貿易與實業的問題。即使由於某種奇蹟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經濟生命立於全國自足的基礎上，我們的貨幣與金融仍然與貿易及實業有不能解脫的關係，仍然難免變爲

國際性的；並且是極端易損的。我們不能夠使用那個可以供養我們的機器，如果我們繼續戰爭。這不是一個「戰爭或飢餓」的選擇。我們冒着饑餓的危險，因為我們着了戰爭的癡；我們將為求屠殺勝利而遭饑餓的滅亡。

讓我們把在本章及前幾章講及戰勝與人口問題的十分簡單，十分基本的真理概括言之。

1 我們現代經濟的真正的問題并不是任何資源的缺乏，假使現代方法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真正的問題是防止這些方法，特別是交易方法，的脫節。戰爭所造成的脫節的損失，是任何「掠奪品」所不能賠償的。

2 這是歷史上的一個簡單的記載，人類互相戰爭，則他們便不能如停止戰爭趨於合作時之能以充分利用可造糧食的普通資源。一個有四十萬印度居民，分為若干國家，經常在戰爭中的，也要受饑餓的地方，現在住着一萬萬不打仗的組織成一個國家的現代美國人，而他們却過着豐富的生活。

3 現代的征服，由于已經陳述的與市場等有關的種種理由，并不能減少需要供養的人口；通常，如在印度，且使人口加強。

4 現代機器與大規模出差方法的生產能力非常之大，如果能有適當的互相調和使之發生效力，則這個使互相調和趨于完善的辦法，比之把英國在亞洲或美洲的統治權變換

爲德國的辦法，對於救濟人口的困難更爲有希望。

戰爭所引起的生產器具的破壞以及征服所造成的磨擦，將使加增着的人口供給問題比征服前更加困難。

對於在這個討論中，人們時常引用來完全駁詰以上的結論之幾個特殊情形，也許需要再說一句話。澳大利亞對抗日本的權力是一個最普通的例子；如果沒有英國的海軍，則日本會攫取澳大利亞，使之變爲黃種人的土地，而白種人便會歸于滅亡。爲英國保存澳大利亞的是權力。」他們以爲如此便解決了要求國際合作以反對國際間權力的競爭這整個問題。

首先讓我們注意我們所需要審查的是什麼問題；不是什麼問題。問題不是一個單獨的國家在一個武裝的世界內應否唯其他仍然武裝的國家之命是聽；是勝利的利益（以在武裝世界內勝利所必須付的代價購買得來的利益）是否遠勝于那些從合作得來的利益，使以利益爲前題的國家永不會採取後一個政策。

如果我們把問題這樣討論：怎樣一個世界最能幫助日本解決她的人口問題呢，是一個競軍的世界，抑或是一個深知競軍的無益而轉向更有效的合作之世界呢？據我的意思，這個問題的答覆是毫無疑義的。後一種世界是最適合日本這樣一個國家的環境的。

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人們往往完全忽視了前幾章所提出的種種顧慮；他們以爲這

仙見解是對的，除非日本真在澳大利亞殖民，日本是不能利用澳大利亞的資源來供養它的人口。但是前幾章所敘及關於蘭卡郡與盧伊西安那的棉花之關係是怎樣呢；「阿根廷是不列顛的穀倉」，且將成爲德國的穀倉，雖然這兩個歐洲的國家沒有一個從政治的意義來講是「佔有」這個南美洲的國家；事實上廣大的工業化的居民，其所仰給的糧食是位于世界另一隅的外國所出產的——所有這些都被忽略了，雖然這對於日本一部份工業化的居民與德國或英國的工業化居民都是實在的情形。這是真的，日本，像十八世紀內英國，大部份仍是農業的；但是英國在十九世紀所經歷的變化，日本似乎在二十世紀內經歷着。（根據我們在別處所見過的，工業化的程度加增與生活程度高漲之際，我可以預料人口生產率的低減。）十九世紀初期的一千五百萬人口的壓力，對於英國，比二十世紀初期的四千五百萬人口的壓力還大得多，這是我們要記得的。由於搬運費之大大減低，這個世紀已證明對於一個人在世界的那一方從事日常工作較合適，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日見減小了。新西蘭人穿本國羊毛在英國織造的衣服，從經濟方面來看，對於他是有利的；把羊毛兩項的運經全球，從經濟的觀點看來，也是合理正當的。這類的事實可以說明人們稱爲遷居慾之所以減低的一部份原因；因爲它已低減了。我們在德國所看到的，移民的時代似乎大都停止了，種種證據證明日本人對於離開他們的祖國一舉也表露同樣的猶豫了。（雖然曾爲移民的事情鬧過，到美洲的太平洋國家去的確實人數仍是極

微小的。)誠然，移民的數目字指示人口的重行分配並不是現代世界所着手解決的問題，同時它也不能解決世界的人口問題。

日本如果採取以武力征服澳大利亞的辦法，它決不能解決它的問題，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如果我們看看其他在討論日本與澳大利亞問題時往往爲人們所完全忽略的事實。

一般人似乎都這樣假定，如果不是英國海軍統治了海上，日本只須伸出一隻手臂，澳大利亞便會變爲日本的殖民地。

好吧，英帝國最近得到一個相當顯著的證明，卽是，奪取一個幾等於荒廢的土地也不是如此單簡的事情。一個在比例數內的算術上的總和足以產生若干有趣的反映。南非洲的部耳共和國的人口等於澳大利亞的二十分之一，並且永不能在任何一个時候遣派五萬人上戰場。南非洲籍居民的土地完全沒有國防工業的。他們不能製造一枝來福鎗或一門野砲，但是，世界最大的帝國要費三年的時光，五十萬人以及二萬五千萬的金錢才能克服這一小隊農民，缺乏技術的武備，並且沒有同盟的農民。以這個作根據，日本需要多少錢，多少錢，以及多少年才能克服一個比部耳人多二十倍的人民，它大部份已工業化了，能夠製造軍備，有各種的技術人才，完全自足，而且在戰略上處於一個遠勝於部耳人的地位以抵抗日本呢？不列顛已在南非洲本地的好望角有一個十分強鞏的根據地。

日本在澳大利亞沒有這樣一個根據地。部耳土地並不是一種沿海的土地，使它的居民可以抵抗侵略者登陸。攜帶現代戰爭的種種器具，對付一個具有各種抵抗的要素的澳大利亞人民所必須的器具，在遙遠的海岸登陸，已被一再證明有種種困難，而且許多軍事的權威者認為這種冒險是沒有成功可能的。鑑於部耳人抵抗的歷史，奪取澳大利亞，無論如何總是一個極端浪費的，危險的與可疑的企圖。經過這樣一個努力以後，日本——以歐洲的標準來看仍是一個極端窮困的國家——在經濟方面將感到精疲力竭，不復能供給如許鉅大的款項以移殖大量的日本人口了。

而那時這個國家的估價將只是個開始而已。注意部耳國家的類似的例子吧。幾年間英國的武力與英國的政府撤退了，部耳人重新是政治上職位最高的人；抵抗不列顛的戰爭的指揮官現已鬻首相、有權驅逐英國人民；我們在前一章已看到的，全能的大英帝國沒有辦法反對他，五百萬澳大利亞人會比二十五萬部耳人更無抵抗嗎？

根據相當真確的經驗，我們可以說日本永久征服澳大利亞這件事是完全出於實際政治範圍之外的，即使英國海軍不復存在，也是如此；這樣一種征服的企圖是日本解決它的人口問題最無效果的辦法，一個安定的與有國際組織的世界，予它以若干國外市場的保證，會使它處於一個遠勝於軍事進取所能獲得的有利地位。

這絕不是說澳大利亞不會有一天聰明起來，為截阻日本的危險的夢想，在一切需要

的防備已完成的情況下，把北澳大利亞若干荒廢的地方劃作日本移民之地。事實上日本對於這塊地方能有多大用處，這是可疑的。但是這樣一種互相有利的安排——現在不可能，這是不錯的，但是以後許變為可能的——會和緩了某種不平，並且增加了一切有關的事情之安全與福利。

## 第八章

### 「然因戰爭而獲利者亦有其人」

無疑的有些人因戰爭獲利，正如有些人因天花流行而獲利一樣；但那些因天花流行而發財的人無權提倡天花，而那些因戰爭發財的有時却非常有力量去鼓勵後一種疾病，因為我們對於戰爭如何增進一國的利益之見解，與我們對於天花的見解是大不相同的。「資本主義」是各種戰爭的原因，並且戰爭是這個制度所生而有的，這個見解忽略了種種事實，我們可以指出它是錯誤的。這些爭論與「階級鬥爭」。

不錯的。有些人因天花發財了——製造血清的人，化學師，醫生。但是那些因天花而獲利而孤立者，他們不能如軍火製造商與其他的人有時用來鼓勵戰爭一樣大的力量來提倡天花。為什麼發天花財的人沒有權力，而發戰爭財的却有呢？

簡言之，因為無人可以真正使一個國家相信它會因天花獲利，或者以為獲得天花是一種責任，或是俠義的，或愛國的。但是那些因戰爭發財的却十分有權力，因為他們可以很容易使全國相信戰爭於它是有利的，正當的與光榮的。如果我們想使軍火商降為與天花商一樣的無權力，只有一個辦法——向他們所利用的羣衆說明戰爭之無益，使羣衆心中對戰爭發生一種與現在對天花同樣的觀感。軍火商只能利用羣衆心中的信仰，恐懼，貪慾，成見，憎恨，好鬥性，仇視。這些意識苟潛伏在一個人的思想內，他便很容易為軍火商所利用。

換言之，即使有些人真的鼓動戰爭，唯一的辦法是把這些人所利用的并且賴以獲得權力的謬論掘除。

然而「投資家是戰爭的原因」這種論調，有時擴而大之，便成為資本主義是戰爭的原因，戰爭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生而有之。

即使這個說法是正確的，我們仍可以正確地說，資本家只能用略取民意的方法使全體人民參戰——希求戰爭，要求戰爭，一如我們已一再看見全數人民所做的——預防這種情形發生的唯一方法是使羣衆知道自己入了迷途。苟羣衆為這裏所討論的謬見所迷困，則他們將永遠唯任何有害關係的一班人之命是聽。

事實上我們可以很明白地指出資本主義不是戰爭的原因。我們可以非常簡單地將此

事說明。假使北美洲原來的十三個殖民地當初不能聯合起來，並且在與英國分離以後，走西班牙的南美洲殖民地所走的路子，分裂為幾個各自的國家，則現在美國便分爲半打不同的國家；也許盧伊西安那成爲一個法國人的國家，西岸成爲一個西班牙人的國家，哈得孫流域成爲一個荷蘭人的國家，而新英倫則成爲一個英國人的國家。（結果，我們并不需費許多思索便可以料到墨西哥邊界的北面會發生墨西哥南面已發生過的事情。）如果，在最近一百五十年間，賓夕法尼亞或俄亥俄已成爲一個國家，盧伊西安那成爲另一個國家，各有自己的海軍與陸軍，關稅，貨幣，他們爲了河上與湖上的權力而爭執，我們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俄亥俄與盧伊西安那之間會發生戰爭，一如戰爭發生於智利與秘魯之間；在美洲的獨立國家間將有一種與存在於歐洲的獨立國家間，如德法之間，同樣的東西——歷史上的不平，國家的嚴重的宿仇，說謊的學校歷史教科書。

原因是什麼呢？資本主義嗎？但是資本主義現在不也存在於俄亥俄，賓夕法尼亞或盧伊西安那嗎？然而他們并不互相戰爭。他們不互相戰爭，是因爲他們不是獨立的國家。如果他們是的話，他們便會打起來了。用另一個方式來說明同樣的假定吧；假使曾一度統一歐洲大部份的中央權力仍在某一種教會或帝國形式之下保持着，則現在法國與德國在那個歐洲制度內所處的地位便如賓夕法尼亞與盧伊西安那的一樣。（或如瑞士的德國行政區之與法國行政區一樣）。歐洲的賓夕法尼亞與盧伊西安那將如美洲的國家一樣

，不復打仗了，雖然資本主義也許盛行於歐洲合眾國，一如它盛行於美洲合眾國。歐洲的國家發生戰爭，而北美洲的國家則保持和平，這並不是因為歐洲有資本主義，美洲沒有資本主義。是因為，雖然歐美兩洲都有資本主義，但是北美有一個聯盟，而歐洲却没有。戰爭的原因不是民族的分離，而是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主義。

現在分離派的趨勢，民族的政治獨立運動，並不是資本主義的運動，他們是羣衆運動。國家主義，無論在北美洲或愛爾蘭或巴爾幹，都是非常流行的。這並不是因為人民需求戰爭；他們要求獨立，「只是我們自己的」，他們不知道「獨立」即等於無政府，而無政府就是戰爭。無政府在國際的範圍內實行起來即等於一個大量的運輸企圖經過全世界的公路不用交通規則與交通警察。不可避免的衝撞往往誘過於他人。

「然而人民不要求戰爭」。東方人民並不要求霍亂症。但是他們不明白中世紀的衛生環境與殺害他們的病症間之關係，有如西方人民不明白戰爭與「全完的國家獨立」之關係一樣——所謂完全的國家獨立即是每人有權判定自己的權利（等於也有權判定他人的權利），於是每個人都往往要求他人居於一種他拒絕接受的地位。

無政府引起戰爭，並不是因為那一個特別壞，或者要求戰爭或計劃戰爭，其原因與行車相同，汽車路上每次行車將會有死亡，如果每個司機可以自由選擇如在英國一樣的駕駛左邊，或如在別的地方一樣的駕駛右邊；如果他認為討論如何駕駛他自己的汽車

是一種有損尊嚴的事情。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民不明白這種類似事實的關聯，不明白法律之需要；相信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是可取的；相信征服他人所獲的利益，作霸主所獲的利益，必遠勝於使我們的權力成爲文化總力量之一種輔力時所獲的任何利益；相信因國際間的安排而把國家的獨立犧牲了，這是一個國際制度所能產生的任何利益所不能賠償的。

我說羣衆這樣想。他們之所以這樣感覺，是由於他們持着這幾章所攻擊的假定，這個說法也許更正確一點。

資本家自己也這樣感覺。在爭辯資本主義不是戰爭的原因當中，你們不要誤會我說資本家不往往相信戰爭，相信他們的國家會因戰爭而獲利。資本家對於他的利益估計之錯誤有如他人一樣；他並不具有鋼鐵的腦筋與及無誤地研究自己的利害之能力，這是社會主義者常常用來描寫他的話。

那末這件事情的最明白最簡單的真理是什麼呢？是極少數的資本家用不正當的手段操縱一羣無知的與盲目固執的老百姓，在犧牲其他資本家的情形之下，獲得利益。如果我們把金融家這個名稱代替了資本家，恐怕更爲正確一點。「國際金融」在戰爭中有若干特殊的利益，這個理論幾把一切的事實都忽視了。

什麼是「國際金融」？是否指一小隊有希伯來字的姓氏的，額利用比他們較守法的

人民以謀生的法蘭克福銀行家？這是一幅動人的與投時好的圖畫，但它並不是真確的。所有銀行家、商人、投資家、買人壽保險的，握有任何一種證券或股票的，都是金融家，因為他們的興趣集中在財富的保障與更妥善的金融組織。甚至當我們從狹義的解釋來用「金融家」這個名詞時，我們大概是指一個他的財產有賴於一般的繁榮的人；如果整個世界都不賺錢與儲蓄以及存款，則各金融家便不能獲利——他們的職業便消失了。現代金融，無論從大量的或是有限度的來說，是與全體的安全與繁榮有密切關係，這是愈來愈真確的事實；這種事實愈明顯，則以任何特殊利益來反對全體的利益這種動機愈少。

這是真的，無論處於任何環境，如果你發現一方面全體的利益被誤解與忽視了，被容易發生的盲目偏執的感情所支配了，而另一方面則某一種利益又被過全地注意，並且不受這一類感情的影響，你必將見到那一種利益支配了全體的；見到五個或五十個或五百個人蒙混為幾百萬人去謀他們個人之利益。但是社會的不自然的改組是不能防止這種結果的；如果你使這兩個利益的因素相排斥。不單在金融與政治的範圍內如此，在像宗教或醫藥等範圍內也是如此。這歷代的教士策略，庸醫治療術，煽動民衆主戰等等的故事。

有一個時期，歐洲的種種殘殺與暴行，對於冥冥者的憧憬與輕信，都在擁有大多數人的宗教之名義下進行。這是真的事實，一個教士的朋黨可以使各國成爲玩具。這種宗

教以往在歐洲對於道德所生的影響，有如往往假借愛國主義之名的邪說，現在對於政治的影響一樣。

這一章是特別要向社會主義者與其他的進步主義者說話的，他們都矜誇自己能够擺脫舊的偏見，陳舊的政治思想。有這一章恐怕是需要的，因為，我驚訝得很，我發現許多多社會主義者與保王黨同樣地接納土地的「佔有權」，武力轉移財富是可能的，「佔有」殖民地的實現，以及諸如此類的陳舊的國家主義的幻想。

部耳戰爭的事變，使筆者認識了帶有許多社會主義思想的經外傳說主義與智慧的保守主義，都無條件的接納只看到表面價值的名詞。我在各處都發現社會主義者不單附和一般大陸人民的意見，認為部耳戰爭的基本動力是「奪取蘭德鏟」，并且真正相信英國的戰勝會把各鑛區置於不列顛政府的統治之下——誠然，當時大多數的英國人都這樣相信。然而：這是很明白的，一個南非聯合國會走英國其他的領土所走的路子，結果各鑛區都完全脫離了大不列顛政府的統治。這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把筆者去年與一個德國的和一個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所作的真正的論戰概括言之，也許能使若干論點更為明白。答覆外國土地的征服不能予戰勝國的人民以利益這個辯論，一位新時代的作者以德國征服印度這個譬喻作例證：

「……德國的銀行界會把資本主義將來在印度的進一步的發展所獲得的千百萬的

利益由英國轉移到德國……這是不錯的，在被征服的國家裏面，我們不會再用直接強奪這個簡單的辦法；替代它的是資本主義的侵略到處盛行。唯一的問題，是從某一國人民獲得的盈餘利益將歸由那一國的資本家？在現代的布爾喬亞看來，這是一切「國家問題」與「國家的矛盾」的歸結。……諾曼安哲爾將永不能使資本家與他們的隨從者相信他們的領地擴大會一無所得，因為他們希望領土擴大，使世界上的盈餘利益陸續加增地流入他們的「國家的」金庫。

第一、根據事實。我的批評者說在德國征服了印度以後，德國銀行界會將在該佔領區作資本主義的侵略而獲得的利益由英國轉移到德國。

他是否嚴重地以為德國征服了印度以後，英國資本家所握有的鐵路，鑛區，等等股票會被德國政府充公，並且轉移到德國資本家手中呢？但是他要知道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為利益的互相連結性太大了，這種充公，終歸使德國的金融制度與英國一樣受到打擊。當英國征服了脫朗斯瓦爾時，她奪得了多少鑛區的股份呢？不值六便士，鑛區的紅利仍歸股票的所有者——俄人、德人、法人、美人、土爾其人或印度人。

我所引的一段是否指德國征服了印度以後，德國的印度「佔有者」會防止英國的資本家在印度投資？這自然也是同樣無稽的。經過一場戰爭以後，德國在財力方面必比現在更窮困，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錢可取它都會要的；對取得的金錢它必需有保證，

這種保證它將以證券與股票的方式出之。如果它要在印度進行資本主義的侵略，它大概要向倫敦與巴黎借款；這即是說資本主義的侵略所獲的利益將歸於那些中心，其比率一如他們往昔所獲的。戰勝的能力不會使「轉移」生效。

他心中顯然以為決定資本家的利益的不是資本的來源，而是侵略所在地的政府的國籍。這樣的想像是幼稚的——雖然它是產生于一種仍然支配着歐洲舊派政客的混亂思想，這種想像依然是幼稚的。爲了使人們對於這個結果不發生懷疑，他濫稱，在戰爭中，真正的問題是：

「從某一個國家的人民獲得的盈餘利益將歸于那一國的資本家呢？」

誠然，這是第一個混亂思想的一種必需的系論；考爾茲會說資本主義的侵略範圍決定於資本主義政府的政治統治權；德國資本家不能在某一一個國家投資，除非他的政府把那個國家征服了。這些話是寫於并論及一個國家，它會產生羅斯柴爾德，卡塞爾，斯忒恩·俄彭海姆，門得爾松，與布雷哥魯德爾等人——他們的活動完全不因國籍與政治的區別而受阻；同時又論及一個國家，它的資本家在巴西、阿根廷、中國、埃及、土耳其、俄國、與印度都作大規模活動的！

資本畢竟比勞工的國際性大得多，資本家終究比勞動者較少爲國家主義的偏見所影響。勞動者不能同時在地球的六方，在六個政府領導之下工作（除非從一個非常間接的

意思來說)。但是資本家可以這樣，並且以這樣的方式來運用他的資本。大多數的大資本家，尤其自「地理的分配」資本爲人所贊成以後，都用交易的方法同時開發半打的國家，至於紅利是在那一種「國族」下分得的這一層，對於他們是毫無分別的，只要有利可分便行了。

固然，這是真的，許多德國的資本家寧願看到印度是一個德國的「佔領地」而不是英國的，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爲資本家與其他人類一樣具有虛榮心與無謂的鋪張之弱點，成爲這些土地的取得的大動機之弱點，換言之，因爲資本家所想的——與所作的——往往是國家主義者的而不是資本家的立場。無疑的有些德國實業家仍以爲如果印度是一個德國的「佔領地」，德國的貿易便可以獲得特殊利益，雖然這種封閉的帝國的方法，爲本國生產者保留特殊利益的方法，在以往已完全失敗，並且被帝國主義者中最成功的大英帝國主義者視爲不能實行的方法。

但是問題不是在德國商人現在願意加拿大或紐西蘭屬於德國或英國。問題是，從經濟的與資本主義的收獲這個意義來說，爲了把英國的「所有權」改爲德國的所有權而發動的戰爭，它所予德國人的利益是否能補償德國人在戰爭中所受的損失。我沒有一分鐘無疑的說，直接了解現代金融家的憂懼與性情的人，同時也知道那些金融家認爲歐戰所冒的險遠過於戰爭所獲得的十分可疑的利益。請詢問一位美國城街的銀行家，他現在完全

自由地在加拿大投資並取紅利（實際上變為加拿大的金融中心的不是倫巴街而是城街），使美國旗飄揚於鄂大瓦所能獲得的利益，是否值得使他們冒發動一英美戰爭之險。相信城街的銀行家會夢想「策動」這樣戰爭的人，即等於相信一種怪誕的胡說。我會更進一步的說。如果墨西哥的美洲投資者可以保證他獲得與加拿大同樣的安穩局面，他將願意墨西哥仍受美國政府以外的政府所統治，因為在美國政府統治之下，他將受制於反壟斷法，勞工保護法，商會習慣以及許多其他為資本家所不喜歡的法規。

這件事的真理是什麼？造成戰爭的經濟的與心理的力量完全無分階級的。大部份布爾喬阿，在利害與氣質兩方面，都是反黷武主義的，正如有些民主黨是黷武者一樣。我們有些人曾見過一個親部耳的貴族學生與一羣咆哮的暴徒式的勞工階級的義士為伍。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裏面的民主黨，在某幾點上是世界上最前進的，但無論在行為或精神方面都不是反黷武主義的；他們大都是兇猛的黷武主義者，在不列顛國旗下實施第一次強迫兵役的是一個勞工政府，而一個軟弱的抗議却發自布爾喬亞方面。

我們為什麼不顯這些明顯的事實呢？資本主義在他的經濟的理論上，一如社會主義之具有國際性；而在實行上，它的國際性比社會主義的還要強。對於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個理論的明確的否認，表現於一種帶嚴厲的，苛刻的，有時是殘忍的性質之法律的否認，首先發自前進的民主黨——我是指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美國的排外的，反黑奴的

，排日的法律。資產階級反對這種法律，勞工階級贊成它。我並非討論他們的各自的動機，或說勞工階級是錯誤的。我是在作確實的證明。在這一方面，如在其他許多方面，資本主義是非國家主義的，是一視同仁的，四海主義的，而社會主義或有組織的勞工却是激烈的，國家主義的，排外的。所以，防礙磨擦與軍備之消除的，有時是國家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態度與法律。

誠然，好的意見與好的戰略都指示社會主義者應與敵人合作，一如他們相信與敵人在這件事是利害相同的；拒絕這樣做便等於鞏固敵人的力量，削弱自己的，有如哈爾提與其他社會主義者之因有些保守黨的貴夫人贊成婦女參政運動而拒絕參加此運動一樣。

對於反軍備運動這件事，社會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的爭執是完全沒有的。如果一個非常膚淺的階級仇視的讀物使社會主義者以為這個運動是一種資本主義的事情，與他無關利害，以為這只是整個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一部份工作，並以為現政體一天存在，他們便不值得參與這種事情，好吧，整個勞動階級將會因這個錯誤的見解而蒙巨大的損失。

人們常好發一種理論，就是我們所有的困苦皆是代人受罪，這是一種危險的趨勢。在戰爭中，雙方時常互相譴責對方是造成戰爭的唯一原因。因此這個原因不是產生於他

們對於雙方相同的人類的組織或人類的社會之誤解，而是某一個「有罪的國家」所造成。現在我們要把這個原因歸咎於一個有罪的階級；資本家。這是容易的，預先準備一個代人受罪的對象；使如意的感情清醒，同時使公益心完全熟睡。沒有問題——良好的社會主義者不用作別的事情，只須撲滅資本主義的罪惡。我們以「我們的國家反對敵人」的情緒，變為「良善的人民反對惡毒的資本家」。在左派的政黨當中，我們很難得到他們對於國家主義的，或因國家主義而生的政治混亂的，種種問題作嚴重的注意；有些人對以下的說法完全否認，就是，與這個先於資本主義與歷史產生的舊惡孽奮鬥，「人民」完全用不着設法恢復舊思想或鍛煉舊情感。

戰爭，比歷史還老大，是種種感情，愚策，謬見，誤解，以及人羣共同的有缺點的政治機構之產物。這些誤解，這些愚策，都不是不可醫治的。但是它們很可能變成如此，如果我們堅稱它們不存在，堅稱我們不必為它們憂心，因為戰爭之發生是由於不良份子之互相排斥。苟我們以為「人民」（即是我們自己）是沒有錯誤的，則我們即使把所有因戰爭而獲利的人盡絞死，明天人類的社會仍將是以前一樣無助地在若干新愚策的掌握中。而促動新愚策的是一羣志在利用人類社會營私的份子。

## 第九章

### 人性與人類的制度

關於人性的議論往往是混亂的。人天生是好爭鬥的與無道理的，這個事實正好說明爲什麼講理性，澄清混亂思想，預先商定法律，計劃合適的紀律，與創立合適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你忘記」，退休的少將說，面上浮着一種微笑，暗示他對於和平，仲裁，國際法庭，裁減軍備，以及世界主義的主張者，握有最後的，全完的，決絕的答覆，「你忘記了人性。人是一個好戰的動物；好戰，好爭吵，無理性，隨時可爲一種很少有理性的目標而戰爭」。

一點不錯。這就是講理性與計劃新制度之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這定我們主張這樣做的唯一理由。世界主義者用來作他們的主張的根據的事實與少將用來作定局的反對

這種主張的事實，是相同的。因為如果有人並不是如他所描寫的動物一樣，而是「天生」具有社會的本性，隨時準備了解他方的意見，並不發怒，並不稱這種發怒爲愛國心，時常能够作他自己的審判者——是啊，我們自然不需要和平會議或國際組織了。但是我們同時亦不需要國家的組織，立法院、法庭、警察、也不需要十誠與教堂了。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一種用來應付人性的缺點的初步辦法。人類的接觸之發展與增加，使我們有增加組織之必要。增加組織之所以成爲必要，就是因爲機械的發達使我們的接觸增加，使它們的範圍擴大。這些接觸本身並不一定造成和平；它們造成戰爭也一樣容易的。「人性仍是如此」除非我們找出這條路的新法則（有如我們對於駛來的汽車需有法則一樣），使本能服從社會理性的紀律。

活動的和平主義者世界主義者並不是如少將所想像一樣，相信戰爭不致發生，他們相信戰爭一定會來臨，除非我們注意反抗它，如果人類不自覺的，天賦的傾向建立和平，則和平主義的活動是無意義的；我們所應做的是坐下來不管事情。我們所以力言理性之必要者，並非因爲人類隨時容易爲理性所領導，是因爲他們並非如此。如果人類不必經過多少討論便知道什麼是合理的，那末討論還有什麼意義呢？某少將將人性的議論完全倒置了，結果往往學生不能了解它。這不是改變人性（隨便怎樣解釋）的問題，是改變人類的行爲的問題；所以有學問的心理學者，每日的經驗，所有的歷史，都表明人類

的行為是可以因環境，制度，習慣，道德標準，忠告，教育等影響而生巨大改變的，人食人的惡俗，以人為犧牲，一夫多妻制，奴隸制度，火焚異教徒，對證人用苛刑，決鬥以及人類生活中的千百件平常的事情，都在人們不知不覺中改變。如果講及人性那句話改為「你不能改變人類的行為」，則對於西方日常生活的巨大的改變，將何以解釋呢？關於「人性」，贖武主義者往往以一種更肯定的口吻來議論。這種議論時常是這樣：人是好殺的，好爭吵的，無理性的動物，尤其當人類組織為幾十國家的時候。他們會為一句話，一個目標，作無數的戰爭。因此，每個國家都應配有充足的富有破壞性的武器。把這些武備取去，或裁減，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辦法。

讓我再次的說，正確的結論洽與此相反。

必須把本能置於理性統治之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次，一個美國的戲院裏面一位觀眾大呼「失火」。各觀眾服從他們的本能——他們自衛的本能；如果有一個必為人所服從的本能的話，那末這個本能便是自衛。他們是這樣做，大家起身，奔向大門；而那些門都闔閉了，結果十個人被踏死。其實並沒有失火。是一種虛驚。那些人之死是由於他們對於一個頃刻的衝動或本能作一種不能壓制的反應。幾天以後，另一個戲院內又叫失火。但是經理適在院內，他跳上台，以動人

的與鎮壓的聲調大呼：「坐定。時間多着呢。徐徐的起來，選定最近你的出口然後行去。不要跑。」全場人非常有秩序地退出；雖然這次真是失火並且結果戲院被燒為平地，但是沒有一個人受傷。

第二件事的遭遇是怎樣呢？有鍛練的理性，根據順從本能所獲得的經驗，指導了行為。智識，「如果我這樣做結果必如此」，增加了行為的原動力。

這些社會的鍛練形成習慣，於是習慣便成為第一本性，而非如有些人所說的第二本性。

什麼是安定與保障宇宙人類的生活所必需的，這個討論往往因引起奇異的與幼稚的極端理論而歸失敗。當你指出這個世界極需要一種制度以替代威脅我們整個文化的紛亂局面時，常常有人，甚至有學問的人，予你以一種反斥，如「戰爭是人的本性」，或「我們必須有武力——你會取消警察嗎？」；或者他們設法找出若干模糊的事件，證明現代的征服確能造成若干財產的轉移或使有些人獲得利益。

本書與極端的理論完全不相關。掃除癌症，其工作價值並不因人之死於肺癆而減低。我們能否以各種方法完全肯定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民間的戰爭將永不再發生，這類問題不是本書所要論及的。本書亦不擬設法證明，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戰爭對於勝利者或人類都永遠是沒有裨益的；它更非說在任何環境之下，武力永不能有一個社會的目的，

或是永遠不應利用。

戰爭許是不能避免的。或者，我不知道。無人知道。這是不是說無論在何時爲何種人——愚笨的與不負責的新聞界，煽惑人心的政客，軍火公司——所提議的何種戰爭都是不可避免的？疾病誠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西方，瘟疫，霍亂症，癩瘋都被掃除了。這不是——種收益嗎？這是一個我們可能得不到的利益，如果人們當時說（東方的人們是這樣說，結果這些疫病並沒有消除）「疫病——天命」。

本誓之目的在指出在人類活動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範圍內——國與國間的關係，它漸漸與維持有秩序的文明一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我們所根據的假定，經過試驗以後，證明是完全謬誤的；往往違背自明的事實，常識，算術，以及任何合乎規則的行爲。

在這種情況之下，說十全是不可得的，說人天生是一種乖張的動物等話是非常不切題的。我們不能因爲溝內污物必會潛進所有的水內，而飲有傷寒菌的水以自斃。問題是：你是否相信勿使飲水有溝內污物這個普通的衛生原則。如果你相信，那末最少有一個機會使我們不致再來一次中世紀的瘟疫。如果我們不相信，則我們必將再罹這種災病。而對着這種廣闊的事實，所有講及疾病之不可避免，人類生活之冒險，共同的命運，以及其他話的，只是糊塗地規避這個問題的論點而已。罪惡是時常有的；未採獲的謀殺也是

時常有的。你以為維持警察制度是妥善的辦法呢，抑以為罪犯既然不可免，則警察制度是一種錯誤呢？

經過最大的努力，我們許會發生戰爭。我們國家的憲法往往被違背，結果我們遭逢內戰。這並不是說每個國家必不可免地陷於南美共和國的境況，所以憲法都是不好的，永久的內戰是合適的或不可免的辦法，我們的社會組織是如此之不完全，在某種時機，為了保衛我們國家的權利，我們許會發現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說因此我們不應努力減少這種事故的可能性，避免陷於這種境況；我們亦不能因為在某種極少有的環境之下，必須戰爭，遂認為我們不必採取種種方法以避免無知的與無益的戰爭；也不能說我們的努力不能阻止回到混亂與野蠻時代的趨勢。有教育的人永遠犯這類思想的幼稚的錯誤，這真是我們對生活的準備教育之一個奇異的註解。

## 第十章

### 信仰，武力與世界秩序

世界不能沒有警察，但是它不能建立警察制度，如果它沒有「武力」以外的東西！——智識，紀律，與對本能的理性的指導，或「信仰」，對契約的信賴；警察的武力並不互相逮捕。軍隊是敵對的訴訟者所用的工具，警察是審判官背後的權力。把軍隊從訴訟者手中轉移為對於一種同意的法律之支持，結果它們便變成警察。我們不需要以巡警來保守德國的秩序，德人也不必以巡警來保守英國之秩序，雖然這兩個國家都有維持世界若干無秩序的地域之秩序之共同興趣。讓我們通通聯合起來支持一個大家同意的為各國的生活而立的法律吧。

本書不是一種無防禦的辯解；也不是一種不抵抗的辯解。它企圖剷除那些目前使我們不能利用武力來對國家與文明作有效的保衛之本能。

整個有組織的社會的經驗證明，如果要武力有效地用來保障個人的安全，一個明白的原則必須注意：個人的防衛必須成爲整個社會的責任，使整個社會利用它的武力以支持給予個人安全的權力或法律。

如果個人不能求得法律的權力來保衛他，必須倚賴自己的力量以自衛，則兩件事會發生：第一，他必須比任何有攻擊他的可能的人強大，在這種情形之下，弱者喪失了防衛，結果一方面的安全成爲他方的不安全；第二，如果與他人爭訟，他只有在比對方強大的情形下才能自衛，如此他便變爲這爭訟的審判官；即是，他不但審判他自己的權利，並且審判他人的權利。訴訟者是審判官。如果我要求作一個爭訟的審判官，我便拒絕對方有我所要求的權利。

跳出這個窘境的唯一辦法是雙方都不作審判官；雙方都接受第三者的裁判——使雙方的担負平均的裁判——以及接受一種立於當中的力量的解決，這種力量不是一個訴訟者用以對抗對方的力量，而是一種站在法律後面的優勢力量。

如果要武力有效地保衛個人，它必須是一種爲了上述目的之社會大眾合作的產物。

但是如果征服可以獲利以及戰爭是一種爲求麵包的競爭，這種種爲一般人所承認的見解（本書所攻擊的見解）是對的，則各國將會很合理地拒絕合作，認爲這是一種強者使弱者遭受的犧牲，拒絕合作的理由是，戰爭所獲的利益既然遠勝於爲履行法律而合作

所能獲得的，一個以利益爲前提的國家不應接受合作政策。

如果他國所取的世界資源就是我們的子孫所需要的資源，我們很自然地與合理地以爲這個問題不是建立一個世界秩序，而是戰爭，許是一個無了期的戰爭，成爲我們生活節奏的一部份的戰爭。如果我們以這個見解作出發點，我們自然會有這樣的結論，如上面已說過的，國際間的混亂比有秩序還好；戰勝所獲的利益，較世界牛耳所得的利益，遠勝於把我們的力量供獻於世界文明的總力量所獲的利益；並相信爲了國際的安排而遭受的國家獨立方面的損失，遠非任何一種國際秩序所能供獻的利益可以賠償。

然而反對任何新秩序的人通常是由於他們對世界主義者的目的作一種全然紛亂的解釋，他們相信他不是爲了希望他的國家得到更大的保障，是因爲他對國家漠不關心，他們並且把組織國際性的權力以保障法律這一個提議，混亂爲把權力完全交出。在國際間實行在國家內所實行的事情——以有組織的文明的聯合權力，而不是以各個的孤獨的權力，來作防衛——這個請求往往被混亂爲一種不防禦的請求，必需經過若干清楚解釋而後已。

兩種主要的謬見是普遍的：把一個國家的職分與警察的職分混亂了；從人是好爭吵的無理性的動物這個無疑的事實，做出一個合理的結論。我們時常聽到，「我們之需要軍隊與我們之需要警察具同樣理由」。然而警察的武力並不互相逮捕，也不是組織來互

相戰爭。軍隊却是如此。倫敦的安全並不因曼徹斯特警察的力量每次的加增而受威脅。但是每當敵人的陸軍或海軍力量加增，則我們的保衛力量便減少。很明顯的，軍隊與警察異體同功這種見解是不對與謬誤的。其錯誤之處何在，是不難見到的。

兩個國家對某一件事與他們的利益關係之意見相左。兩方面都堅持己見，並且企圖用它的優勢的國力以強迫實行它的見解。軍隊每次都成爲訴訟的一方用來反對他方的工具，俾能依照自己的主張來作自己的審判官。警察的武力是在審判官，法律後面的權力，防止任何迫使對方唯命是聽的舉動。即是說，警察的目的或職分，是支持一個大家同意的法律，防止訴訟者變爲審判官，與軍隊的目的與職分恰好相反，有如我們所已知道的，後者是使一個國家，爭執的一方，能夠決定這個爭執的處置辦法。警察的目的在防止以優勝武力來決解爭執，在保證事情的是非曲直能獲得公平的考慮；一國的軍隊的目的在利用優勝的武力以求獲得對已有利的解決，不顧對方的意思如何，亦不理會任何第三者的裁判。

警察的要素是，當武力從訴訟者手中轉移到法律的背後時，雙方都不致作對方不能有的要求。倘若我對你說：「讓我們接受第三者對此爭訟的裁判吧」，我是供獻我所要求的同樣權利；兩者有均等的機會，同等的權利。如果我說：「我意欲做我自己的辯護者，比你更強大，使我的權利得到保障。」，那末我是不讓你有我所要求的權利——

作這個爭訟的審判官的權利。倘若我的權利受到保障，則你的必不在這種把武力放在訴訟者背後的制度之下，一般的權利的保障是不可得的：一方的安全即是他方的不安全。軍隊可以在犧牲他人的同等機會的情形下予一方以正義（假定戰勝者適合於作他自己的審判官，則我們對於人們認為虛妄的人性所作的要求實在太大了。警察的武力予雙方以均等的權利。

「軍隊具有與警察同樣的目的」這種爭論的結果如何？

支持一種正常法律的警察權力愈增加，整個社會的安全愈大：一個國家或幾個同盟的權力愈大，則敵對的國家或數國同盟的危險愈大。後者必須抵抗前者的增加着的權力，因為它不知道它的仇敵將會利用它的優勝權力以達到何種目的。這是暴亂的權力。較有權力的一方所立下的法律或規則是那種每個和平條約都顯示出來的法律或規則：極端忽視了戰敗者在戰勝者為自己要求的東西裏面所應有的權利。事實上沒有一種足以統治國與國間的談判之法律；每一個國家都企圖做自己的法律。結果必使世界的大道上生出一種混亂狀態。

如果要我們生活的複雜的程序有效地與妥善地進行，我們必須有某種規則與制度；交通規則，再舉上先的一個例證。倘若我們真要確立這樣一個制度，兩件事是需要的：大家理解他們的需要，以及同意成立幾條基本的規則，並共同合作創造一個共同的力量

以支持它們，支持交通警察。這樣一個力量許只是各國共同分担的，用以保障這一個特殊目的之力量。

一種規則則是必要的，並不是因爲人類一定是罪戾的，是因爲他們對於權利的觀念，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法各有不同處。現代的汽車路會不久變爲完全不可用的，如果我們以信仰駛用者的「天賦的善性」來替代規則與制度，聽任各人只憑本性與良心的指導，便宣行駛，正如當你訴訟的一方誠實地，真心地，情感地相信他是對的（對方是錯誤的）時候，衝突的危險性是最大的。然而討論和戰問題的雙方往往忽略這種事實：贖武主義者說「我們當然應該公平的。我希望我的國家是公正的，而它時常都是如此，因此外國人可以信任我的力量」；和平主義者都暗示只要人類遵守人道，則衝突不會發生。但是在某種情形之下，什麼是人道呢？它怎樣決定我們應駛向右邊抑駛向左邊呢？

社會發展到現階段，其問題不是在於我們應否有武力，而是在我們應有個人的競爭的武力以堅持自己的意見，抑或社會共同的力量以限制個人違犯共同的規則；武力應在敵對的訴訟者的掌握中，抑在審判官，法律，的掌握中。

這種同樣錯誤的爭論，把「信仰或武力」解釋成敵對的或和好的政策，是說下面的話的贖武主義者之混亂思想的根苗：

我不希望戰爭，但是我同時不希望——也不想——把我的國家的權利置於危險

之地；爲了防止這纒事情，我會不惜一戰。

你們這些和平主義者似乎不會如此。就我所能判斷的，你們準備拋棄你們的國家的權利，任從外國人的處置；信賴他們的仁慈。我不是這樣。戰爭是不好的，但是不注意地拋棄你們的權利這種行爲更壞。

和平主義者曾讓「他的辦法危害國家的安全比黷武主義者的更大」這種假定的說法生長起來。但是，有如我們所已見到的，由於它的本質，黷武主義者的方法結果是失敗的，欲以國家的優勢來覓致普遍的安全在實質上是不可能的。和平主義者，國際主義的主張，首應以國防的需要爲根據；根據事實，國防只有賴和平主義的方法才可以永久地完成。

當黷武主義者爭論「你不能倚賴紙上的保證，必須信任剛勇的拳頭」，他大大地忽略了一種事實，即那些剛勇的拳頭之與你共同作戰抑反對你，是根據契約——紙上保證的。真的，我們的陸軍或海軍之忠於國家，抑或叛逆他們的長官，並非賴體力（在體力方面官長是不如士兵的）是有賴於精神方面的東西——紀律、向習、契約。我們的陸軍或海軍之是否充足，是以我們所須應戰的敵人之力量而定。一個有兩艘艦的國家，遇到只有一艘艦敵的人，它便是強者；一個擁有二百艘艦的國家，遇到有三百艘艦的敵人，它也是個弱者。但是我們海軍所須應戰的力量又需視同盟國如何而定——這個國或那個

調的海軍是與我們共同作戰呢，抑反對我們呢。這種決定則有賴於契約的遵守，對於保證的信賴，對於武力後面的精神的因素之信賴。決定權力的效力，武力之社會的或非社會的素質，是這種精神的因素；這是決定動用武力的整個問題的一個事實。只有人類的意志可以動員武力來解決人類的事件。如果沒有追求某種目的之人類之聰明智力參入其間，則戰艦便建築不成功，鎗砲亦不能放發。

任何涉及人類集團的武力的動用，無論它是組織一隊海盜或首都警察，必須有一種對於「紙上的保證」，「信心」，「道義的權力」的信賴。除非一隊海盜可以互助，相信戰鬥中不會因洩私人仇恨而打自己的隊員；除非船主能守分贖的信約，遣羣海盜在一星期內便瓦解。海賊業之成功有賴於各人之能守契約，尤其不互相動武的約言。每個國家「信賴自己的力量」，這種論調，稍知外交策略的人都知其為一種胡說。因為可以單獨倚靠自己的力量，這種論調，第一個同盟國之支配。巨大的現代戰爭並不是一國與一國間的戰爭，而是同盟國與同盟國間的戰爭，每一個戰爭的準備是同盟國的安排。最後的結果有賴於外交家之能否成功地運用道義的，辯論的力量。「在槍砲面前，談判與辯論都是無用的」，某少將說。但是只有由於談判與辯論鎗砲才可以拿出來——報紙上攙護戰爭的辯論，國會裏面為求通過徵兵案的辯論，與為求得我們之同盟國而與他國舉行的辯論，招募軍費之辯論，參謀本部內的辯論；並且，事實上，鎗砲之

爲我們所用抑用來打我們，也有賴於辯論之結果。

成立警察以前，我們必須先討論一件武力以外的事情——創設警察的協定。這種協定，這個精神的因素，必在武力的因素之前；警察不能使自己成立。但是有人會進一步說。如果一般人對交通規則的效用之認識是如此不足，使我們不得不在每個車輛上派一個警察來監督司機人遵守規則，則駛用汽車將成爲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目今我們在公路上的生命安全是有賴於他人之能充份認識依照路線之道德。警察是必需的，但是如果一般人不能認識交通規則的價值，則雖有警察也是無用；誠然，公路上絕不會有警察，除非事先我們有組織——不是威迫所能造成的一種社會合作的事情。我們說權力是國家的最終目的；但是產生權力，能產生一種共同的權力，建立警察力量的，却是一種精神方面的東西，一種社會真理的承認。而且，如果警察他們自己不了解遵守契約的利益，每次都需施行強迫，我們更要派一個警察來巡邏這國警察，然後又派一個來巡邏那一個警察，等等。對於古羅馬的誰監守那些監守人這個問話之答覆是，最後的監守人是，而且只能是，公衆的理解與智識，認爲彼此有益的契約是一律該遵守的。但是與契有關的幾方面必須了解其共同的利益。

沒有一個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人煙稠密，生活程度高——能夠繼續存在，如果它需強迫各人盡他們的職分或者是各人不經強迫便不盡責。如果鐵路的信號手需要一個警

察來監視他，使他不致去睡，則全人口的一半將要監視另一半了。那末誰去巡視那個警察是否值班呢？「國家就是武力」這個建議是一種明顯的謬見。武力是一種工具，國家可以在固定的範圍內，藉若干先在的慣例，國民的道德的假定，利用之。沒有這些道德的前題，國家絕不能行使職權，不能運用它的武力。真的，在某一點上，社會是賴墨守一種不使用武力的默約而生存的。如果一個政府決定不顧反對的議決，宣布永久的獨裁，這個國家怎樣辦呢？起革命嗎？好吧。如果這些戰勝軍的首領們，或它背後的政客們，在選舉失利時不肯守約將他們的權力讓出，怎樣辦呢？組織更有「力量」的革命嗎？但是這個軍隊本身也會變成專制者，除非它決定不使用它的權力，並且服從國家的意思。沒有「武力」可以保護這個國家不受政府權力的專制（它并不能保護南美共和國，那裏有上述的情形）；只有遵守政治契約這個向例可以這樣做。

注意，任何「制裁」之所以生效，依法處罰之所以發生約束的效力，也是有賴於未來的罪人方面具有某種道德的品質，如權衡利害得失的能力等。從前一位馬其頓的遊客詢問一位士爾其的官長爲什麼每個遊客或郵車都需派兵保護。「爲什麼不建立一個憲兵以妥當地維持地方秩序呢，如此你們便不需派兵來保護每個郵車或遊客車了？」士爾其的官長答稱：「但是盜賊們如果看見一個遊客沒有保護，便一定會截劫他的。盜賊不是可以了解一種複雜的推論的人：『如果我截劫，我將會被捕，如果我被捕，我將受審判

，如果我受審判，我將被定罪，如果我被定罪，我將受絞刑。」啊，如果盜賊們可以這樣辯論的話，他們便不會變為盜賊了；他們會成爲大學教授，預言將來了。」

然而西方整個刑罪的制度是根據甚至犯人也有相當的「理性」這個假定而建立的，這使土爾其的官長不勝驚訝。真的，沒有理性我們的文明會完全消失；甚至它的「力量」也會失效。

我并非在這裏重申社會的民約論。這是真的，國家之產生是由於某種中央力量以克服小者的方法漸漸擴大自己，因而創立一個中央政府。但是甚至在由封建政體發展爲現代國家當中，各藩主間的協定也是必需的；我的意思是，在現代的情況中，這種協定的地位必須漸漸提高，而單獨的統治，其地位必須漸漸減低，理由我已經說過：現代社會的複雜情形使各人或集團或國家不能統治一個被佔有的反抗的力量；這些複雜情形是整個機器的一部份，而我們却是屬於這個機器內的，并且無法與之脫離聯絡的。即使我們與德國打仗，我們不能統治它，它也不能統治我們，一如我們之統治，譬如說，印度。我們不需要這樣統治德國。我們在印度的工作，大概是一種警衛的工作，維持各好戰的小國家間與部落間的程序。但是我們不需要在德國維持秩序，德國也不需要，在英國維持秩序。

因此，這兩個國家間的潛伏鬥爭是無益的。這不是那一個民族的天生的需要之結果

；只是那種可悲的混亂思想在現代政策中作祟的結果。

在一個他國不能與之從事社會的經濟的合作之地方，我們許需用武力的干涉，不是因爲有「合併論者的迷夢」，是因爲真正需要維持秩序。這是英國在埃及，或在印度，或在那裏的故事。但是外國不需要在英倫三島，也不需要在美國，維持秩序；雖然在如委內瑞辣這樣的國家也許有這樣的需要，最近幾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把這些國家帶進世界的巨大經濟潮流中，並且在它們裏面建立整個於秩序有利的事業，這個辦法，比用武力的征服還更有爲。我們偶然聽到德國故意捏造的關於巴西與別處的謠言，但是甚至一般歐洲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少少的知識也使他知道這些國家，如其他的一樣，是「太穩固」了，非一個異族國家所能武力侵佔或征服的。

這是整個英德衝突的一件滑稽的事情，即是，因爲英國一般人太注意這個衝突的怪誕的神話，他們似乎靜靜地把此事的實在情形忽略了。其時甚至最野蠻的汎德意志主義者也從未向加拿大那個方向投過一眼，他的目光所注視的是小亞細亞；因爲認識了我會說過的維持秩序與征服的分別的原故，德國的政治活動許會集中在這個區域，德國的工業已漸漸在近東獲得一個支配的地位，因爲這些利害關係——市場與投資——增加的原故，這些地方更好的秩序與更完善的組織之需要亦隨之而增加。德國許需要警衛小亞細亞。

我們有什麼利害關係要阻止它這樣做呢？設使它所獲得的權力是爲了警衛或爲了執行一種警衛的職權，爲了實行一種法律，一種公路的規則，而不是用來使警察權高于法律，支配法律。

我們並未準備成立一種關於警衛全世界的任務之協定，因爲我們沒有習慣把我們的問題看成一種替各人維持公路上的平等交通規則之共同任務。我們仍然視權力爲一種各人爲自己奪取專佔的「所有物」之工具。

因爲警衛落後的或無秩序的人民這種工作往往爲合併主義者的迷夢所曲解，結果關於這件事的爭鬪之危險便成爲事實。並不是因爲英國警衛印度招忌。並不是因爲它是爲世界大多數人做着一件真正有用的工作，爭鬪之所以產生，是因爲他們有一種觀念，以爲英國在「佔有」那個地方，並且從那裏取得禮物及獨有的利益。

其他國家要得到英國的恩惠許可才能出入它統治的地方。他們發生英國許會排斥他們的恐慌。那裏沒有確定的國際權利，對世界其餘的人沒有明白地與正式地規定的義務。各國覺得這樣是不足以作爲必要時的經濟需要之據點。因此各國都希冀，如果可能的話，居於「佔有者」的地位，並且担任警衛的工作，這種競爭的結果遂生出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對於權力的可笑的可怕的蹣跚戲。

使用公路的人不大家坐下來商量設立公路上可行的規則，使各人可以和平地與安全

地旅行，却各人設法奪取自己的小部份；在這一小部份的公路上運用自己專有的主權以阻止他人使用它。

請注意在實行時怎樣辦：

這裏有兩個國家。其中一個，我們假定，是個海岸的國家，擁有為位於內地的隣國的經濟發展或福利所必需的不凍港、河流、交通線、或原料。遇到討論利用這些港口或河流時，那個海岸國，因為是獨立自主的原故，在討論的某階段會對它的隣國說：

「你需用這些港口、河流、公路、運河、原料。注意，唯有我們能夠決定你是否可以使用，或者在什麼條件下可以使用。我們既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可以禁止這類的的使用，當我們覺得這樣做是於我們有利的時候。如果我們要在我們的港口對你們的船抽兩倍或十倍於我們自己的船所付的稅，這完全是我們的事情。我們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嗎？關於這個大洋間的運河，它許是你們的商業所必需的，如果我們願廢棄現存的條約，並完全豁免我們的船所應付的稅，把維持這個運河的責任放在你們身上，這也完全是我們的事。這是我們的運河，不是嗎？我們佔有它的，不是嗎？」

或是用妥善的外交辭令作答。雖然，關於大洋間運河的事情，有時是橫過大西洋

位於內地的國家接受這個意見嗎？早晚它會說：

「在爭論我們的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事情中，在一個你是利害關係者的爭執中，你要求單獨制定怎樣是公平的辦法。這種要求威脅我們的重要利益，威脅我們必需的自由與安全。」

自然我們這裏所有的只是一個非常微小的爭執之未成熟的材料。這個爭執劇烈起來；雙方都大發雷霆，雙方都稱它為愛國主義，結果早晚發生戰爭。

我們假定內地的國家，因為答應分與敵人土地的一部份而獲得同盟國，結果勝利了，併吞了它所需要的東西，並且取得溫水港河的兩岸、運河，主要的流通的鐵路、礦區、油井、或一切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東西。

好，你許會說，武力發生經濟效力，武力可以達到最完美的經濟目的，這是一個明白的實證。

然而這是戲劇的終幕嗎？這只是第一幕而已。第二段是什麼？我們現在有一種領土回復主義者的土地：亞爾薩斯、愛爾蘭、波西米亞。內地國家已違犯了愛國主義的原則，結果它的新屬國裏面發生種種騷擾、陰謀。詩人歌唱、雄辯家演說、愛國之士暗殺，而這次獲得最好的同盟國的，許是沿海的國家。

如果你想知道甚至一個小國所擁有的抵抗力是如何的強大，以及在幾年間它所能動

員以反抗一個大國的武力是如何，請讀最近五十年的愛爾蘭歷史吧。

對於這個小小的囚犯，征服者們只管是如何的有權能，他會使他們極難平靜地從事自己的工作。無論愛爾蘭人是在韋斯敏斯德或在打仗，英國的政治一再地爲這個永久的問題所紛擾，當英格蘭人應該決定他們自己的問題時，他們却爲愛爾蘭人所決定了。愛爾蘭隔於我們與美國人之間。它使我們決定外交政策發生困難，對於那些遙遠如巴拿馬港稅問題與美國的沿海航行法等事件，它也使我們遭遇阻礙。以這類的方法，以及其他方法，愛爾蘭形成一種抵抗，這種抵抗是需要絕大的犧牲方能克服的。結果我們放棄不斷的威逼之方法。並且，再次的，如斯賓塞的喻言內的征服者一樣，發現彼此磋商是個聰明的辦法。

於是，在我們這兩個國家的故事裏面，內地國家之征服海岸國家只是第一幕而已。故事的第二幕是被征服國家仿倣亞爾薩斯，愛爾蘭的抵抗：這種抵抗早晚引起一個抵抗的戰爭。在這個新的戰爭中，我們假定沿海國家勝利。它現在「解放」了，再次是一個自由、獨立、與自主的國家了。

現在第三幕開始。挾着它的新自由、獨立、自主、挾着它的勝利，我們的沿海國家做什麼呢？她再申明——用比以前更大的暴行，因爲它現在有舊怨要清算，舊壓逼要報復，並且有新權威來運用——在第一幕引起戰爭的同一的態度，同一的要求——還加了

多少。她再次對她的內地隣國說：

你需要出入海口，沿我們的河流，利用我們的港口，運河，鐵路；需用鐵，硝磺，棕果，市場，殖民地，未開發的土地。我們將決定你應否有它們，並且依照何種條件。沒有這鐵礦你不能生存嗎？我們已繳了你們的軍械，並且仍然沒有予你們以抵抗你們的武裝隣國之保護。而你們必須生存。我們不覺到這種需要。並且，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是裁判人。」

於是，基本的困難自然比以前更尖銳了。因為戰勝者已正當地取了內地國所有的鐵礦或殖民地或溫水區，并笑她為「懶蝦蟆想吃天鵝肉」。

有人以為這第三幕就是最後一幕嗎？這種暴亂的權力的新分配最後是人類的「永久解決辦法」嗎？如果一個小國能夠成功地抵抗一個大國，為什麼那個大國，處在小國原先的地位，便不能成功？自然的，這個遊戲繼續下去，新策劃，新同盟國，新戰爭；新懲罰的條約，更多的怨恨要清算，更多的仇要報，以及用來處罰先前的戰爭之最後的懲罰的條約，而先前的戰爭是起於先前的條約，先前條約却又是對更先的戰爭之一種報復……從頭反覆一遍，以至無窮。我已經差不多寫到討厭了，而報復却不知討厭。

誠然，死亡，虛妄，與無益的不可避免的及兇惡的循環也許可以打破，如果，在戰爭結果以後，勝利者，無論是兩國中的那一國，說：

「我們曾爲了若干事件——安全，軍用的邊疆，未開發的土地，原料，交通線——而爭執了一百年，或五百年。我們許會繼續爭執下去以至無窮。我們知道你們需用若干我們所統治的東西，需要在我們的政治統治下的地域有若干行動的自由。讓我們磋商這一切事情吧。我們將同意若干相互的條件，想出一個經濟權利的法案。因爲有許多是與我們有關係的（時常 有許多的），我們不必以武力互相角鬥，各人企圖比別人強大，我們將均分我們的權力，并且把它放在權利法案或法律的後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則雙方第一步爲國際社會所做的事情，將是每個國家內羣衆社會已經做的事情。權力會成爲共同佔有的工具，公平地施行共同的法律的工具，如在各國裏面一樣，而不是一種各國用來強使他人贊同自己對於自己的權利的意見之工具。

爲什麼不採取這樣的步驟呢？我們爲什麼不採用我們在這個地球上所能指出來的明明是聰明的，簡單的，有效的，以及唯一的解決人類的智力與聰明的最大缺點之方法？

## 第十一章

### 什麼使我們戰爭？我們有此需要嗎？

人類太愛權力與支配權了，苟他們相信可以利用它來達到所希望的目的，他們是永不會放棄的。但是當我們知道它簡直不能予我們以所希望的東西時，我們便會轉向合作之途；而我們的要求也改變了。人類該有戰爭，這也許是與他們的本性有關，但是他們之所以戰爭却與他們的教養、習慣、訓練、習例、思想的方法有關。我們現在知道爲宗教而戰是無價值的與不相干的。我們也可以明白爲我們的國家主義而戰，亦是無價值與無關係的。

好，我們爲什麼不這樣做？

第一，因爲我們拒絕發現它的需要，並且拒絕暴露老辦法的失敗之處；毫無疑義的，各處都有一種強有力的本能的保持黷武主義的方法之推動力，他們所以這樣做，爲的是他們自己，與任何獲得安全與利益的事不相干。（這種討論的好處之一，是它逼使我們

從各方面詢問我們所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是成功，經濟的保障，虛榮心的滿足，或者是什麼；尤其如果這些需要之一與其他需要發生衝突時，我們需要它的程度如何。因爲，這是很明顯的，許多他們的態度決定了一般政策的人，對於這基本問題沒有發問過。

密切注意前幾年的和平主義的人，會看到反對派的論據之一種奇怪的變更。直至最近，和平主義者都普遍地被批評爲過度的理想主義，多感，忘記了人類在一個競爭殘酷的宇宙內的需要，并且往往以「一種主日學的人生觀」來過分地要求人性走向利他的自我犧牲之路。他們使我們知道和平許是代表一種偉大的道德標準，但是人類的兇惡的感情與貪慾會時常阻止和平的成功。我在本書第二章所舉的引證，我認爲直至現在都充份的證明這種論調是那些視戰爭爲人類競爭中不可避免的一部份之人們的立場。

在最近幾年間，黷武主義者的立場已變更了。反對和平運動的人告訴我們，和平或許能保證人類物質方面的利益，但精神的木質會阻止它的成功！和平主義，并不被稱爲大理想主義的與多感的，現在却指譎爲卑鄙的物質主義。

我之所以提醒人們注意這種立場的變更，並非爲了作一種無價值的嘲罵。讀者許能證明，本書從頭至尾堅稱予爲道義而戰以公平的品評是非常重要的。

我提醒人們注意這種不自覺的變更立場之目的，在指出爲經濟關係而戰這種主張，

實際上已成爲不可取的，結果這種情形逼使坦護戰爭的人變更他們的立場。

書於一九一二年，海軍上將馬罕對本書作如下的批評：

「整軍的目的，在維護它們的人心中，不單是爲了一種經濟的利益，奪取一個隣國的經濟利益，或恐懼懷有此種目的的敵人之侵略，使自已看到喪失經濟利益的結果。

——該書的基本議論是一種錯誤。各國對於戰爭本身之無益這一點，並沒有作何迷夢。該書的整個觀念本身是一種迷夢，這種迷夢發生于它對人類行爲的大大的誤解。認爲世界是完全爲自私自利所支配，這種觀念即等于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的世界，一個理想世界，一個爲一種比人類所堅決地維護的主張更無價值的主張所佔有的世界」。

但是在四年以前，馬罕將軍曾自己把國際政治的因素概括如下：

「希望各國始終如一的爲了利益以外的動機而行動，是徒然的，這是現在如此，華盛頓執筆著作時如此，將來永遠如此的真正的事實。這是以實念論爲名的德國政策之明白的動機。根據這一點，研究利害關係——國際間的利害關係——是政治家的正確的，深謀遠慮的政策之一種基礎。

有權力者得之這種陳舊的掠奪本能殘存着……精神的力量不足以解決問題，除非有物質的力量支持之。政府是種組合而已，這些組合是沒有靈魂的。……

它們首先必須注意自己區域內的敵對的利益……它們自己的人民的利益、商業的與

工業的利益。優勢逼使一個國家尋求市場。並且，可能的話，用優勝的力量把它們統治了，使能于已有利，這舉動的最後的姿態是佔領……：……一串合論理關係的連鎖中之不可免的一環：工業，市場，統治，海軍根據地。」

這是真的，馬罕將軍以人性的複雜性質（這是誰都不否認的）為藉口來預料這個評論。他說：「青銅是銅，青銅是錫。」但是他忽略了這個事實，即是如果一方面做定了銅或做定了錫，則它已不復是青銅了。

作者從未認為所有國際間的行動都可以用一個狹隘的動機來解釋，但是他認為，如果你可以將一個機構，與馬罕將軍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以付的機構同等重要的機構，之義意與妙地修正過來，你便會與妙地修改了國際關係的性質與組織。因此，雖然這裏所推敲的題目與我曾經援引的批評同是狹義的經濟的，但是它對於國際政策的各種問題却有一種深奧的意義。

「經濟的」與「自私的」這兩個名辭的意義之被混亂引起了不少禍患。父母適當地供給子女，這種長久不斷的努力——半生繼續不斷的努力——自然是經濟的。無論用任何正確的觀點來解釋自私這個名辭，他們也不是自私的。

想到它與戰爭的關係，「經濟」這個名辭在我們心中生出一幅怎樣的圖畫呢？在那些對我們在討論戰爭中引入經濟問題表示非常憤慨的評論家——不幸其中包括有若干

英國文學上的名人——看來，「經濟」這個名辭所予我們的圖畫，只是一個肥大的猶太人皮氣的股票經紀人在顫慄地憂慮他的利益。這種見解不能說對於真實的意義或幻想有如何大的暗示。因為戰爭在經濟方面之無價值，是以另一方式表露出來；饑餓，疾病，將死的兒童——由于饑餓的不斷的困苦，幾百萬人變為貪婪的，自私的，粗暴的；結果引起社會的不安，這種不安或許促成文明的崩解。

概括言之，我不相信人類是因冷酷地計算他的利益而戰爭。我從未這樣相信過。在我看來，這是人類心理學的一種明顯的與幼稚的誤解。我無法了解如何可以想像一個人爲了個人的利益的利益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于疆場上，除非他很肯定地知道他在天上的地位。各國並不爲了它們的錢財或投資而戰，它們是爲了它們的權利或他們視爲它們的權利的東西而戰，尤其爲了一切權利中最基本的權利，生存的權利，取得麵包與一種適可的生活之權利而戰。

對於馬罕將軍的顯著的自相矛盾之真正的解釋，我們也許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他所服從的動機是什麼。現代心理學的研究之整個趨向似乎在指出我們之所以有所舉動，是因爲我們想有所舉動，然後設法找出理由使這種舉動成爲合理的。這種做法似乎是特別用于對付集團行動與政策，因爲在集團行動與政策當中，責任心是非常稀薄的；其所以稀薄的原因，是由于甲以乙亦如此做法爲藉口，而乙又以甲也如此爲藉口。

本書作者在早期著作中，曾企圖藉分析愛國主義的若干粗暴的表示，以顯示愛國主義的本質：在南美共和國委內瑞辣的爭執中，美國人的惡英病之暴發，美國對西班牙的戰爭，法蘭西的德雷福案，英國的部耳戰爭。在每一種情況之下，我們見到整個人民爲他們號稱爲愛國主義——希望他們的國家幸福——的情緒所大大的煽動。但是這是很明顯的：美洲人民之爲了英國的基阿那與委內瑞辣的邊界問題的爭執，而不惜冒與英國一戰之險，並沒有想到國家的福利，而數月以後美國又爲了古巴的獨立而真正與西班牙打仗，其實古巴的獨立，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都可以在短暫的期間不戰而獲。這種政策事實上並沒有證明是爲求美洲人民生活的改善。美國人當時之對戰爭感到興奮，有如其後對暹羅之感到興奮一樣；他們之希望戰爭有如英國人不久以後之希望反對部耳人的戰爭一樣；而法國若干部份的人民之所以要處罰德雷福，是因爲他們不喜歡猶太人。他們都設法使他們所想做的事情成爲正當合理的，他們的辦法是求得似乎合理的與實在的理由。

分析戰爭的原因到這個地步時，一般人的結論是你對戰爭沒有什麼辦法；人類的行爲既是產生于與利害沒有多大關係的動機，討論某種行爲的害處是無用的；建立在本能的與未經考察的衝動上之行爲是不能改變的；心理上的「希望」是不可改易的。但是，撇開現代心理學不說，日常的經驗與歷史的事實都表明這樣一種結論是十分不正確的。未經審察的衝動可以受審察，第一個念頭可以用第二個念頭代之。既是一個社會，我們

當然不會繼續希求我們以前所希求的同樣東西。一種在某一時期的被認為良好的東西，經過對它的真正的良好性作一翻討論以後，許被人目為可怕的東西。某一時期我們要吃我們的敵人，焚燒異教徒，在決鬥中殺死我們的隣人，焚燒黑人。但是其後我們第二次想及這類事情時，發覺我們完全不希求它們。某種比我們初次所想像的更擊破壞性或更有害的工作；我們發覺我們并不如從前之希求它。這並不是說人性已如生理上的結構一樣起了變化，是因為我們多見事物，從各方面去研究它們，結果我們始初忽略了的事物，予我們所見的以一種不同的解釋。這種對事物不同的看法使本能與衝動換了不同的方向。由野蠻到文明這個進步可以稱為一種過程，它把第一個念頭置於第二個念頭的管治之下，以置本能於社會的理性的統治之下的方法來指導本能，這不一定等於禁止做我們要做的的事情；它在獲得新的希求，因為我們以另一個觀點來觀察事實。

這是我們日常觀察中一件平常的事情，人們由於早年的觀念，習慣訓練，對價值的估量，等等之不同，對於同一刺激的反應是各不相同的。英國人與印度人兩者都同樣感到飢餓，當他們都沒有進餐外出的時候。但是前者想到多汁的牛肉排，而後者，如果他吃牛肉排，便會嘔吐。這並不是後者在心理上與前者有別。印度人的胃的內容組織與英國人的是一式一樣的，但是習慣與觀念使印人需求與喜歡不同的東西；以與英人不同的方法獲得滿足。一個之以想及牛肉排為快樂，另一個之反對牛肉排，都同樣是「人性

以爲人類必須時常用與從前同樣的方法來滿足他的恨與好鬥的本能，以爲人類所希求的是永遠一樣，這無疑的是否認了所有人類的經驗。

這不是企圖以「脆弱的理智來統制強烈的感情」的問題。理智的能力是脆弱的。擺動船上指南針的「力量」也是脆弱的：與船上機器所發動的二萬匹馬力比起來是微小的。但是這些機器的力量結果是拯救或破壞這隻船，隨時有賴於指南針的脆弱力量。如果指南針，只有脆弱的力量，它所指的方向是正確的話，機器的力量便會愈強大；而這隻船避免大風與觸石的機會亦愈大。如果指南針偏歪了，則當船誤觸暗礁的時候，其破碎的可能亦愈大。我們的理智與志願是指南針，我們的感情是機器。

橫過大街上，我看見一個多年要殺害的終身敵人。我的感情狂亂了。沒有道理可以轉移我的行爲。我已失了理性。但是一個小小的事實推論使我的感情立刻轉換過來。與我同行的一位朋友指出那個人的右手有五指；我的敵人只有四指。這個小小的論辯，純係事實的推論，啓示我這是一種錯誤，我不復想殺那個人；由於以不同的方法來觀察事實，我的願望完全改變了。

誠然，我們要滿足國家的名譽自尊心，滿足我們對外人的懣惡。這些都可以說是強烈的衝動。但是我們同時要求不損害我們的貿易，我們國家的昌盛。如果事實明顯地擺

在我們面前，放恣衝動的結果將招至對貿易與昌盛的損害，則這個願望會抵消另一個願望。我們對於這願望的情緒大部份決定於我們對它的見解，決定於它能使我們的國家幸福到何程度？

在西方人類發展的現階段，他們有一種顯著的需要以解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政派間的更密切的合作。然而現在的趨勢却是各黨派間的敵對，一黨統治他黨的鬥爭。正因為它有這樣強烈的本能的根基，我以為這種鬥爭會繼續下去，直至我們清楚地認識這是無濟於事，不能滿足我們永久的需要為止。到了我們認識個人的衝突與統治是無價值的時候，我們便會轉向合夥的辦法。但是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可以。

一位美國的社會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吉丁史）曾這樣說：「苟我們可以自信地行動，我們便不爭辯；然而當我們面對着充滿不正確的事物之環境，或兩不相容的機會的時候，我們最先是猶疑，然後用我們的方法來摸索，然後推測，最後訴諸理性。因此理性是心的行爲，當面對着我們的或環繞着我們的機會之分配方法，是依照機遇律，或者，如數學家所說，是依照無規則頻數律的常態曲線時，我們便得依賴這種行爲。在曲綫明顯地歪斜的時候，我們就決定：如果它在開頭便因權威或衝突的原故，變爲明顯的歪斜，則我們的理論是無價值的，或不完備的。因此，在國家裏面，如果任何一個黨派或聯合的黨派佔優勢，並且能夠敏捷地行動，它可以用絕對的辦法統治國家，無論它是

仁義的或殘忍的，它用不着耗費國家的資源或時光來作種種的討論；但是如果黨派很多，並且做成一種互相抵消的局面，如果沒有巨大的偏向與偏重的力量出現，則以討論會議來統治的政府制度不免產生。只有在討論商談的情況下，各黨派才可以聯合起來。如果權力能夠命令，它便能統治，而訴諸理性一舉將是徒然的。〔

這就是說，一種對互相依賴的認識，即使是潛意識的，是造成爲保自由而自動限制自由的民主社會之習尚，觀念與社會意識的基礎。〕

它同時指出成爲國際衝突的主要原因之衝動和本能與若干經濟真理的關係。我們將避免或不能抑制這些本能，除非我們瞭解放縱這些本能會阻礙我們獲得我們所需的，是社會生存所必具的東西，到時我們會說它們是反社會的，有如我們之指斥宗教狂一樣，並且建立一個統治的道德。

有如雷基所指的，這個一千百世成爲其他各種利益的中心之偏見，已經完全消失了。曾經成爲政治家的最嚴重的職務的結黨工作，現在只流行於預言說明家的推論中。在所有支記國與國間的聯合的親切的與嫌惡的因素當中，曾佔優勝的固執派的勢力，現在可以說已不復存在了。甚至人心最基本的本能也生出一種改變。直至十七世紀，哲學指稱爲正當研究所必備的各種精神上的美德，大都被一致地毀稱爲一種罪惡，而大部份最重大的心理上的惡弊，却被故意地譽爲美德。〔

如果有人說天主教徒與基督新教徒間的不和並非武力所能調解，人們將有一天認識這個真理，並且認為歐洲各國間的宗教戰爭是一種野蠻的與不可思議的時代錯誤，他必被譏罵為無價值的空想家，完全忽視了人類本性不變的最重要的事實。

在宗教戰爭的時候，一個紅衣主教會這樣說：「人們永不會停止為求得關係他們最大的東西——他們的永生——而戰。」他繼稱，這就是天主教徒之所以仇恨異教徒與異教徒之所以仇恨天主教徒的原因。這類的感情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甚且是可稱讚的。審判異教徒的法庭的火永不會滅熄，直至全世界的人都變為基督徒或都變為異教徒。

好的，紅衣主教可以舉出許多當時的事實來確證他的理論。但是人們已不復為了信仰的原故互相焚燬，甚至三K黨（排斥新教以外的各教徒的黨——譯者）也努力設法不開這種玩笑。某種非常重要的東西使人性在這方面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許有人說這是因為我們已不復把宗教看得嚴重，人們已變為懷疑派。但是這只把問題更往後推而已。為什麼我們變為懷疑派，為什麼這個變化減弱，取消或改變了哪些曾被目為「天生」的感情與仇恨的方向？如果「談論」——高深的評論家的，或其他的談論——沒有改變了人類，它也已改變了人類的行為。這就是最重要的一點。

各國的宗教鬥爭中的一個明顯的故事明白地說明曾克服了人的精神之變化。基督教徒為爭聖墓而與異教徒作戰凡二百餘年。所有歐洲的大國都參與此舉。這似乎是可以圖

結它們的唯一東西，產生這個運動的感情非常奧妙，結果這個鬥爭繼續數世紀之久。歷史上也許沒有旁的東西可以與之比擬。假使在這個鬥爭當中，有人告訴當時一位歐洲的政治家說，總有一天，歐洲的代表們，已成爲異教徒的主人的代表們，聚集一堂，本可舉筆便將聖墓永遠劃歸基督教，但是經過二十分鐘的倉卒的討論後，他們決議說整件事是無價值的！如果有人對一位中世紀的政治家說出這一套話，後者必視這種預言爲瘋人的話。然而這種預言後來却成爲事實。

瀏覽歐洲史的普通故事，會見到人類的心與智都發生顯而易見的變化。由於人性的變遷，爲蹟武主義的獨斷者所否認的人性的變遷，甚至在我們這個文明的階段已不復能發生的事情，在我們祖父的時代却是平常的事情。誠然，剛才所談的宗教態度的改革半是由於感情的半是由於理智的變化。一個即使沒有懷於母胎以外的罪惡的未來嬰兒，如果沒有受洗，依一種神學的说法，也須受地獄火燒的永久苦楚。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說法，就是從感情的觀點來看，也是不可能的事。曾經被認爲無可疑的真理者，現在被人以可怕與憤慨的態度視之。又如雷基所說，因爲一個巨大的變化會靜靜地掃過基督教。沒有騷擾，一種舊的教義已在人類的種種成就中過去了。

但是這種變化並不需要幾千年的時間才發生。我們今日將會作何感想，如果我們被邀參觀一幅西班牙畫家所繪的畫，裏面繪的是皇上貴族以及老百姓在一個節日裏如赴大

宴一般集合在一個歐洲的大城市來觀看焚死一個美麗的嬰兒，因為它吞吸它母親的奶，這種行為在當時是信以為一種罪過的。

這種情境距離我們有多久呢？呵，還不到三個普通老人的壽命。這種情境——它不是一種絕無僅有的事，它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十足代表當時的思想與情緒的事——要過了多久才變為不可能再發生的事呢？還不到一百年。這種刑罰在一六八〇年舉行，但在還不到一世紀的短短期間內，全世界都知道一個嬰兒再不會被正式的朝廷用合法處分的名義來生焚，這種生焚再不會如公宴一樣的在歐洲大城市內舉行，由皇帝貴族與老百姓來監視舉行。

一種改變了宗教的習例的進步是否對愛國主義毫無影響；合理化與人性化已行於教義與宗教信仰這個較複雜的範圍內，却不能也在政治的範圍內發生影響？圍繞着信教自由這個問題的困難，比我們在這個問題所遭遇的困難要大得多。以往，以至現在，這種舊秩序都為一種真正無私的行為所庇護；以往這種行為被稱為宗教熱；現在稱為愛國心。好的老宗教審判官，他們的公正無私，誠實，專心並不亞於那些好的普魯士的貴族黨員，法蘭西的國民黨員，不列顛的贖式主義者。以往以至現在，趨向和平與安全的進程，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危險的退步，信仰的瓦解，顛覆社會團結的現象。

我以上所說的會使歐洲的思想發生可驚的發展的那一百年，那個因進化太大，使人

們的思想與本性都似乎改變了的時代；是一百年沒有報紙的時代；是書籍非常罕少，一個人需幾年的時光才能由馬德里旅行至倫敦的時代；那個時代沒有水蒸汽印刷機，沒有鐵路，沒有電報，沒有成千的設備使一個英國政治家今晚說的話，明天四千萬德國人便可以閱讀。簡言之，現在幾週內所能傳播的思想比以前在一世紀內所能傳播的還要多。

當事物移動得非常慢的時候，一個或兩個世紀的時光尙足以改變歐洲人民對於宗教方面的思想。在一個事物移動得迅速許多的時候，爲什麼在一個或半個世紀的時光改變人民對於政治方面的思想反是不可能呢？是否人們對於改變他們的政治見解不如改變他們的宗教意見容易？我們都知道並非如此。在歐洲每一個國家我們都可以見到各政黨在鼓吹，最低限度在默認，他們十年前所堅決反對的政策。是否現有的證據可以表明，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政治比其他方面特別難於改變及發展。新思想比較不易深入及發生影響？

那些相信人類對於戰爭的本性不變的人，他們的理論根據在那裏，是很難說的。他們是否真的相信戰爭的傾向是難於改變的，或者是怕它不能改變？因爲雖然他們很武斷的告訴我們說你永不能用「說話」來驅除人類戰爭的傾向，他們在戰時却常大聲疾呼的要求——西班牙戰爭時在美洲如此，布耳戰爭時在英國也是如此。對和平的宣傳加

以有力的禁止，因為這種宣傳搖動士氣——即除去了繼續戰爭的願望。甚至在平時，和平主義者也是被指謫的，正如羅斯福上校現在指謫他們取消我們的「戰鬥綫」一樣，他以爲我們要戰爭的興奮劑，「奮鬥的生活」，使我們脫離那種懶惰的傾向。他明顯的怕我們得不到我們所需要的戰爭。這是拉斯金所宣傳的舊題目。

我並不否認我們在精神上受將士們之賜甚多。我甚至不明白爲什麼我們應該否認我們會受八世紀至十世紀掠奪歐洲西岸的海盜與其他海盜之賜。兩者均曾遺贈我們勇敢，倔強剛毅，與一種有秩序的冒險精神；接受打擊與予以打擊的能力；同志之誼與粗魯的紀律——所有這些以及其他好些。以爲任何一種情感是完全好的或完全壞的，都是不對的。使海盜們成爲破壞的與殘忍的掠奪者同一的精神的力量，可以使他們的子孫成爲堅強剛毅的先鋒隊與殖民。

和平的宣傳並不需要忽略這方面的事實。人們喜愛一個軍人正如我們童年時喜愛海盜一樣，而我們當中許多人，終身都保留着一部份的稚氣，這許對我們是很有利的。但是當我們過了童年時代，我們懊悔地發現一個悲痛的事實，就是我們不能做一個海盜，我們甚至不能獵狩印度人，既不能做一個探子，也不能做獵人，到那時我們便明白我們已過當兵的時期了。八世紀至十世紀的海盜，甚至後來的海盜的冒險行爲，其浪漫的情趣與戰爭的一樣真實。但是我們廢止八世紀至十世紀的海盜，我們把後來的海賊吊死，

雖然我相信當我們吊死他的時候，我們是愛他的；我不覺驚奇，主張制止海盜行爲的人被詆毀——除海盜以外——爲不了解人性的易動感情的傷感家，或者，如李將軍話裏所說的，是個「一知半解，神經不健全的幻想家，他否認了原始鬥爭的法律之不變性」。海盜行爲嚴重地防礙文明。我們準備詠頌海盜，但是我們不能容許他在海上行凶，我們有些人在準備在詩歌故事及傳奇小說中予將士以應有的地位，并承認，由於羅斯福先生與毛奇將軍以及其他，我們接受了將士的若干品性，沒有這些品質我們將變成貧乏可憐的人，但是我們却同時在研究是否已到了把他溫柔的放在詩歌架上與海盜一起；或者最低限度爲那些活動，找尋其他園地。無論那些活動如何引誘我們，在這個宇宙內，雖然人類愛冒險重於勞動，（如貝亨所說的）而勞動——無論我們與德國戰爭與否，戰勝或戰敗——却是我們的命運之宇宙內，它們是沒有地位的。

## 第十二章

### 結 論

從這本書的理論所推斷出來的結論，並不是說戰爭既然是無益的，攻擊的危險已成過去了。人類并非受事實的指導，而是受他們以為是事實的指導，只有在無益的行爲被認識清楚以後，無益的行爲才會停止。因此單方面的裁軍是無用的，本書亦并不作此宣傳。但是在維持我們的軍備的時候，我們必須努力創立一個以承認國與國間互相的義務，有效的合作所必需的義務，為基礎的新秩序。這種努力目前是不受人歡迎的，因此政治家們不敢這樣做，恐怕發生危險。荷我們相信國與國間的合作是反乎自然與生命的法規，并非人力所能及，則上述那種必需的意志是永不能存在的。本書企圖推翻這種魔鬼的宿命論；證明雖然真正的戰爭是不會自己停止的，且莫談人類的行爲，人既然製造戰爭，他同時也可以使戰爭停止。

結論爲何？

我們已經看見他國對我們施以有效的攻擊的結果，在物質方面并無所獲，我們對他國施以攻擊，其結果亦如此；一個敵人，在戰爭中獲勝，結果既不能取去我們的財富，我們的黃金，我們的貿易，亦不能取去我們的殖民地（因爲我們並沒有佔領它）；他的戰爭的結果從經濟的觀點上看是無益的。我們是否因此便下結論說我們不需要防禦；我們可以取銷我們的軍備，邀請外國人來任其處置呢？

我時常都堅決地說這不是結論；戰爭的無益的結果本身永不會停止戰爭；只有在人類認清楚這種無益的結果時，他們才會停止這種無益的行爲。他們目前并不認清這種無益結果，否則本書便永不會寫成了。政策之決定，并不是根據事實，而是根據人們所信以爲是的事實，而這種相信許是大錯而特錯的。

本書的初版本，以及後來的版本內，都一再的證以下這一段話：

「我們是否要立刻停止備戰，因爲我們的敗績既不能使我們的敵人獲利，結果對我們亦無多大害處？閱讀本書的種種論點以後，不會作出這樣的結果的。這是明顯的。苟我們所討論的錯誤觀念仍流行于歐洲，苟各國仍然相信用武力與政治征服他國的結果，勝利者總可以獲得確實的利益，我們通通都有被侵略之虞。造成我們

未來敵人的行爲的真正主動力，不是他的利益，而是他所認以爲是的利益。作祟的不是事實，而是人們對於事實的見解。因爲我們所討論的迷夢仍然左右那些對歐洲政治舉足輕重的人們，我們必須視一種侵略，甚至如夏理臣先生所預言的侵略，爲實際政治範圍以內的事。（不在可能範圍以內的，是他預言爲攻擊的結果之破壞人類精神與物質建設的程度，關於這，我以爲以上所述的足以證明。）

「單由於這一點，我以爲我們或其他國家有權以自衛的方法來防止這種侵略。所以，這不是一個不願其他國家的行動的縮軍要求。苟歐洲流行的政治哲學仍如上述，我決不要求我們的戰費減少一英鎊」。

在本書補充了以後，我這樣說：

「但假如準備戰爭的機構成爲我們唯一努力的方式——如果國家的努力是要忽略其他一切的因素——則誠實愛國之士將會漸漸懷疑他們之協助我國的擴軍是否正當」。

我們認爲權力無能是危險的；但是如果我們因爲集中我們所有的力量擴軍，沒有餘力來爭論或提異議而被驅作戰，那我們所冒的危險就更大。

在這方面人們似乎很容易採取以下兩種行動之一：「實利者」的行動，他把所有的力量用於獲得一種完成戰爭機構的政策，忽視任何其他事情；或者是和平主義的行動，他宣傳戰爭殘忍或戰爭的無窮性，認為國家的防衛與他無干，不是他的事情。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够包括問題的兩面的行動；教育設備，在這方面的政治改革，以及那種可以抵消現存的侵略的衝動之防衛。集中注意力於一方面而取銷了其他方面是使整個問題無法解決的。

如果國家站在「實利主義者」那邊，把它們的力量完全用於擴軍，什麼不可免之事將會發生？

一位評論家有一次以一個質難者的地位詢問我：「你是否主張我們該比我們的敵人強，或弱？」

我回答「這個問題最後一次向我提出是在柏林的德國人，你要我如何答復那些德國人呢？」

不列顛海軍盟約答問說：「所謂防禦者，即使本身強大，致敵人視攻擊為危險之事也」。而志在重新建造的德國海軍法規，在它的前言內，也只是把上一句話翻成德文而已。

真理的要素是有等級的，本津并非爭辯說不會有，并且永不能有，國家間的利害衝

突這類事情。我不需用這些絕對的事實來證實我在沒法證實的事例。但是如果這是真的，即一個國家不能用武力奪取財富，——現世界的財富的本質是如此，武力的奪取會使我們所要的東西消失；如果，我們必須戰爭否則餓死這句話是不確的，我們說除非停止戰爭，否則便餓死，這句話還要更近乎真理；如果只有合作能使我們解決我們的經濟問題，而且證明這是我所說的開拓合作之路的辦法，如果合作的意志是要開始動作的話，我們必須把該做之事都做了。

有意志便有辦法這句話不是真的，但是沒有意志便沒有辦法這句話却是千真萬確的；合作將是不可能之事，如果每一方都相信合夥即等於共分有限的掠奪物，而這掠奪物，只要他征服其他一方，便可以全部獲得。

現在，雖然這會是真的，當你在倚賴你的夥伴的合作時、（譬如說，兩個漁人共駛一隻漁舟，如果其中一個想單獨駛它，則這個漁舟必會毀壞）你不能有利地毀滅他，不能把他所獲得的一部份捕獲品掠奪過來而不致犧牲你自己——雖然如此，這不是說你準備爲了合夥的規定而把一切保護你的權利的辦法拋棄了；也不是說把所有保證你不致做比你應有的工作多與獲得比你應得的利益少的措施都放棄了。

因此，雖然我們認爲用戰爭來掠奪不可掠奪的東西是一種愚蠢的行爲，既是文明的人，我們必須學如果合作，但是合作是需要組織，甚或需要警衛的。

透過警察表現出來的集體的權力，許是予人們——或各國——以平等，權利的平等，所必需的。環境給予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一種權力。關於誰有決定事情的權這問題，引起不同的——這許是一種誠實的不同的——意見。強者——為他的權利心所鼓勵——對對方說：「這是我的意見。我相信我是對的；我想把我的意見實施，你既是個弱者，你只有接受它而已」。這裏是沒有權利的平等的。物質的或經濟的問題，有如我們已看見的，不久成爲一個權利的問題。由於一些思想之奇異的詭辯，這種情況便可以作爲競爭的藉口，造成各國的武裝的無政府狀態。然而這並沒有獲得權利或正義；這只是造成不公平；強逼弱者接受強者的意見，無論那個意見是如何荒謬。

但是如果無政府狀態，競爭，不能獲得權利，亦不能造成無抵抗；強者的不可反抗的統治。權力便必須公平地爲大家做事，想能够這樣辦到，只有把權力置諸一種平等地適用於大家的法律或法典之後。

甚至當一羣文明的人，住在國家裏面，完全接受社會合作的原則，而且他們的行爲并不根據需而被役於人者始克生存的假定——甚至這樣，我們知道我們之繼續生活亦有賴於制定法律或法典，有時是非常複雜的，包括由汽車交通至婚姻的法律，銀行營業及財產承繼等等。每個人必須知道他所佔有的權利必將由他的力量以外的權力來保證，否則他便要作他自己的權利的防謬者并且設法使自己比鄰人強；而那個鄰人又會同樣的要

做無事，每個人都希望比別人強，結果造成無政府狀態及混亂。

這就是爲什麼我不相信防衛這個問題可以忽略；我們亦不能勸人接受全然的無抵抗作爲解決問題的辦法。取消我們威逼的武器，或減少它們至零點的第一階段，是有如上頁所說，把這些武器由敵對的爭訟者變爲法律，移到社會去，使我們的陸海軍成爲文明的公共警察，作一種大家承認的法律之後盾。但是在我們可以這樣做以前我們必須創造一種社會觀，一種心理，認爲我們的利益與公衆的利益是相同，不是天生的，「生理上的」互相衝突的。嘆息沒有警察來壓制我們的敵人是無益的。如果我們自己對於創立警察一舉拒絕合作。在警察可以存在以前，我們必須有一個社會；在一個社會可以存在之前，我們必須有一種共同利益之心，而這種心理之存在，又須我們先除去那些與這種心理勢不兩立之錯誤思想，爲了這個目的，最後我們便不可避免的談到改變決定行動的人們的思想了。

無論我們從何處着手，用那種計劃，無論如何精細或有變化，結果常是相同的——人類在這方面的進展是以他的思想適用於社會的程度而定。

談到這一方面，我們慣常說，這需要眼光慢慢的改變，暗示大衆的大智大慧必須是這種改變的過程之一部份。然而，有如我們在前章所見的，巨大的改變，如國家對於宗教信仰的態度之改變，並非由於一種了解多方面的智識，頭緒紛煩的學問，而是一種

對於簡單的日常事物之較清楚的認識有以致之。這就是本書所主要討論的問題。

如果對於改革這方面的思想仍未有多大的成就，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努力去設法。我們當中有幾百萬人準備把自己的精力用於一種國防，實際是一種煽動建造無畏艦與擴軍的權宜政策之國防，可以看得見的國防。但是只有幾十人以同樣的熱誠來獻身於國防的另一部份，可以真正保證安全的唯一部份，雖然它所用的方法是不可見的——思想的澄清。

這裏并不打算起草世界政府的計劃。這類計劃已往已經有很多，將來也會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有名的「亨利第四的偉大計劃」，關於這個計劃，一位同等的君主這樣說：「它是完善的，沒有一點瑕疵，如果有也許就是：沒有一個現世的王子會夢想過同意它」。這就是所有這些紙上計劃的缺點，草擬的時候沒有顧及現存的思想，觀念。假使忽略了現存的思想，觀念，我們真可以說這些計劃中「最好的就是最壞的」，因為它們愈是個合理的政府機構的好計劃，它們愈遠離慣見的事物，日常的事物，愈少注意社會上的偏見，曖昧的地方，常人的愚行，而這些事物愚行所產生的弊病却是它們所要醫治的。因此政治家、政客們是對的，當他們拒絕研究那些他們認定羣衆永不會接受的計劃。然而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嗎？是不是說這世界永不能為常識及理智所管治，或者是對於政府方面的常識與理智的程度永不能增加；致使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有更多的智慧？

誠然，我們不相信這個，因為如果在這方面我們得不到更多的智慧，我們將會得到更少了。注意這方面的主要錯誤吧。政客或政治家說：「我擁護你的偉大計劃的唯一結果使我的政黨被一個憤怒對選民，其對愛國心，國家福利，道德及宗教的思想為本政黨所侮辱的選民，傾倒或攆出辦公室。我們會前進了多少？即使我們相信你的計劃，然而因此毀滅了我們的政黨，并使選民毀滅你的計劃，那又所為何來呢？你并不因此更接近你的目的。你的計劃只是一種不『實際的政見』而已」。

一般的結論既是如此，這個問題算完了，現實的人再不必對此問題加以注意了。

但是這種說法是把政客的真正任務大大的混亂了。他的任務不是改變一般人的心理，而是代表它。把握羣衆的心理至一種希有的程度，因為追隨羣衆心理而做領袖，這是政治上成功的十之九的秘訣。以爲一個人藐視他的追隨者之真正信念便可以永遠作領袖，這種看法是愚笨的。在一個政客看來，希望羣衆時常投票反對他的真誠的信念是幼稚的。這并非說信念永不能改變。世界歷史表明它們可以改變；關係我們最深最切的事物，道德，我們的是非觀念；宗教，我們對於上帝的觀念；我們對於榮譽的觀念；我們的屬輕屬重的觀念，都會在一世紀或兩世紀內發生革新的變化。一大堆我們的祖先認為對的或可原諒的事情——人體祭品，奴隸制度，多夫多妻制度，君主政體，司法上的刑訊，決鬥——是我們視為可恥的錯誤或荒謬的。許多我們認為對或好的事情，我們的祖先

會視為罪大惡極。所以信念是可以改變的，但是民主的政客，他的政治生活是倚靠選舉票——在一個選舉的繁忙中迅速獲得的票——是不能改變這些信念的。他所能為力的是反映或表示那些已在羣衆心中醞釀的變化或改革，而這些變化或改革又往往是政治以外的力量所造成的。

在這方面，以下的工作是政治圈外的人的責任：爲更聰明的政客準備理論的根據；使他可以擁護正確方針，因爲有時那種方針許在政黨的主義上得不到認可，但經政治先導的推許，它便可以在羣衆面前提出來；或者，對那些懸而未決只需加一些沉澱劑便可澄清的意見，改變一種隱喻的方法。後一階段的工作是政客的，然而先期的工作却是政治圈外的人的。

這是我們的光榮，英國以往曾經是提倡新政治思想的領袖，並且把這些新思想施諸實行。她自己的帝國，幾個獨立國的集團，本身就是所有歐洲國家間的關係的一種預計。如果五個國家會放棄用武力互相攻擊，並且能夠調整他們的關係不用訴諸武力的鬭爭，爲什麼五十個具有同樣文明的國家不能這樣做？

把大不列顛帝國統治的原則擴充到全個歐洲社會，是本書所主張的解決國際問題的辦法。這種擴充不是武力所能辦到的。大不列顛征服那些巨大的軍國是實際不可能的，而且如果這樣做了，會使英帝國所用以作根據的原則歸于崩潰。以武力求進展的日子已

成過去了；只有思想可以促成進展。

因爲這些自由人類集團的合作原則，在特殊的意義下，是在英國發育的，英國應負起先導的責任。如果不是由它發育，那末誰發出這些關於英國所生的集團間的關係之原則呢，我們能要求別國作先導嗎？如果英國對她自己的原則沒有信心，那末我們期望誰呢？

英國的思想給了我們政治經濟學；英國的思想與實施必須給我們另一種科學，關於國際政體的——人集團的政治關係的科學。我們已有這種科學的概論，但是它極需要系統化——需要那些智識足以發育及擴充它的人的認可。

這種工作的發展，將與英國民族的積極精神及現實才智以往對於人類進步的貢獻，並駕齊驅。

我相信，如果這件事能有效地以那種健全的，切實的，公平的工作與以往在其他宣傳中證明很有用的組織之力量——使人想起兩三個英國人在反對奴隸制度運動中所做的工作——使他們不單會表出對這個工作特別易感應，而且英國的向例會再次使它在這個偉大的道德的與有智識的運動中居於領導地位，這個運動正適合合作它領導人類自由及議會政體運動的續篇。對此事不加努力，並且沒有反應，我們所期望的是什麼？我們是不是仍盲目的服從人類原始的本能與舊的偏見 仍爲那些舊的口頭禪與視修正舊觀念爲不

愉快之事的奇怪的惰性所奴役，願意在政治經濟方面無限量地重造那種在宗教方面我們已解脫了的環境？我們是否繼續鬥爭，有如基督教最先的十二世紀中許多好人的鬥爭一樣——流了海洋一樣多的血，費了山一樣多的財富——以求得一種底子裏是可笑之事；以求得一些事物，這些事物如果得到了也對我們毫無益處，如果它能給我們什麼，那就是罰使世界各國無止境的流血，並使所有那些人類在清醒時認為唯一值得持久努力的目標的不斷的失敗？

## 第三編

### 最後的教訓

本書的辯論所指的政策爲何？如果那種政策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則我們的整軍之無補於安全有如我們一九一八年的勝利一樣。

對於這本你剛讀完的已有三十年歷史的書之一的批評是這樣：

無論如何正確，如何與事實符合，它的真理一點也不能改變極權政府的方向。因此，爲了這個原因，它的真理在國際政治方面是無價值的。

對於這種批評的答復，本書的第一篇已完全有了，但是將這個答復摘要如下，許是有用的：

1 在推行政策時，本書的中心真理不單爲極權國家所忽視，就是我們自己也忽視了；不單在凡爾賽會議忽視了，在其他許多場合也被忽視了，結果造出了許多絕不必發生的問題。本書所談的論點的重要性未獲得更普遍的認可以前，國際會議不會成功，一個

可行的政策不會推敲出來。

2 即使我們準備用很有價值的土地讓與之方法來滿足「無」的國家之要求，它們的經濟困難也不能因此得到解決。我們就是把我們的帝國以及它所佔有的都放棄了，也不能解決它們的問題，正如這種佔有之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一樣。這種讓與的方法只能導致變化，但不能對問題有所改善。何況，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準備作大量土地的讓與。

3 爲一種重建英國優勢權力的——不必依照既定的原則及法律來使用的——企圖所支持，簡單地拒絕了這種要求，也是同樣的不足以應付問題，結果只造成奇異的以頭向前的衝突。由於最近六七年來的英國的大政方針，這一個衝突似將使我們歸于滅亡。

4 英法建議平均地支配它們明白不能保衛的藩屬的帝國，也是爲擴張領土理論所浸染的「無」的國家集團，認爲自己武力足以實現它們的要求的「無」的國家集團，所視爲不適合的。它們寧願佔有或統治，不願意分有。因此和平需要一種二元政策；反對絕對佔有經濟權利的要求，同時建議支配經濟權利的真正均等；合夥。

5 這種建議永不會由英國政府及人民提出，因爲他們自己相信絕對的佔有領土是有利的，同時不相信他們真正需要法律或法律的保護來作他們本身安全的條件。到某種階段，「無」的國家的一個異常的要求將被反對，結果我們所得的不是戰爭——我們會被毀滅的戰爭——便是另一個姑息的屈服，而這種屈服，無論如何完全與謙卑，亦不會解

決問題的。

我們之大量的重整軍備是證明我們希望在某種程度反抗。我們會更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我們能對世界，對極權國家，尤其對我們自己，明白地說我們要權力的目的並非要把德國人，日本人，或意大利人的防衛權，我們自己也要求的防衛權，奪去，我們是想與他們共同合作以建立一種制度，使他們能用和平的方法漸漸獲得他們要以戰爭求之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安全。我們會更能抵抗，如果我們明白宣稱我們之整軍並非爲了作德國權利的唯一的（及有關係的）判官，而是想確保它不會作我們的判官；並非要聯合各帝國以反它，只要知道它並不以征服的方法聯合各帝國以反對我們。

如果這是我們的政策，則它對於獨裁者所用的政策是不無影響的。獨裁者知道在戰爭，尤其在勝利不會便宜地並且不能肯定地獲得的戰爭中，他們的地位會有種種危險；他們注意到上一次大戰如何掃除比他們自己的更老更合於傳統的政體；他們知道用最後的手段，獨裁者仍需多多倚賴民衆的支持；如果他們不能倚靠民衆，則他們便會爲可以獲得羣衆擁護的敵對的索權者所威脅。

只管有種種檢查的辦法，全世界普遍的公開討論所顯露出來的事實，總會有若干部份滲到獨裁國家的人民那裏去的。

這不是一個寫出詳細計劃的地方。本書作者曾在別處把這類政策摘要說出。各種步

驟已是夠明白的了。

首先，讓我們談事實吧。德國，意大利與日本會否贊同我們的意思，設立一個實事求是委員會來答復這類問題，如「無」的國家在獲取原料方面是否處於不利地位，若然，不利之點在那裏？

第二，那些「無」的國家會否讓這樣一個委員會的決議自由地印給它們自己的人民看？（一個重要的條件）

第三，讓我們明白宣稱，遇到不同的但是誠實的意見發生時——（一方認為某種場合是天公地道的，而他方則認為大錯特錯的）——我們擁護採取仲裁的辦法。「無」的國家會否接受這種仲裁的辦法，同意接受公正的裁判或者以制止戰爭的辦法改正它們認為不公正的事情？（因為以戰爭來改變現狀等於依照征服者的意志來造一個新現狀，它所創造的不公正的事情將與它改正了的事情一樣多。）

第四，主要的「無」的國家的整個問題是它們認為現狀的不公正的現象與時俱增，那末它們會同意創立使這種不平現象和平的改過來的制度或機構，並且各本職能合作嗎？

第五，我們應明白宣稱，我們與其他接受那些原則的國家，根據攻一個國等於攻所有國這個原則，締結一個防守同盟或聯邦。我們應說明這種同盟並不是「包圍政策」，

因爲所有國家都可以按照平等的原則入盟；我們所建議於他人的防守原則與我們自己所要求的一樣。（這樣一個同盟的核心是英國；法國、中國、以後引導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加入。）

如果「無」的國家在這些條件下與我們合作，我們便是重建了國際聯盟。如果他們不合作，則我們更需維持這個同盟，盡量招致同盟國。我們對防禦的努力將更有成功的機會，如果這種防禦不單是爲了我們自私自利的權利，同時也是爲了大家的權利。

我們與極權國家的分別不是在他們「相信」戰爭或武力而我們不相信，因爲如果我們不「相信」戰爭或武力，則我們現在不應爲了防禦而武裝了。我們與他們不同之處在我們對於防禦之觀念。他們的防禦觀念是與他人的勢不能兩立，如果我們是聰明的，我們之所謂防禦，應是無論在經濟或政治方面，我們貢獻給我們所反對的人之保禦與我們自己所要求的一樣，我們所貢獻給他們的法典或規則也是我們自己準備遵守的。

然而這是說我們必須準備爲這個道路的法典或規則而戰，有如以往我們之願意爲我們的領土，我們的「佔有品」，我們所想像的利益而戰。

沒有武力作後盾的法律是可以想像得之。誠然，具有一種「非武力」性質的非常有力量法律，事實上是有的，而且可以推行的。但是，使一種徒手法律與武裝的爭訟者共存，與法律是爲管制他們而設的人的武力共存，是不可能的。那些論點——因爲它

們以不抵抗作爲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遭拒絕了——已在這幾頁說明，而在別處更有詳盡的發揮。

如果我們說，我們常常這樣說，想人們爲他們自己的利益以外的事情而戰，是沒有希望的，則等於說：想人們更了解他們的利益是什麼以及如何使這些利益得到最完善的保護，是無希望的。因爲這是可以斷定的，人們不能有效地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除非他們準備保衛他人的利益，即是說，準備保衛那保衛他們的利益的法律。關於這個題目，本書作者亦曾在別處推敲過。

爲使上面摘要提出的建議具體化，我們不應等待資本主義「滅跡塵環」，一如許多本書的社會主義的批評者所想像的。因爲我們永不會知道資本主義何時滅跡。托拉斯基，他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不足取的批評家，感動地相信蘇聯並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相反的，史泰林迅速地往回走，在全蘇聯重建資本主義，而且，無論此種信心如何愚笨，千百萬的「國家」社會主義的信徒認爲他們的途徑比莫斯科所採的途徑更易實現社會主義。因此，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求得一個全球同意的定義，其困難幾如對抗戰求得一個全球同意的解釋。事實上它會困難得多。

無論社會主義如何抬頭，在數世紀內，我們的世界必須保留資本家的，資本階級制度的，許多特徵。對現在擁有財富的資本階級說：「除非你準備完全推翻整個你所相信

的經濟制度，任何求得和平的努力都是無用的，「並不能使和平工作更易推行。如果這種見解有決定作用，則和平的工作便變爲不可能了。

這種見解莫斯科已有意放棄了。在那裏，世界革命的口號愈來愈不時髦了。俄國決定爲了促進政治目的，無論我們仍是個資本主義者或變成完全的社會主義者都必需的政洽目的，它可以與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制度合作。俄國境外的社會主義者也應表示同樣的智慧。

仍有一個最後以問題

現在各處都大聲呼籲國家統一。不錯的，但是統一爲的是什麼？與德國締結同盟來聽任法國的民主政體毀滅以及聽任俄國的分割嗎？與日本聯盟來啄食中國的軀殼嗎？我們的青年不會爲此而死，我們的國家也不會爲此武裝。

他們亦不會只爲了重新獲得如一九一八年一樣沒有好處只有壞處的勝利而武裝而死。如果距上一個勝利還不到三十年我們便需再次戰爭，則第二次勝利以後多久我們又要戰爭呢？

如果你告訴那些拿你的武器的人說，這裏所主張的和平與防衛的新方法是空想與無望的；只有舊的方法可以防衛我們的國家，則那些青年人，在看一看舊方法所給予吾人

國際迷夢

二七六

的防衛以後，必會決定不要防衛，拒絕拿你的武器。而他們是對的。



103 魯迅手稿 37.12.19.

•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七  
月  
重  
慶  
初  
版  
上  
海  
再  
版

# 世界和平之路

每冊國幣

元

原 著 者 諾 曼 安 哲 爾

翻 譯 者 林 苑 文

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號

發 行 所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電話四六三六四

印 刷 所 上 海 競 新 印 書 館

上海柳林路九六號

★

★ ★

# 87

046663

7

046663

\*to